

〔美〕 保罗·斯威齐 合著
哈里·马格多夫

美国资本主义的动向

商 务 印 书 馆

美国资本主义的动向

公司结构,通货膨胀,
信用,黄金和美元

〔美〕 保罗·斯威齐 合著
 哈里·马格多夫

郑瑄 张文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Paul M. Sweezy and Harry Magdoff
THE DYNAMICS OF U. S. CAPITALISM
Corporate Structure, Inflation,
Credit, Gold, and the Dollar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

内部发行

美国资本主义的动向

[美] 保罗·斯威齐 合著
哈里·马格多夫
郑璋 张文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8⁵/₁₆ 印张 180千字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4017·147 定价：0.70元

6067/05

出 版 说 明

《美国资本主义的动向》一书作者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同是美国著名的进步经济学家、《每月评论》杂志的主编，他们都曾来我国进行过访问，并发表了友好的报道。

本书写于1965—1971年，它是由先后在《每月评论》杂志发表过的十三篇文章汇集而成。全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七篇文章组成，主要介绍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些动向：多国公司的发展、对外经济扩张的状况、经济的停滞等等；第二部分由六篇文章组成，主要讲美元随着美帝国主义的兴衰而兴衰，最后必将以美国霸权的告终和资本主义货币与贸易制度的崩溃为结局。作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一定会分裂成为对抗的货币与贸易集团，从而可能爆发一场你争我夺的战争。书中对揭露美帝国主义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的窘境，提供了不少材料，对于我们研究国际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作者未能看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对于苏修的丑恶本质未看透。此外，作者在批判“金融控制论”时，实际上把“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对立了起来，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

目 录

序言.....	3
第一部分：公司，扩张和停滞.....	7
美国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	8
对外投资.....	32
经济停滞和经济学的停滞.....	45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58
公司合并运动：对权力的研究.....	73
对多国公司的几点看法.....	100
金融控制论的卷土重来：是事实还是幻想？.....	129
第二部分：通货膨胀，信用，黄金和美元.....	171
美元和黄金.....	172
黄金，美元和帝国.....	183
关于通货膨胀和美元的几点意见.....	193
清偿能力的长期下降.....	207
美国霸权的终结.....	228
帝国主义时代：金融体系.....	247

序 言

这些短文都是在 1965 至 1971 年的六年间写的。这是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在这时期中，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空前激化，最后以国际货币和贸易制度的崩溃为结局，而这制度是在美国霸权下费尽心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残破局面上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时期，不可避免地给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的真正性质和经营原则，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而我们写这些短文，主要就是抓住这种机会，而不是力求说明一套系统的理论。把它们汇集在一起会有使人们印象更深一些的效果，但我们希望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使本书在生动性或说服力方面有所减弱。

回顾起来，我们可以了解，对 1965—1971 年这时期的特殊性质起决定作用的是东南亚的战争。世界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紧接战后的那一段时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特别是在东欧和中国。但是在西欧，甚至在四十年代末之前就已开始恢复，而其后的十五年总的说来是巩固和进展的时期，美国起着领导作用，并显然在一步一步地把整个“自由世界”变成美帝国的统治范围。

终止了这一过程的，是越南人民为反对美国从法国手中接收印度支那并建立由它保护的新殖民国家的企图所进行的

无比顽强而成功的抵抗。由于这种抵抗的结果，美国军事力量被迫付出极大的代价并陷入困境，而这种情况影响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美国人民中有影响的阶层，特别是一部分青年和黑人，由于震惊而在政治上觉悟起来，变成一支反战和反帝运动的活跃力量，已经给予美国统治阶级的行动自由以严重限制，并迫使它加倍努力地把它的帝国主义阴谋隐瞒起来，如果不是加以修改的话。美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已变成脱缰的野马，直到现在，各种加以控制的努力都失败了，并在1970年开始的商业周期的整个衰退时期中持续存在，加重了因大规模失业和职位不安全而产生的物质上的和心理上的痛苦。同时，美国由于推行扩张主义的国际政策，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如果不是不能忍受的）国际收支逆差，到这时则变得更糟了。六十年代后期受到了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的冲击，危机给了黄金—美元本位以日益加重的和最后是致命的打击，而黄金—美元本位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采用的。在短短几年之内，曾经显得是那么有秩序和稳定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了自从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冷酷可怕的日子以来不曾有过的混乱状态。

本书实质上是一本关于那些年代以及美国资本主义所扮演的角色（既作为头头又是遭难者）的书。^①其中有些短文主要是讨论：曾经无情地驱使（现在仍然驱使着）主要资本主义

^① 本书是在经济领域对我们较早的一本书的补充，那本书是：《越南：无休止的战争》，保罗·斯威齐，列奥·休伯曼和哈里·马格多夫合著（每月评论出版社，1971年版）。应补充一句，本书内有三篇社论短文（《对外投资》，1965；《美元和黄金》，1966；和《黄金、美元和帝国》，1968）是同列奥·休伯曼合写的。

国家寻求对世界上尽可能大的部分获得无可争议的统治的那些制度和结构。其它的短文则更着眼于这种脱缰野马似的扩张主义由于最后同它已不再能支配的力量发生直接对抗的后果。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场历史戏剧的终结，远远没有。尼克松总统于8月15日正式确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无疑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以后将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写这篇序言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制度，如果人们当真还能使用这一名词的话，正处于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人们异常一致地认为，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的话，迟早必然是以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为了权力和利润而互相残酷地斗争的几个货币及贸易集团而告终。这能导致什么样的局面，我们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知道得太清楚了：不仅导致了可怕的流血和痛苦，而且导致了伟大的革命和大批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有些人主张说，这个体系的领导者们既然知道这种危险，将设法及时刹车并找出可行的办法以代替过去二十五年的已经支离破碎的结构。它可以采取为欧洲和日本所承认的一种有限制的美国霸权的形式，或者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统治的形式。

不能否认，这是可能发生的。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会有这样一种结果：设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今后二、三十年内有相对稳定的前景（当然不是保证），那就将要求美国统治阶级把它的野心和欲望克制到它迄今尚无任何迹象表明它愿意或能够做到的程度。美国的统治集团一贯未能理解它在印度支那陷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它不但不能摆脱那种自

我毁灭的冒险；而且甚至到现在还让尼克松政府在除了导致更多的灾难外毫无其他成果方面陷得更深。很难指望这样的集团会在寻求解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目前面临的复杂无比的问题方面进行合作。无限的扩张主义似乎已在那些对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负有主要责任的人们心中滋长了一种无限的妄自尊大的情绪。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现时经历的风暴也许只不过是将要到来的更大风暴的一种预兆呢。

不管事情今后将如何发展，我们希望本书中所汇集的短文将帮助读者理解正在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和争论中的各个问题。社会科学的正当任务不是作出预言，但对社会现象的了解则肯定是。

本书中所汇集的文章除三篇外最初都作为未署名的社论文章在《每月评论》上登载过。其它文章的各别著者及最初发表的地点均一一加以注明。编辑工作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只是把一些错误和一些仅仅对最初原文有用的引证删去了。未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或补充。

· 保罗·斯威齐
哈里·马格多夫
1971年11月于纽约

第一部分

公司，扩张和停滞

美国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①

1965年

象浪潮一样接踵而来的繁荣，伴随着越来越高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助长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美国经济已经找到新的力量源泉，现存的弱点能够很容易加以克服。对于这一重新恢复起来的信心，无论是激进的或是保守的评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其主要的原因：(1)新的工艺技术实际上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促进长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同样的作用；(2)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新的竞争诱致对第三世界作广泛的援助和投资，后者又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新的市场；(3)政治上接受福利国家作为走向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以及(4)有一种能用来操纵资本主义经济以避免严重危机的经济的“工具箱”可资利用。

由于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的和占支配地位的成员，用来说明它的成功的这套观点很容易推广而应用到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的和可能的发展中去。当这些观点扩展并巩固以后，它们就往往变成进一步思考和行动的不言而喻的假设(几乎是公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它们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纲领和实践中，进入

^① 哈里·马格多夫写的这篇文章最初载于《社会主义记录，1965年》，每月评论出版社，1965年。

了第三世界政府的经济和政治规划中，甚至进入了社会主义世界某些部分的大胆的新的设想和计划中。

政治纲领和政策借助于适当说明变化了的情况的理论，去适应新的情况，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关于新资本主义的很多想法存在这样的困难：这种想法似乎不是以批判的研究为依据，而是受到要发现“新东西”的（以别于“旧东西”）那种热望的影响，或者受到这些新观点对特殊政治目标的实用价值的影响。

对新近美国经济发展的某些主要特征的考察，提供了对上述论断的支持。美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如下事实要求对新资本主义作更为现实主义的评价：（1）1953年以来任何年度都未能达到相当充分的就业；（2）如果不是因为有军事上的任务就可能有2,000万至2,400万人失业；（3）除依赖于军费开支之外越来越多地依靠补充信贷；以及（4）在二十年的繁荣之后正当入伍年龄的青年的整整三分之一不能达到所要求的健康和教育标准。

工作中的失败

美国经济工作的突出方面是，8%以上的劳动力失业和近10%的劳动力在军队服务或被雇用来满足军事要求。换句话说，民用经济——私人资本、政府和非利润设施——在其繁荣的最高峰时仅能利用82%的劳动力。^①也许有人会说，这不

^① 关于失业的政府材料表明，在1964年上半年有400万人失业。但这些都是全日工作的失业。如果人们考虑到非全日工作的失业者，即被迫从事零星工作的人，失业的全数就达到540万人。再加上140万被掩盖的失业，结果就产

是一个公正的评价，因为这样巨大的军事企业的存在本身就可能阻碍民用经济的扩展。假如存在充分就业和工业设备能力及原料不足，这种论点会是有意义的。但情形并不是这样。不仅有闲散劳动力，而且有多余的机器，有制造更多机器的能力和原料的充足供应——足够达到充分就业，如果经济和政治机关能够那样做的话。

但这还远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每年花费在政府部门称之为“国防”上的 550 亿以上的美金，对经济的其余部分具有连锁反应的作用，正和其它形式的投资和花费有“增殖的”作用一样。据估计，花在“国防”上的每一美元将刺激起 1 美元至 1 美元 40 美分的经济产品。一项粗略的然而却是保守的计算表明，在大约 740 万从事有关“国防”工作的人之外，由于防务开支的经济上的刺激，另外有 600—900 万的人被雇用。^①

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就得出上面提到的多少有点惊人的结论：在 7,800 万的劳动力中，有大约 2,000 万至 2,400 万人，

生了 640 万人失业的估计。（见《为上涨利率所付出的代价》，经济发展会议编，1964 年 8 月华盛顿出版。）使用“被掩盖的失业”这个概念是因为政府只将能工作并在寻找工作的人计算为失业。那些由于社会上工作太少而不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因而就被排除在劳动力以外。例如，在 1963 年的官方劳动力材料中，年龄 35 到 44 的白人的 98% 被计算进民用劳动力内；但同样年龄的黑人只有 95% 被包括进去。年龄在 45 到 54 之间的人，两者是资比较的百分比是 96% 和 91%；年龄在 55 到 64 之间的则是 87% 和 83%。（见《总统的人力报告》，美国政府出版局 1964 年 3 月华盛顿出版。）

由于军费开支而直接间接被雇用了 740 万人的这个估计数字，是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局在《裁军的经济影响》一书（1962 年华盛顿出版）中提出的。

① 对军费开支的增殖作用的估计，是在附注①所提到的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局的报告中提出的。把增殖从金元换算为就业，是使用私人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政府为雇用人员所作的开支）对非政府雇用人数的比例作出的。

或者是未被民用经济雇用，直接间接被用来为“国防”计划工作，或者是由于这些计划的经济刺激而被雇用。虽则如此大量的人未被民用经济所利用可能达到了危机性的比例，但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进行流行的猜测游戏——“可能早就发生了什么情况，如果……”或“将会是怎样，如果……。”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些估计仅仅是为了对美国经济的成功模式得到更为现实主义的估价。

然而在这里，需要就军事开支对商业周期的特殊影响作一番观察。撇开原因不谈，周期的结构就是，生产资本货物的工业是商业起伏波动的主要因素。战后的几次衰退都是依照这个传统的模式发生的。例如，在1957至1958年的衰退中，消费品的生产下降了5%，而设备商品的生产则下降了20%。军费开支在商业周期中的特殊关系，不在于它的规模大小，而在于它集中于发生大部分波动的那些工业这一事实。举个例子说，联邦政府的开支在生产资本货物的工业方面占了整个需要的如下的百分比：引擎和涡轮，20%；金属加工机器和设备，21%；电气工业设备和装置，17%；机器厂产品，39%。^①

这样，军费开支在商业周期的战略性薄弱点上就起着一种很方便的保险网作用。它也起着对商业利润的特别保护作用。商业利润的不稳定和经营商业的基本管理费用有关。一旦销售大到足够偿付管理费用（即不赚不亏的界线）时，利润的增长就比售货额的增加要快得多。相反，如果销售额下降到低于不赚不亏的界线，亏损就会以逐渐增长的势头累积起

^① 《美国工业间的结构，关于1958年投入资金和所得产品的研究报告》，载《当前商业概览》，1964年11月出版。

来。因此,中等程度的衰退能变成严重的萧条,如果关键性的资本货物工业中的亏损迫使许多工厂完全倒闭的话。然而,在得不到军事订货就易受亏损的工业部门倘能给予军事订货,那就有助于支付管理费用,抵抗萧条的损失,以及阻止衰退带来愈来愈大的不良效果。同样地,把军用采购战略性地集中于金属和机器方面,能够保持高价格,从而提高资本货物工业的一般利润水平。^①

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民用经济未能充分利用国家的经济资源,反映在资本投资的逐渐减少的作用上。这样,固定资本(生产者的耐久性设备和非住宅建筑物)的总投资在1947至1957年间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货物和劳务总产值)的10.3%。这一百分比在1958至1964年间下降到了8.6%。^②

这很难说是一种被重要的技术革新,更不用说是被工业革命(不管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或第二次工业革命)所推进的经济应有的情形。必须注意,上述百分比是根据对工厂和设备的总投资计算出来的,即根据需要用来替换陈旧设备的资本货物和纯净新增添的资本额计算出来的。由于替换的需要是不断增加的,所以纯净的新资本(替换需要以外的)的相对的

^① 例如在1958年,联邦政府的开支占了对金属采矿业和制造业总需求的下述百分比:铁和铁合金矿业,12.8%;非铁金属矿业,35.6%;主要钢铁制造业,12.5%;主要非铁金属制造业,22.3%。材料来源同第11页注。

^② 百分比根据美国政府出版局1964年华盛顿出版的《总统的经济报告》中的材料计算而得。材料取自美国政府出版局出版的《经济导报》1964年11月号。

减少会比上面所指出的更大。

还要注意,近年来总投资的较大百分比用于建设办公楼、商业中心、银行等等,而不是用于增加制造新产品或更多产品的生产设备。1957年,对工厂和设备的总开支中只有28%用于商业(区别于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196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4%。^①

这也不是全部情况。在最初的战后繁荣以后,为了扩大商品生产而投入的资本,大部分是用来满足军事需要的。关于这点的证明,见之于军事需求在多数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中所起的特别大的作用——军事需求在这些行业中的扩张率只有通过对新工厂和新设备的投资才能达到。例如,在1958年,联邦政府的购买占重要的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中总需求的下述百分比:无线电、电视和通讯设备,41%;电子零件和附件,39%;科学和控制仪器,30%;飞机,87%。^②

尽管有巨额的军事需要,资本投资的相对重要性还是在减低,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如果人们考虑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能力比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跑得快这种倾向的话。在重大的技术改革当中资本投资的相对弱点也不应该是特别出乎意料的事,考虑到大公司如果有足够的力量,能够用断然手段保护它们的“旧的”资本投资,当它们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的时候。在美国参议院反托拉斯和垄断小组委员会上提出的证词,证实了大公司的潜在力量和战后这种力量的增长。据表明,一百个最大的制造业公司持有1962年全部制造业公司的

① 《经济导报》,1964年11月号。

② 材料来源同第11页注。

淨资本资产的近 57%，而在 1947 年则为近 46%。^①

在另一方面，有一个领域的资本投资的确显示了突出的发展，那就是美国资本的对外投资。在 1947 至 1955 年间以直接投资的形式从美国流出的资本总额是 63 亿美元。在 1956 至 1964 年间这个数目跃到 158 亿美元。^②

分析这一变化和美国对外政策及帝国主义的卷入之间的关系，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对目前的讨论重要的是，投资方面的这种高潮，连同美国政府给别的地国的贷款和补助，有助于支持对美国生产各种设备和金属的需求。^③ 这些工业，如上所述，是最易发生周期性衰退的工业。

尽管机器和其它制品的高水平的输出对美国经济的正常运转是重要的，但要增加或即使保持这种输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麻烦不仅在于其它工业化国家的竞争；这和美国近年来所经历的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有关。

（此处原书排印有错漏，故略去一小段。——译者）

很明显，收支逆差不能在现时各国间政治和经济安排的范围內永远继续下去。然而，美国也许不能削减其财政贡献

① 约翰·布莱尔博士 1964 年 11 月在参院反托拉斯和垄断小组委员会上作证证词。

② 1947 到 1960 年材料见于《收支差额，统计增刊》，修订版，美国政府出版局，1963 年华盛顿出版。1960 年后各年的材料来自《当前商业概览》各期。

③ 在 1958 年，输出占总需求的下述百分比：建筑业、采矿业和油田机械，26.9%；金属加工机械和设备，14%；引擎和涡轮机，14.8%；一般工业机械和设备，13.4%。注意，输出和军事收购达到下述工业中总需求的 33% 到 46%：引擎和涡轮机；建筑业、采矿业和油田机械；金属加工机械和设备；金工车间产品；无线电，电视和通讯设备；电子元件和附件；科学仪器和控制仪器。材料来源同第 11 页注。

而又保持其输出数量。也不能通过对外投资找到解决办法。因为事实是，对外投资的结果美国收进来的比它送出去的钱要多：在1954至1964年，美国公司作为直接对外投资送出去了160亿美元；在同一期间作为由直接投资产生的红利、利息和分公司的利润从国外回到美国的则达约230亿美元。^①

无论是减少对外投资的流出量，或是增加对外投资（除非对外投资以越来越大的速度继续增长，但这是不大可能的），都将不能改善这种局势。因为美国公司从外国抽出的钱超过它们送进去的钱正是这种投资所计算的直接结果。事实上，这种作用是公司进行对外投资的理由。但是尽管这种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它还产生其它问题。当别的国家在偿付美国贷款或对美国投资支付持续不断的利润遇到困难时，它们的补救办法就是试图增加它们对美国的输出并减少从美国的输入。只要美国不能在国内维持足够的有效需求以保持它本国的劳动力充分就业，这对美国就是一件头痛的事情。

依靠信用发展的经济

最初的战后繁荣时期——大约最初的八年到十年期间——在私人市场经济中有其真实的基础：一方面，需要建立资本投资货物储备、建筑住宅和制造耐用消费品（汽车、家用设备），这些方面在多年的萧条和战争中一直被忽视和恶化了；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在“新政”的战时经济控制下积累起来的大量储蓄，私人市场有为购买这些商品提供资金的能力。战后繁荣最初因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支配地位（由于其它工

^① 材料来源同第14页注^②。

业化国家遭到战争破坏)而加强,后来由于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开支而强化和获得新的生命。

繁荣维持了一个时期,带来了在住宅建筑、资本投资和大量消费品生产方面的高峰。但即使这种繁荣,也未能提供充分就业。而且,资本投资的刺激,如前面提供的材料所指出的,在1957年以后开始消失。

1957年以后,在沒有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繁荣的情形下,军事开支作为一种复苏力量走了进来。“国防”开支不断增长,从1957年的444亿美元上升到1963年和1964年每年568亿美元。究竟这一行动是应经济需要而采取的,还是为了“更高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与目前的议论并无密切关系。可是重要的是,这种类型的动力支柱,连同对外投资和政府在外国的军事和经济活动,给予经济以重大支援,也帮助支撑住较脆弱和不稳定的经济部门。

这种强大的刺激还不足以把经济保持在繁荣水平上:事实判明,所需要的是越来越大量的借债。甚至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不越来越依赖借债,就无法尽其政府的职责同时作出其经济贡献。在1957年以前的十年间,州和地方政府每年在其负债总数上平均增加30亿多一点美元。1957年以后,这些政府单位每年增加接近60亿美元的债务。^① 较低的政府组织举债的能力完全不同于联邦政府,因为各州和地方单位并不具有创设和调整货币和信用供应的权力。它们的负债能力最终受征税能力的限制,而它们的征税能力是远远比不上联邦政府的。州和地方政府开支的增加,如近年来的情形,越

^① 《总统的经济报告》，1964年。

来越依赖于更大比例的债务，在这范围内，债务扩张的内在限制将阻止这种类型的政府活动的扩张。

虽然可以设想，低级政府财政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能够通过美国公共财政和政府结构的彻底检查来加以解决，但这样的解决办法，对在资本主义结构范围内运转的私人经济来说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些基本事实，问题就会变得更清楚。私人 and 团体(公司、农场和个人)所负净债，在1957年以前的十年间，每年平均增加320亿美元。1957年以后，平均每年增加50%——一年接近480亿美元。^①这种增长的一部分是由于较高的价格水平。但这是次要因素；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和全部私人(非政府的)总产值相比较的债务的相对的增加，总产值也反映着较高的价格(见下表数字)。^②

在这里危险不是债务本身。信用是一种帮助复杂的经济平稳运转的有用的财政工具；它对于不断扩大的经济结构特别有润滑作用。一个社会，如果生产性财富不断累积，并在此基础上经济能保持生产和投资的不断增长，那么信用能起到陪衬或辅助的作用。但是当一半停滞的经济继续增加其债务负担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这种经济只有靠越来越大剂量的信用才能继续保持比较平稳的运行。

其所以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是由于存在着双重的危险。第一，创设信用的银行制度中的弱点，更容易产生经济每况愈下的结果。第二，为了支持越来越大的债务，最终必须获得更大的利润以便偿付债务及附加的利息。在停滞的经济

① 《总统的经济报告》，1964年。

② 同上。

中,更大的利润不能来自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只能靠削减工资和薪金的份额。

年代	私人生产总值 (单位10亿美元)	私人净债 (偿付后留下)	债务占私人生产 总值的百分比
1945	178.4	139.9	78%
1950	263.8	250.9	95%
1955	363.5	402.5	111%
1960	455.3	588.4	129%
1963	526.7	752.9	143%

在这种情形下的潜在的困难是,挣工资和薪金的人需要不断地增加他们的收入,因为他们也是在花钱和靠着更多地使用信用来支撑经济。自1960年至1963年,以私人住宅作抵押的债务增加了40%,从200亿美元增加到280亿美元。在同一时期,一至四家单元的新住宅建筑在价值方面无任何增加。观察这些数字的另一方法是,在这四年中,新的私人住宅建筑活动不满720亿美元,而新的抵押却增加了950亿美元。^①这个奇怪的矛盾背后的原因无疑是:(a)财政机关愿意在较宽条件下贷款,这种条件也反映着膨胀了的、投机性的价值,以及(b)消费者希望或需要保持购买的狂热步调,这种步调只能靠扩大债务才能保持。

类似的情况见之于耐用消费品市场更多地依赖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信贷。自1960年至1963年,给予消费者的每年平均分期付款信用,达到所购买的全部耐用消费品的88%。自

^① 《抵押债务的新广度》,技术资料第十五号,全国工业会议局1964年纽约出版。

1947年至1950年则是69%。^①

所有这些借款的纯粹效果显然是消费者收入的进一步消耗。在1951年，消费者的收入的14%用来还债（还本和付息）。在1963年，这个数字是21%。^②对支付债务所占收入的百分比的最大限度不能规定任意的限界。但总是有一个最大限度的。只要存在这种最大限度，对于要求越来越大量的信用以保持继续前进的经济，总是会有最终的限制的。

持续失业的根源

美国近来经济发展的一切特殊刺激物——军费开支、对外投资和扩大债务——合在一起都未能在解决持续失业的问题上前进一步。完全相反：失业的趋势从1953年以来一直是上升的。也看不到这一趋向在未来年月里将扭转过来的任何迹象。如下述材料所表明的，达到充分就业的问题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能够用来了解问题的广度的背景材料如表一所示。

表一 劳动力和就业机会

年 代	(增加数)	
	劳动力总数 (单位百万)	就 业
1930—1940	6.1	2.0
1940—1950	8.5	12.2
1950—1960	8.4	7.0

① 《总统的经济报告》，1964年。并非所有的分期付款信用都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约有三分之二的分期付款信用特别用书面注明购买耐用消费品。然而，其余信用的相当大部分也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正如不包括在上述数字中的部分非分期付款信用那样。

② 1964年6月17日《华尔街日报》。

1960—1970(预测)	12.6	—
1970—1975(预测)	7.3	—

材料来源：1964年1月提交国会的《总统的经济报告》和1964年3月提交国会的《总统的人力报告》。

本表的第一行给萧条年代对失业的纯效果提供了一个大概的图景。和以后的年代相比，劳动力的增加超过600万，相对地说是小的。劳动力是由政府机关计算正当工作年龄并正在寻求工作的人数来决定的。由于用来计算劳动力的技术有问题，600万增加数可能说得少了，因为工作机会的缺乏使许多人打消了寻求工作的念头。就算数字没错，图景的轮廓对1930至1940年这十年说来也是清楚的。在就业方面的200万的净增，要满足寻求新工作的人数(即使是保守的估计)也短少400万。这就是说，在1940年，比在1930年增多400万失业者。

在第二个十年中，由于战争和战后初期的需要，方向完全反了过来。就业的增长，大到不仅给所有的新劳动者提供工作，而且甚至消除了以前十年中产生的失业。因此，在1950年，失业的情况大致回到了1930年的水平。

在随后的十年中，劳动力继续增长了和在1940年至1950年间大致相同的数量。但在这些年里就业的增加放慢了速度。在这十年的部分时间里，如上所述，经济有过强大的上升，结果1953年官方宣布的失业率下降到低于3%。应该指出，即使是这一成就，也是由于武装部队增加了约200万人而得到的。(政府的估计是建立在“民用劳动力”概念之上的。这样一来，武装部队就被排除在有关劳动力和失业的统计材料之外。)由

于后来经济增长的一般比率放慢，“民间”失业的低比率是为时不长的。整个说来，这十年的纯效果是产生了更多的就业。

现在我们讨论到当前和未来失业压力的核心问题啦。在1960年至1970年，劳动力一定会增加1,250万——即比以前两个十年多50%。关于劳动力扩大增长的解释是很简单的。劳动力的初期增长受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下降的出生率的影响。在大萧条年份出生率特别低。结果五十年代劳动力的增长就相对地低，而在五十年代中期尤其如此，这时在极度萧条年份出生的儿童达到了工作年龄。

今天我们正开始受到伴随四十年代改善了的经济情况而来的出生率增长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战后最初几年中所谓出生率爆炸的结果，在今后五年里劳动力增长的数量甚至将更大。这种劳动力的不平常的大增长，到1970年也不会结束。从表一最后一行可以看到，从现时的人口推测，有理由预期劳动力在1970年至1975年间将增加约730万人。这五年的增加数几乎和1950年到1960年十年间的增加数一样大。换句话说，1970年至1975年劳动力将以比1940年到1960年加倍的比率增长。

作些简单的计算，我们就能了解问题的广度。要在1970年达到相对充分的就业，和1960年相比较，就必须增加近1,500万个新职位；1,260万个职位给净增的劳动力（见表一），再加上大约220万个全日工作的职位以便将失业率下降到3%。^①无论是六十年代早期的经验，或是五十年代的经验，

^① 这一计算并不假定武装部队在数量上作任何减少。失业数字作了调整以便将非全日工作的失业者考虑在内，但不包括被掩盖的失业者。

都不能使我们正当地预期就业方面会有这样大量的增加。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政府大量介入时期，以及受益于这种政府介入的直接余波的时候，美国经济才表明有能力在十年里创造出接近1,500万个新职位。即使照样完成增加1,200万个职位，到1970年底也会留下550万个失业者。根据当前的发展情况看来，更现实的态度是预期将有1,000万个失业者，纵使美国经济在这期间能避免一场重大的经济衰退也罢了。

这一分析突出了战后美国经济的一个不寻常的特征。急剧的资本积累时期同劳动力增长比较缓慢的时期巧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已经——并在往后一段时间内显然将继续——转向反面：资本积累的减缓伴随劳动力的迅速增加。后一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在表二中有清楚的说明。

表二 公私需求所产生的工作职位的增长(单位百万)

项 目	1957	1963	1957—1963 增加数
非农业雇用人员总数	52.9	57.2	4.3
减去政府雇用人员	7.6	9.6	2.0
等于:私人非农业雇用人员	45.3	47.7	2.4
减去由于政府向企业 购买而产生的工作职位	5.9	6.7	0.8
等于:不依赖于政府开支 的工作职位	39.4	41.0	1.6
减去非利润机关的雇用人员	2.6	3.3	0.7
等于:由私人需求产生的 工作职位	36.8	37.7	0.9
减去核算出来的自愿的非 全日工作职位	1.7	2.3	0.6
等于:由私人需求产生的 全日工作职位	35.1	35.4	0.3

注意: 为了消除小数,未将尾数计入总数。政府指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上述材料不包括自我雇用的①在内。

材料来源: 1964年3月提交国会的《总统的人力报告》。

① “自我雇用的”指小业主、个体经营者等。——译者

从1957年开始——我们选这一年作为转折点——到1963年结束，增加了430万个非农业工作职位。虽然不是大到足够防止失业的增长，这一增加在数量上却是引人注目的。那么，这些工作职位是从哪里来的呢？所增加的工作职位几乎有三分之二（280万个）是直接间接由政府活动引起的。如果除去由非利润机关（医院、大学，等等）产生的工作职位，结果只有90万个工作职位是由私人市场活动产生的。甚至这还不是全部情况。这些工作职位中有许多是非全日工作的职位。如果把这种工作职位不计算在内，那么就只有30万个工作职位是私人经济经过六年之后产生的——这些年份大多是经济上升的年份。^①

私人工业不能提供充分的工作职位，仅仅部分地是由于生产力和自动化的提高之故。表三表明了正在增长的生产力的结果。

表三 制造业中生产工人的生产力

选用年份	制造业的生产指数 (1947=100)	制造业中雇用的生产工人 人数 (单位千人) (1947=100)	生产工人 指数 (1947=100)	生产工人 每人产量 (1947=100)
1947	100	12,990	100	100
1953	124	14,055	108	115
1957	144	13,189	102	141
1964(十个月平均数)	196	12,813	99	198

资料来源：生产指数根据1964年1月提交国会的《总统的经济报告》和美国政府出版局出版的《经济导报》，1964年11月号中的材料计算而得。关于就业的材料见1964年3月提交国会的《总统的人力报告》和美国劳动部出版的《关于劳动力的每月报告》1964年10月号。

^① 照这样分类的1964年材料在写本文时尚得不到。初步的材料表明，私人市场项目下的就业在1964年有了改进，但不足以改变主要论点。如果把1962年当作最末一年，私人市场项目下的就业就会表明1957年以后的绝对下降。

如上表所示，在1957年^①和1964年间，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但生产工人的数目则依然未变。尽管如此，产生问题的还不是生产率：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这一事实，即生产没有赶上生产率的发展并跟它齐步前进。私人经济在提供工作机会方面的失败，在于它未能——尽管政府作了勇敢的“诱导的”努力——进行足够的投资并充分地发展以便和增长的生产率和增长的劳动力齐头并进。政府的活动也没有表明它有能力和日益增加的劳动力和日益增长的生产率，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以外。

贫 困 病

长期经济繁荣的性质以及它的变化模式，充分反映在不断存在的大规模的贫困中。因为尽管三十年代的“新政”进行了重要的改革，“福利国家”得到政治上的承认，生产能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以及国内市场有了很大的扩张，但是全国有不少于五分之二的人们仍然生活在贫困中或生活在一种经济上被剥夺的状态中。^②

自然，经济的巨大增长也会带来贫困的急剧减少。但是这一分析所应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减少贫困方面的显著减缓。当我们看到贫困的变化模式类似资本投资的变化模式时，是不应感到惊奇的。贫困的巨大减少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

^① 1957年疑为1947年之误。——译者

^② 这一叙述和随后关于贫困的细节，采自经济发展会议1962年4月华盛顿出版的《美国的贫困和经济剥夺》。该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包括有实业家和全国工会和农业组织的领导人。该会议的研究和分析是在总统的经济顾问会议前主席利昂·H. 凯塞林的指导之下进行的。

代——战争年代及战后初期。从大萧条的末尾(1935—1936)到1947年,生活贫困人民的总数每年平均减少4.8%。在1947至1953年间——当时失业率较低,资本积累仍然比较高,并且经济又受到朝鲜战争的再刺激——生活贫困人民的数目每年减少的比率下降到2.7%。而在1953至1960年间——当时失业开始上升而维持繁荣要求进一步的人为刺激——贫困的每年减少比率下降到1.1%。按后一种变化比率计算,要在美国消除贫困就需要再花九十年时间——这是在一个具有资源和能力现在就立刻消除贫困的国家,如果社会为这种目的组织起来的话。

要确定在富裕的美国什么是构成贫困的因素,必然会包含某些任意的界说。讨论这些界说将需要过多的篇幅。说明一点就够了:不同的权威近年来所作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若干研究虽然在细节上有分歧,在贫困的程度上却存在实质性的。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经济发展会议所作的研究《美国的贫困和经济剥夺》(见前页注),该项研究使用了美国劳动部关于城市工人家庭预算的调查来决定贫困的标准。此外,该会议的报告采用了“经济剥夺”的概念,它包括生活高于赤贫水平但低于劳动部认为是“适度的和过得去的”工人家庭预算的人们。

会议关于1960年美国人民收入情况报告的简单摘要如下:3,400万有家庭的人和400万无所属的个人(即在经济上不属于家庭单位的人)生活在贫困中;3,700万有家庭的人和200万无所属的个人生活在经济剥夺中。总共7,700万人构成1960年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二。

我们不去详细考究这一贫困的社会原因，但这里值得提到持续贫困的一个结果。面对二分之一的应征人员因不适于服兵役而被拒这一事实，肯尼迪总统任命了一个工作组来研究美国青年的健康和教育情况。这个工作组发现，全国年满十八岁的青年有三分之一，如果接受入伍检查的话，将被发现为不合格。这些人中，一半会因为医学上的理由被拒。其余的人会因为不能达到至少八年级水平的教育标准而不能入伍，而这类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不能达到五年级水平的教育标准。

总统的工作组在其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结论说：“尽管许多人因为在现时的知识状态下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缺点而不合格，但大多数人看来是不适当的教育和不充分的医疗服务的牺牲者。”^①然而，该工作组没有指出他们所提到的青年是在这个国家的繁荣高潮和历史性经济成就的年代中出生和长大的。

那些相信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范围内消除贫困的人们，把贫困问题看作主要是社会福利问题。他们认为较好的学校教育、住宅、医疗照顾，更多的政府开支来提供工作，就能消灭贫困。他们（甚至最精力充沛的改革家）所不理解的是，贫困本身是繁荣的产物。经济制度在运转时就形成贫民的后备军并从它得到好处。在迅速扩张时期和战争时期，社会中最大限度的人群可以用来从事工作和作战。在这种时候贫民的后备军可能减少，而当经济发展放慢，当技

^① 戴尔·L·希斯坦德著：《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的就业机会》，1964年纽约和伦敦出版，第114页。

术革新排挤工人,以及当发生经济衰退的时候,这种后备军终于又被建立起来。而且,贫困的根子同经济制度的运转本身交织在一起,后者包括:工业的结构、分配方式和形成价格及利润的方法。

黑人后备军

虽然贫民的多数是白人,但是贫困集中于黑人的情况和在先进的美国文明中怎样利用他们的独特方式,为贫困所起的机械作用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实验说明。

黑人生活在社会最低的经济水平上,可以利用来作为劳动力缺乏时最后的后备军。在近期历史中,对黑人说来最重要的经济突破发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劳动力缺乏一缓和,黑人的进展就放慢或下降。甚至在繁荣时期贫困所起的机械作用也被提了出来,作为近来一项研究的结论之一:

“白人工人抓住新发展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劳动力资源缺乏,工资水平高,有发展前途,技术是最先进的,工作条件是最现代化的。但是当经济继续扩展,更新的领域出现的时候,原来的领域对白人工人来说就似乎越来越少吸引力了。最后,一度是新的领域停滞了,白人工人不愿进入这种领域。纵使这些领域中的工资可能增加很快,但另外一些领域正在迅速扩展,使用更新的技术,和后者的更新的、需要更高度熟练技术的职业比起来,这些领域的工资现在是低的了。在这时候,黑人获得了这些工作,这和他们以前所能从事的工作比较起

来是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的。现在来说是较旧的领域中的工作条件和工资经过一段时间虽然可能得到改进，但它们是由较旧的技术和惯例所决定的。而且，较新的技术很可能产生减少人力需要的结果。因此黑人的最新和最好的工作机会结果往往是很不牢靠的。黑人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技术职业中所获得的利益，现在正越来越容易受到近来技术变化和市场变化的影响。”^①

黑人在经济和技术脱节时的减震作用，同在工业上一样在农业上也显露出来。农业上技术的发展，和战争需要相联系的工业化大农场的高潮，以及政府补助的规模，产生了农业人口显著下降的结果。虽然这意味着，除其他事项外，大量租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转移，但冲击主要落在黑人身上。这样，白人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百分比从1940年的81%增加到1960年的85%，而同一时期黑人的百分比则从19%下降到15%。^②

同样地，当失业增加时，黑人的失业人数增加得比白人快。关于失业的官方数字表明，黑人在1963年的失业率，和白人的5%相比，接近11%，即相当于白人失业率的一倍多。随着经济发展的减缓，失业范围在不断扩大——在1948年黑人失业率比白人失业率高达63%。同样情况适用于少年的失业。1963年少年失业率男性黑人是25.4%，白人是14%；与此相比，1953年男性黑人是7.1%，白人是6.3%。^③ 尽管就

① 戴尔·L. 希斯坦德著：《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的就业机会》，1964年，纽约和伦敦出版，第114页。

② 根据希斯坦德书中的材料计算而得。

③ 《总统的人力报告》，美国政府出版局1964年3月华盛顿出版。

业机会在 1964 年有所增加，但 1964 年 8 月发表的一次政府的特别研究估计有三分之一的黑人青少年，包括那些已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没有工作。

两个不同世界的实际结果可以在表四中看到。(材料最后一栏是对非白人说的，其中 90% 以上是黑人。)两种类型的显著不同，使我们联想到一个帝国中心和一个殖民地属国之间的差异。这种类比可以扩大到许多不同方面。主要之点是，种族歧视的消除，即使它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也罢，在黑人人口的收入分配的任何根本改变当中，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因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并不是种族歧视。制度化的歧视，有助于造成黑人贫困的特定形式并增加许多白人的特权。但总的说来，歧视是种手段——从美国经济和社会史的角度看——用来保持特种的贫困和特种的劳力后备。

表四 白人和非白人1963年收入分配

每年的货币收入	家庭的百分比	
	白人	非白人
2,000美元以下	9.0%	25.5%
2,000至3,999美元	15.1%	31.1%
4,000至5,999美元	20.1%	19.6%
6,000至9,999美元	34.3%	18.1%
10,000美元以上	21.5%	5.7%
	100.0%	100.0%

注意：这些材料只表明货币收入，不包括非货币收入，如农场上生产的食物消费或供应给农业工人和服役工人的膳宿的价值。

材料来源：《消费者收入》，《消费者人口报告》P-60辑，第43号，1964年9月20日美国商务部出版。

和白人贫困的情形一样，黑人贫困——由于其极端性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是工业和经济结构的一种功能。消除

歧视将不会消除如象失业、临时的和间歇的工作和低工资职业等贫困的主要根源。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工作训练和平等的机会,只可能产生受过较好的教育、较好的训练和更“平等的”失业和低工资工人。因为贫困的根源是由市场制度本身的运转情形引起的:工业的结构和分布、分配方法、价格结构以及积累和使用从工业和土地所有权产生的利润的方式。经济就是这样运转来产生和再产生贫困和经济剥夺的。

这一命题的意义,甚至领导着为争取黑人的自由平等而进行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先进团体都还没有很好地理解。这种理解的缺乏,无疑部分地是由于接受了关于新资本主义的神话并从而相信一个好的和明智的政府能有所成就。

对表四作更仔细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随便察看一下两栏的数字,就会以为从纯粹统计学的观点出发,两类人之间的平等,只有把大量的白人从经济的阶梯上推下去,让地方给非白人,才能实现。虽然一个建立在社会正义之上的社会也许能沿着这条路线取得重大的进展,但很明显,在一个按照财产所有权和工作技能(对此,教育和长期训练最重要)给予公民以报酬的社会里,朝着这样一个目的取得的进展必定是极小的,如果能够取得任何进展的话。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让我们假定一个决心进行改革(然而实际的改革)的社会。白人现时的收入分配将不受妨碍。这必然意味着接近500万黑人家庭的收入分配将不变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黑人家庭数目的增加(比方说,每年增加2%),黑人将被给以特别的特权以便在获得较好工作方面胜过白人。因此我们假定给予黑人的新工作和新收入将使得黑

人家庭的 24% 每年收入在 1 万美元以上,而不是表四所列的 5.7%。只有稍多于 6% 的新工作会使每年收入不足 2,000 美元,而表四所列则为 25.5%。在我们假设的世界里,在那些中间等级的工作机会方面也将发生同样的重大变化。所有这些假定的实际结果就是,黑人的工资分配要和白人平等,会仍然需要一百年。

当然,我们在前一段文字里只不过是玩数学游戏,以便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历史的事实是十分清楚的。产生表四中所示材料的同一人口调查局研究也提出了整个战后时期的比较性的收入情报。研究这些材料就会看到,尽管有近年来的动乱和关于进步的谈论,黑人收入和白人收入相比,其相对的地位并未发生变化。在 1948 年,非白人家庭的中等收入等于白人家庭中等收入的 53%。在 1963 年,这个百分比仍然是 53%。要对这种不平等作出重大的突破,要在不远的将来(不是从现在起一百年以后)取得结果,就把需要一种新型工业化和需要对社会物质财富进行一次再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样的变化将会和产生并不断更新贫困根源的私人市场经济的运转发生直接冲突。如果社会的目标是黑人白人平等和消除贫困,那么问题就不能在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或通过黑人对那新资本主义的适应来求得解决。如果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能起到教员的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要实现平等,黑人必须走争取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道路。从具有如此重要性的问题的角度来看,主张要对现存经济结构作即使是彻底的修补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近乎上一时代的不切实际的和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观点了。

对外投资

1965年6月

帝国主义有许多方面的特点，的确多到不大可能将其所有的方面都包括在一个简洁的定义或公式中。所以当这个多头的怪物正得意扬扬地在刚果和南越展示它的极端丑恶的嘴脸的时候，提请大家注意它的某些不很明显的特点和影响，可能是有益的。这有助于我们避免采取过分简单化的观点，并牢牢记住现在在非洲和亚洲展现的那些可耻事件的真正的根本原因。

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包括所有自称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对外投资的特殊重要性。毫无疑问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重要的是正确地理解这现象，而不被在帝国主义辩护士的武库中占重要地位的某些论点所欺骗。

有时有人这样主张(也许更常见的是视作理所当然)，即认为对外投资指的是把资本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而这资本本来是可以在前者的国家内投资的。进行投资的国家因此就被认为将其剩余产品(储备)的一部分交给接受投资的国家自由处置，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后者的经济发展。作为报答，投资国家从接受投资国已经增长了的生产中得到利息或红利，并且最后使它的资本得到偿付。据说每一方都能

从这一安排中得到好处。

两个国家间有这样一种关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今天世界上有相当多的事例说明这种关系是实际存在的。比方说，在苏联和古巴之间。苏联贷款给古巴，古巴用它来加强它的生产力。这些贷款利息很低(2.5%)，十二年内偿清，期限届满时，无论是增加了的生产力或是当时的产品都完全由古巴自由处置。然而，这决不是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对外投资的方式：作为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概括，上面所扼要叙述的理论是个弥天大谎。对外投资的结果同这种理论所声称要达到的结果恰恰相反——剩余的资本被转移到了投资国家去，而不是从投资国家那里转移出来。

这种转移的做法不尽相同。有时，投资国家最初把购买力转移到接受投资国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情况决不会总是这样。最初的投资可能只是专利权之类的东西，而实际资本则在当地筹集。例如，加拿大的福特汽车公司就是这样搞起来的。美国福特公司以专利权换取了控股权，而加拿大人则为其余那部分股份筹集款项。经过若干年，企业大大地扩展了，于是加拿大的股东们就用在加拿大赚得的利润将企业买下。

最初的投资也许实质上是由“东道”国给予(通常是通过贿赂)的特许权构成。这显然就是各大国际石油公司巨额对外投资的基础。也许在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候它们曾将一笔小额资本送往国外。如果是那样，它和它们的国外子公司赚得的大量利润比起来也算不了什么。这些利润既是未来在国外的一切扩展的资金来源，也是潮水般地流向美国和西欧的母公

司汇回款项的来源。这项汇款数额之大可以从11月19日《纽约时报》所载的下述报告推测出来：

“也许任何美国工业在国外的的发展都比不上石油工业。大陆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艾拉·H·克拉姆昨天指出了这一点，当时他说到：‘在过去四十年中，我们国家在世界石油生产中所占份额从47%下降到35%，但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所占份额的百分比则仅仅从大约85%下降到71%。’他补充说，美国公司占有非共产主义世界经证实的石油蕴藏量的大约63%。

“克拉姆先生说，近年来海外石油投机事业的收益方面赚了很大一笔钱。他指出，从1957年到1962年，美国石油公司在外国花了42亿美元，而汇回国内的则达76亿美元。‘这正好占有所有工业汇回美国的收益中的51%，’他说道。”

这种为了美国大公司(及其股东们)的利益从世界的其余部分榨取石油和金钱的勾当，和把对外投资描绘成帮助穷国发展以换取适度的补偿的过程的那种田园诗般的图景，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显然一点也没有。这里牵涉到国外生产的巨额剩余被转移到美国的问题。把成10亿美元交给美国，完全不是为了让付款国能够获得在它们境内的资产的所有权，而是使美国大公司的财产得以不断扩张。

石油会不会是一种特殊情况呢？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没有人会否认英国对外投资的全盛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半个世纪。根据可靠的估计，在1870到1913年间，英

国资本的净输出是 24 亿镑，^① 约相当于 120 亿美元，而当时的美元购买力比今天的美元大两倍还不止。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对外投资为数也是不少的。但这真正表示了资源从英国转移到接受资本的国家去了吗？很明显，答案取决于在这个时期内这些投资的收入中有多少流回了英国。根据同一权威的材料，其总数是 41 亿镑。^② 换句话说，从英国流出的资本只有流回英国的收入的大约五分之三。或者再换个说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十三年中，英国从国外榨取了比它对国外的投资多 17 亿镑，并在同时不断地扩大了它在国外的资产。究竟谁在“帮助”谁呢？

就美国来说，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 1950 年以后的官方数字。^③ 在那一年，美国公司的全部直接国外资产（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形式）达 118 亿美元。到 1963 年，它增长到 406 亿美元，十三年内惊人地增长了 288 亿美元，或 244%。按照官方数字，其中 174 亿美元是美国的纯资本输出。但在这里我们又必须考虑到从国外流入美国的直接投资的收益，而在上述时期内这项收益达到不少于 294 亿美元。换句话说：在 1950 到 1963 年时期中，美国公司从国外榨取了比它们对国外的投资多 120 亿美元，而同时又使它们的国外资产增添了 288 亿美元。

这种事情怎么会成为可能的呢？

① A. K. 凯恩克斯，〈国内投资和对外投资，1870—1913〉，1953 年英国剑桥出版，第 180 页。

② 同上。

③ 见《现代商业概况》（商务部出版），1954 年 11 月号，和以后每年的 8 月号（其中都有一篇年度调查的文章）。

从根本上说，答案就是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分支机构特别能赚钱，部分地是因为它们能垄断和操纵市场，部分地是因为它们通过应用比较先进的美国技术能以比当地竞争者较低的成本从事生产。这些利润，包括为了逃税而美其名曰折旧或损耗的大宗款项，就是汇回美国的巨额汇款的来源，同时也为在当地扩展提供了所需要的大部分款项。商务部现在每年公布的对在采矿、石油和制造业中直接对外投资的一项所谓资金来源和使用分析中指明了这一点。在最后的三年(1961至1963年)中这些行业的国外子公司总共支出了272亿美元，细分如下：^①

财产、工厂和设备·····	44.1%
存货、应收票据和其它资产·····	25.9%
付出的收益·····	30.0%
合计·····	100.0%

在账目的另一边，这同一总数272亿美元的来源如下：

利润·····	42.0%
折旧和损耗·····	26.0%
来自国外的资金·····	18.6%
来自美国的资金·····	13.4%
合计·····	100.0%

在这里，来自美国的资金所占比重相对地少已十分清

^① 所有的数字均采自弗雷德·卡特勒和塞缪尔·皮泽，《美国公司加速它们在国内外的资本开支》，载《现代商业概况》，1964年10月号，第12页。

楚：显然，大多数国外的美国企业，现在能够依靠从企业内部产生的资金和企业之外的当地资金来源来满足它们自己的财政需要，而且同时还能向在美国的母公司输送成 10 亿的美元。“来自国外的资金”项下的巨大而迅速增长的重要性——在 1961 年和 1963 年间它增长了 50% 以上——也是值得注意的。就其大部分来说，它是指向当地银行和资本家的借款，并意味着美国的控制权已超出了美国所有权的范围之外。

这些关于投资和收益的数字，远远不能完全说明美国在国外的经济渗透或者各母公司从它们在国内的子公司得到的收益数额。许多完全属于外资所拥有的公司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美国工艺技术和专门技能，而美国投资恰恰大量集中在接受投资国家的那些使用最现代的和最复杂的工艺技术的经济领域，这就使单纯的数量材料大大地不足于表达美国在这些方面投资的重要性。

关于子公司除利息和红利以外上缴给母公司的其它款项，据官方的调查报告说，各种经营管理业务的费用、使用特许权、版权以及类似的无形财产的费用都有极其迅速的增长。到 1963 年，由国外子公司上缴给在美国的公司的这种支付每年总数达 6 亿美元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大约 20%。当然，还有从来都没有记录下来种种非法支付的——例如，由操纵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交易的价格而产生的支付，而在那些设法限制从国外汇回利润数量的国家里采取这种做法是很普遍的。

一个恰当的事例

让我们先撇开全球数字和普遍性的问题不谈，来较详细地考察一下美国对外投资的一个具体事例——塞浦路斯矿业公司(以下简称塞矿)——吧。由于若干原因，这个企业既是很有趣又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期间，它是美国在天然物生产业的对外投资方面的典型。其次，它正在改变它的性质并接近于变化多端的多国公司类型了，而多国公司今天在对外投资领域越来越占有支配地位。第三，由于它在塞浦路斯的营业看来行将结束，所以我们至少可以通过这个事例初步估价一下对外投资对接受投资的国家的影响。最后，在这个事例中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谁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受益者。除这一切之外还须补充说明一点，塞浦路斯近来是多事之日，凡是有助于说明当地局势和在该地区起作用的力量的报道都是特别适时的。

下面的说明是以1964年10月10日《商业周刊》上登载的一篇报道(《产生大量冷现金的热地点》，第102页至110页。)为根据的。这篇报道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要是以前我们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本来是会提出这些问题的)，但它能回答主要的问题，并让我们有可能作出对别的情况说来似乎是相当可靠的推论。

塞矿的总公司设在洛杉矶，直到最近它完全靠塞浦路斯这个地中海岛屿的铜矿赚钱。公司成立于1912年。一个得到西利·W·马德上校支持的探矿者来到了斯库里奥蒂萨矿，这个矿曾经由古罗马人开采过并在一千六百到一千七百

年以前被放弃了。最初的投资好象就是贷予探矿者的贷款。至于有否从美国提供了追加的资本使该矿投产则不清楚；无论如何，如果最初的资本是从美国流到塞浦路斯，不久也就反过来了。公司在马德上校、他的儿子哈威·马德和他的孙子、目前的总经理亨利·马德领导下繁荣起来。今天塞矿是塞浦路斯最大的雇主，雇用着2,400人(这个岛的总人口约60万人)；毫无疑问，进行这种扩张和为了其它目的(下面我们将要予以讨论)所需的资本都来自塞浦路斯的经营所得的利润。

塞矿历史上的转折点是随着三十年代初期马弗罗沃尼矿的开采来到的。被誉为世界最富的铜矿带之一的马弗罗沃尼(以下简称马矿)矿也生产相当数量的铁和硫磺。马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全关闭。后来该矿利用非常低的费用(在塞浦路斯工资是低的，同普通的铜矿消耗量为95%到99%相比，该矿的消耗量只有12%到15%)，并利用了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金属价格的坚挺，从此马矿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宝库。战后从塞浦路斯的经营中所得的纯利润约达1亿美元，其中80%来自马矿。遗憾的是，《商业周刊》并未提供汇回美国款项的相应数字，但我们从报道中提出的某些事实可以作出推论，差不多全部纯利润准是汇回美国了。母公司持有的流动资产(现金和政府证券)从1946年的450万美元增加到1951年的2,100万美元，而这当然没有把已支付的红利计算在内。目前，随着马矿行将在1965年枯竭，塞矿每年仅花费大约50万美元来改善厂房并准备对长期闲置的斯库里奥蒂萨矿进行露天开采。为了以上目的所需的资金可能也来自利润，但在折旧和损耗项下开支的可能性更大。换言之，所有

一切都表明塞矿的政策就是吸干马矿并把收益送回总公司。

他们是怎样处置这笔巨额金钱的呢？

一部分分配给了股东，使得马德家族除了其他活动外还能够保持。

“其作为南加利福尼亚慈善事业的台柱之一的地位。在克列尔蒙特的哈维·马德大学——‘它是靠马矿建立起来的’——花了亨利·马德不少时间。其它捐助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哲学楼，给波孟纳和克列尔蒙特两市镇的赠款，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工程楼。”（前引《商业周刊》，第110页。）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从塞浦路斯得来的利润使塞矿公司能在美国和海外建立起一个完全新的经济帝国，而且一切迹象表明，它将沿袭经营马矿的传统，装满塞矿的保险柜并为亨利·马德及其后裔经营他们的好事业提供所必需的资金。这个新帝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马矿的利润达到顶峰时开始拼凑起来的，当时已经明显看到这个宝库不久会临近枯竭。在塞矿的新冒险事业中（它常常是和其它大公司联合进行），《商业周刊》列举了以下各项：

- 在秘鲁的一个铁矿公司，预期不久将成为塞矿最大的收益来源。

- 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铜矿公司，具有两倍于塞浦路斯矿的生产能力但质量较差因此利润较低。

- 巴拿马的一个航运公司，计划在不远的将来给它的船队增添一艘6万吨能运载矿物和石油的船，其价值为750万美元。

- 对在俄勒冈州和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木材和木材厂投资。

- 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森林。
- 在夏威夷的一个水泥厂。
- 在荷兰的两个化学工厂。
- 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住宅建筑公司。
- 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开采铁矿的公司。

由于塞矿准备离开塞浦路斯——斯库里奥蒂萨矿预期不会存在到七十年代初年以后——因此它正在作为一个前途十分光明的、经营范围多样化的多国公司而重新出现。塞浦路斯本身怎么样呢？

象大多数进行大量对外投资的其它美国公司一样，塞矿也自夸它的进步的劳工和社会政策。它支付按塞浦路斯标准说来是高的工资(1 英镑 13 先令至 2 英镑一天，相当于 4.62 美元至 5.6 美元)，它是这个岛的最大的纳税者，并“曾花了成百万的钱用于住宅、学校、娱乐设备、一个现代化医院、并为儿童提供牛奶和酸奶”。《商业周刊》引述塞矿副总经理的话说：“我们在这个岛的长期历史中可能只是一个插曲，但我们正在试图建造一些值得留下来的东西。”(前引，第 106 页。)

这些话在一个熟悉事实而不被“自由世界”的谎言所迷惑的塞浦路斯人听起来该会感到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呀！塞矿将“留下”的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是 2,400 个失业者。他们住在他们的屋子里，送子女和病人到公司办的学校和医院，使用他们的娱乐设备等等，还能继续多久呢？也许只要塞浦路斯政

府愿意用它已经减少了的税收来补贴这些设备——那就是说，以牺牲岛上其余的人的利益为代价——就行吧。这样一来，塞矿慷慨赏赐的“受益者们”难道就不会愤怒地回想到塞矿的的确确不过是“这个岛的长期历史中的一个插曲”——而且在许多方面是这个对灾难并不陌生的历史中的最富灾难性的插曲吗？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塞浦路斯能借到象古巴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年利2.5%为期十二年的贷款那样的资本来开发马矿，它今天的情形又会是怎样呢？也许贷款在很久以前就偿清了，而投入到马德慈善事业和塞矿新帝国的1亿美元早就能被用来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和能迅速扩展的经济体系了。而哈维·马德大学在另一名称下也许早就可以成为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宏大教育机关之一了。

马矿被挤干了，塞浦路斯的好机会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要从塞矿的泛滥中救出一些东西来仍然为时不晚。一个能为岛上人民的利益而自由行动的政府，可以立即将斯库里奥蒂萨矿收归国有，按照“古巴式的”条件去借贷将该矿现代化所需要的几百万美元，并为了该岛的利益保住该矿枯竭以前所能有的利润。不是有人说要给塞矿以补偿吗？不，应该说要从塞矿得到补偿：要是这世界还有正义的话，塞浦路斯肯定能够上法院控诉塞矿已经从它那里偷走了一亿美元。

显然这种情况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塞浦路斯近年来的历史和它当前的国际关系。左派，主要以岛上最大的政党共产党为代表，在塞浦路斯很强大，在摆脱英国殖民主义枷锁的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府没有它的支持就很难进行统治，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强硬的反帝路线。这样

一个政府的主要目标将会是将斯库里奥蒂萨矿国有化和撤除英国军事基地(对控制英国中东石油帝国十分重要),这还能有什么疑问吗?所以,相反地,帝国主义国家的任务就必然是阻止塞浦路斯得到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府。

为了这个目的,最方便的工具就是帝国主义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手法,利用少数民族土耳其族人和多数民族希腊人之间长久以来的敌对情绪作为现成的缺口。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这种敌对情绪是能够得到缓和或许还能完全得到克服的。要是塞浦路斯自己能够支配马矿的财富,这样的社会本来是有可能建成的。可是,随着它的经济血液被吸干并输到南加利福尼亚去了,唆使塞浦路斯人去搞越来越残酷的互相残杀的阴谋就更容易得逞了。因此就给予了“独立”,但规定土族少数民族拥有得到土耳其的干涉权力支持的否决权;因此就有了导致土族塞浦路斯人和安卡拉政府(华盛顿的最忠实的小丑之一)抵制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政府的诱因,而这个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设法废除否决权和取得奉行进步的民族主义政策的自由;因此就把联合国请了进来“调解”激烈已达到内战程度的部族不和;于是帝国主义“政治家们”也就跑出来进行貌似神圣但彻底伪善的说教,鼓吹法律与秩序、和解、同胞情谊以及帝国主义惯常给它的倒霉的牺牲者规定的一切其它善良的行为方式。

够了够了。塞浦路斯的教训,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投资的全部历史的教训,的的确确是很清楚的:

首先,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应允许外国公司在其

境内拥有和经营企业。根据这种企业的本性，它们不是也决不可能是经济发展的工具；它们是用来吸干这个国家的财富并将它转往国外的抽水水泵。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发达国家，而且，特别是在某种意义上，也适用于西欧的发达国家、加拿大和日本，美国公司近年来正是在这些国家集中了它们对外的经营业务。^①

其次，那些已有由外国公司拥有的企业的国家，应将这些企业国有化。补偿问题当然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有些场合下给予某种补偿（例如古巴在一定条件下所建议的那样）可能被认为是权宜的，但不应让这一点把外国投资者在道义上无权要求补偿这一事实弄得含糊不清。与之完全相反，要是适用有名的资本主义赔偿原则的话，看来在一百个案例中有九十九个是外国投资者欠接受投资的国家巨额金钱。

第三，从今以后外国资本只应作为贷款而被接受。

最后，判断任何政府或政党是否真正忠于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标准，就是要严格考察它对待外国投资的态度。

^① 这是一个须留待另行处理的题目。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有相当的证据说明这些经济上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正在受到压力并且被收买，以致默许甚至积极地协助美国的入侵：根据目前的情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迅速地被并入美帝国。在我们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分裂》（《每月评论》，1963年4月号）一文所作的分析中，并未对这种趋势背后的各种力量加以适当的评价和考虑，因而整个题目现在显然需要作重新考虑。

经济停滞和经济学的停滞

1971年4月

3月6日的《纽约时报》在头版第八栏刊登了一个标题为：“2月份是失业率连续下降的第二个月”的报道。就其表面看来，这好像是条好消息：就业情况不断恶化了一整年之后显然已在开始改善。但如果人们继续看下去，很快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真实的：

“〔失业率〕从1月份占劳动力的6%和12月份的6.2%下降到〔二月〕的5.8%……不是由于现有的职位数目增加了，而是由于寻找工作的人数减少了。

按两个不同的计算标准，职位总数在2月份略微有所下降（在酌量了通常的季节性因素之后）。平均的工作周减少了一小时的十分之二。”

这样看来，就业情况的确是继续在恶化，寻找工作人数的减少正是这种情况所造成，而不是工人方面寻找工作的需要减少了。但这种奇怪的自相矛盾是怎样产生的呢？怎么会在完全相同的时间内同时出现职位的减少和失业的减少呢？

答案要在用来计算失业的定义和方法方面去找。政府统计人员是通过每月调查一些家庭实例得到他们的数字的。询

问每个被选定的家庭中的人们的就业情况,以便了解每个 16 岁以上的人所属的类别:就业、失业或“不在劳动力范围之内”。一个人是否就业是相当清楚的概念。但失业和在劳动力范围以外之间的区别则可能是很不清楚的。有些人显然是在劳动力范围之外的,如果他们在身体或精神方面没有工作能力——例如住在医院或其它设施中的人们。另一些人也可以是在劳动力范围之外:因为他们退休了,或整天忙于家务和照料幼小的儿童,或是一些游手好闲的有钱人,或者是些干脆不愿工作的人。但不属于以上各类的人们的情况又怎样呢?人们怎样区分在劳动力范围内的和在劳动力范围之外的人呢?

撇开各种技术性的问题不谈,大体说来政府统计人员是通过询问被访问的人最近是否在寻找工作来区分的。凡在积极地找工作但是现在不工作的都算作失业。另一方面,凡不积极地找工作而现在又不工作的则算作在劳动力范围之外。正是计算“官方”失业数字的这个方法,使得《纽约时报》所报道的奇怪结果成为可能的,即就业和失业数字的同时下降。因为经济状况的好坏和求职者的数目的多少是成反比例的。换句话说,在任何特定时间内,如果容易找到工作,需要工作并要求工作的人数就会相当大,但如果工作不易找到的话,他们就不积极地去寻找工作。职位越少,这种情况就会持续得越久,需要工作但不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就会越多,从而被看作在劳动力范围之外的人数也就越多。

从常识的观点看,这是完全合乎道理的:一个人在有合适的工作时是愿意工作的,至于那些由于工作不合适而不去找

工作的人则应划入失业的范围。但到目前，还没有作出计算这种人的数目的任何尝试，而且还没有一个普遍同意的（更不要说简单易行的）估计方法。然而，必须作出一种尝试，而且为了稳当起见，使用一种宁可低估而不是高估这种“被掩盖的”失业数字的方法，似乎比较好。

我们先看一看关于所谓劳动力参加率（以后简称为参加率）的资料吧。总的参加率指算在总劳动力之内的非学校团体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同样地，人口特定部分的参加率，比方说年龄在 25 至 34 之间的黑人男子的参加率，就是指算在劳动力之内的这些年龄的黑人男子所占的百分比。

表一（见第 48 页），来自官方材料^①，它表明所标出的各种年龄、性别和肤色的人的参加率，即既非学校团体，又不在部队并在特定日期实际在工作或在寻找工作的人的百分比。为了表明趋势必须使数字涉及到相当长的时期；另一方面，为了便于理解最好把仅仅表示数量的数字尽可能地删去。所以我们选定了两个日期，每一类目的参加率从 1948 年以来的高峰年和最近的数字。我们挑选 1948 年来作为起算年是根据这样的设想：即认为战时和战后初期的参加率不论按任何标准来说都肯定是反常的，从而 1948 年是我们能合理地选择的最早的一年。然而 1948 年也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一年。在我们看来，最有用的是：就每一类目挑出 1948 年以来劳动力参加率的高峰年并将它同最近的参加率作比较。

^① 《总统的人力报告》，1970 年 3 月；以及劳工统计局，《就业和收入》，1971 年 1 月。

表一 民间劳动力参加率 (百分比)

年龄和肤色总数	男	性	女	性
	1948以来的 高峰	1970 12月	1948以来的 高峰	1970 12月
16岁及16岁以上				
白人	86.5(1951)	79.1	43.1(1970)	43.7
黑人	87.3(1948)	75.2	49.8(1969)	48.4
16和17岁				
白人	52.7(1951)	45.2	35.2(1969)	34.3
黑人	60.4(1949)	30.5	30.4(1951)	19.5
18和19岁				
白人	76.2(1948)	63.9	54.6(1969)	53.4
黑人	80.8(1951)	56.9	48.7(1967)	39.7
20至24岁				
白人	88.4(1951)	81.7	58.0(1970)	58.0
黑人	92.8(1952)	82.4	58.6(1969)	57.0
25至34岁				
白人	97.8(1955)	96.5	44.2(1970)	44.2
黑人	96.7(1953)	93.3	57.8(1969)	57.4
35至44岁				
白人	98.3(1955)	97.3	51.3(1970)	51.3
黑人	97.3(1953)	92.2	60.9(1966)	59.1
45至54岁				
白人	96.8(1956)	94.8	54.6(1970)	54.6
黑人	95.6(1949)	88.3	62.3(1964)	60.6
55至64岁				
白人	89.6(1948)	82.6	43.2(1970)	43.2
黑人	88.6(1948)	78.8	49.1(1966)	45.0
65岁及以上				
白人	46.6(1949)	25.4	10.6(1960)	9.9
黑人	51.4(1949)	25.2	17.5(1948)	12.0

在男劳动力方面，我们将注意到整个男劳动力的高峰年是1951年，从那以后参加率就下降了——白人从1951年的86.5%下降到1970年末的79.1%；黑人从87.3%下降到

75.2%。^①这种下降的因素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主要是由于与工作无关的原因。例如，16岁至20岁之间的青年参加率的显著下降，显然大部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大、中学校学生人数大发展的结果，而65岁以上参加率的更显著下降则反映了社会保险、退休和养老金等方面的发展。

真正惊人的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在男性数字中从25岁到64岁的所谓青壮年这类的参加率有明显下降，虽则下降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从所有的年龄小分类来看，参加率的高峰出现在五十年代中期，多数的小分类还在那以前就达到了高峰。而且在每一种情形下，那时以来的下降都是相当大的。此外，在每个年龄小分类中，黑人参加率的下降都比白人的要大得多。

在我们看来，人们正是在这些数字中可以找到被掩盖的失业数字日益增长的最有力的证据。如果不是因为对寻找合适的工作已感到绝望，为什么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从25岁到64岁的人脱离劳动力市场呢？肯定不能认为在这些年内美国出现了一大批以前是工人的有闲阶层，因为那是违背常理的，而且还会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联系到黑人在整个人口中的地位，黑人已经构成这个幸运的新阶层中的最大最大的成分了！不，唯一合乎常理的解释只能是：工作职位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对于不熟练的和受教育少的人来说就更是这样，其结果就是将成百万的工人逐出了劳动力市场。

在妇女劳动力方面，关于劳动力参加率的数字就不那么

^① 非白人的官方类目是“黑人和其它种族”，但由于黑人一直占最大的比重，所以代之以“黑人”是会产生什么错误的。

能说明问题。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16岁以上的妇女在总劳动力中的绝对数字和百分比都在不断地上升。近如1953年，这种年龄的白人妇女在总劳动力中只占33.4%，而在1970年末这个数字上升为43.1%。就黑人妇女说，可比较的数字是1953年的43.6%和1970年的48.4%，其增幅数仅及白人妇女的大约一半，但也还算相当大的。有了这些强大的上升趋势，高峰年的参加率就倾向于和最近期的参加率一致或在时间上接近。在这种情况下，高峰年和最近的参加率的比较也就只反映了上升趋势本身，年轻的（16至24岁）和老年的（65岁以上）两类人除外。就这两类年龄的人来说，起作用的因素和在男性工人中起作用的那些因素一样，尽管在程度上要差一些。

这断然不意味着在妇女中不存在被掩盖了的失业数字。的确，我们十分怀疑，男子和妇女参加率之间的大部分悬殊差别恰好表明妇女中存在着大量的被掩盖的失业数字，而这种情况直到最近连妇女本身都一直还未觉察到。对大量被掩盖的妇女失业数字的日益觉察，会成为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作这样的设想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引用的材料对于估计被掩盖的妇女失业数字却不能提供很大的帮助^①。为什么我们深信我们在下面对于被掩盖的失业数字的计算可能是低估而不是高估了问题的重要性呢？其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① 表一所列的18岁和19岁的黑人妇女的官方数字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在1970年12月，这些青年妇女中只有39.7%被算作劳动力，而同样年龄的白人妇女中则有53.4%被算作劳动力。这确实反映了给青年黑人妇女的工作机会更少。

我们所用的方法是个很简单的方法。我们假定 20 至 64 岁的白人男子在 1970 年末的“真正”参加率，不是表中实际上所标明的数字，而是 1948 年以来的那个高峰率。至于 16 至 19 岁的白人男子，我们接受 1970 年的参加率（尽管我们深信那个数字无疑是太低了），同时我们把属于这类年龄的黑人的低得多的比率提高到白人比率的水平。（这里的假定是，如果可以找得到工作，至少会有和白人一样多的黑人在找工作。）对 20 岁和 20 岁以上的黑人男子，我们或者用他们自己的高峰率或者用同一年龄小分类的白人高峰率，哪个高就用哪个。对 16 至 19 岁的黑人妇女，我们采用白人的比率；对 55 至 64 岁的黑人妇女，我们采用高峰率。简单地说，我们做了以下几件事：通过使用一套已经标明的参加率，我们把我们估计应补充的人数（这些人本来会在总劳动力之中的，如果工作好找的话），加到总劳动力和官方计算的失业人数中，以便更为现实地估计 1970 年末就业和失业率总数。

在作了某些季节性调整之后，我们发现，和 1970 年 12 月官方计算的失业人数 5,146,000 人相比，该月至少还有失业人数 2,388,000 人未计算在内，使该月失业总人数达到 7,534,000 人。还必须把非自愿的部分时间失业相当于全日失业的数字加进去，这项人数约为 556,000 人。^①因此在 1970 年末失业的总人数约为 810 万人，占重新计算的总劳动力的 9.4%。这比官方数字 6.2% 高出 50%。按照任何有关标准

^① 据劳动部报道，1970 年 12 月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有 1,382,000 人被雇来干非全日工作的活；也就是说，这些工人本来经常全日工作而且想得到全日工作的机会。由于这些工人平均每周只工作 24.5 小时，我们算出，不足的工作时间相当于有 535,000 人失业。

来说，这都表明存在着深刻的经济停滞状态。

目前美国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有大量闲置的生产力。它提供了经济停滞的进一步的证明。表二介绍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关于六十年代的十年和 1970 年制造业中生产能力利用的指数（《联邦储备公报》，1970 年 2 月号）。它表明到 1970 年末大大超过四分之一的制造能力是闲置的。

表二 制造业中的生产设备的利用率

(百分比)

1960	80.6	1967	85.3
1961	78.5	1968	84.5
1962	82.1	1969(第四季度)	81.7
1963	83.3	1970(第一季度)	79.8
1964	85.7	(第二季度)	78.0
1965	88.5	(第三季度)	76.2
1966	90.5	(第四季度)	72.3

这怎样和三十年代——普遍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史中最坏的年代——的停滞相比较呢？为了作比较，最好的一年无疑是 1938 年，它和 1970 年一样，是在长期周期性上升之后衰退的一年。1938 年官方的失业数字是 19%。如果我们估计有 50% 的失业数字被掩盖了，看来那年就约有接近于 30% 的劳动力失业。那时候官方还没有收集生产能力利用率的统计数字，但有一种估计认为 1938 年的数字应是 60%，作为对当时失业数字之大的一项说明，这项估计数字无疑是充分的。^① 这样，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目前时期的停滞远不及三十年代的停滞。按照比例推算，那时也许有三倍于现在的失业人数和多三分之一的闲置生产能力。

① 参看巴伦和斯威齐合著：《垄断资本》，第 237 及第 242 页。

但是这里当然产生一个问题：两个时期之间的差距有多少可以归功于最近三十年中战争机器和军事预算的不可思议的增长呢？就失业问题来说，为了提供答案，就应将1938年失业率同劳动力（包括武装部队）的百分比作比较，后者在今天是指：(a)失业的，(b)在武装部队中的，(c)作为文职人员由国防部雇用的，(d)雇用来为武装部队生产军需品、制服等等的，以及(e)雇用来生产货物和提供劳务，而这些货物与劳务是军费开支间接需要的（所谓加大的效果）。表三提供了这几项类目的数字。

表三 失业和与国防有关的就业人数

(1970年12月)

	(单位百万人)
(a) 失业	8.1
(b) 武装部队	2.9
(c) 国防部的文职雇员	1.2
(d) 为生产国防部用品而受雇的	3.0
(e) 加大的效果	7.1
合 计	22.3

材料来源：(a)见上；(b)和(c)见《国防指标》，美国商务部1971年2月出版；(d)最近的官方数字是1968年的（《统计摘要》，1970，第253页），它已被缩小用以反映那时以来国防开支的下降；(e)加大数“1”是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署1962年出版的《裁军的经济影响》所估计的低限界（见哈里·马格多夫著，《美国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参见本书第9、第10页的注。）

总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2,230万的总数相当准确地反映了现实情况；要说有错的话，就只是错在偏于保守罢了。按这总数推算出来的数字大约达到总劳动力的25.1%——不太低于上述1938年扩大的失业率估计数字，但比1933年24.9%这个官方记录上最高的失业率数字则略高一些。

这个 25.1% (失业的、武装部队再加上直接和间接依靠军费开支的工人) 可以用来作为衡量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在七十年代初经济停滞的强度和趋势的一个尺度。考虑到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垄断的发展很快, 它表明这种趋势比在三十年代时强得多也就毫不奇怪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许多简直要把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撕碎的破坏力量的来源, 这也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 或至少应当是, 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趋势这整个题目, 事实上是学院式经济学学者们的禁地。那些在经济学界有相当权威的人士既不研究这个题目, 甚至不承认这种趋势的存在。

看来, 之所以会有这种视而不见的情况, 也许是由于他们下意识地不愿意面对这样一种极残酷的现实, 即在现存制度的结构内绝对无法解决这问题或甚至无法加以有效的改善。在一个长时期内——在 C. 赖特·米尔斯称之为“美国伟大的日子”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似乎冷战和热战, 除了使美国对“自由世界”的投资安全之外, 还会提供一个永久的答案。但那个幻觉, 象许多其它幻觉一样, 变成了越南战争的牺牲品。在扶摇直上的军事预算的影响下, 官方的失业率 (但不是被掩盖了的失业率) 在几年内有所改善, 但这种改善只是在爆发了一次加速的通货膨胀过程的这种代价下才取得的。一切迹象表明, 这种通货膨胀过程将比开始这一过程的兴旺局面持续得更久。战争和通货膨胀加在一起的后果将会加大和煽起社会的一切公开和潜在的紧张和矛盾。在黑人、青年和妇女中发生了暴动; 在经济战线, 在长时期的相对平静之后, 突然爆发了阶级斗争; 在国际上连续一系列的天文数字

的国际收支逆差，威胁着要摧毁金元的最高地位以及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而现在，一个正常的周期性衰退加上军费开支上较小的削减（从1969年的788亿美元减至1970年的766亿美元），就能把这个国家推回到日益加深的停滞中。这种停滞在已故的艾森豪威尔年代是最典型的，而据说肯尼迪的重整军备和越南战争曾把这个国家从这种停滞中拯救了出来。对明眼人来说，事情现在是十分明白的：这一整套企图通过战争得到救助的极其可怕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无情的骗局。

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导向经济学者们所不愿面对的结论，即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改变经济制度。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终于逐步理解了这一点，或至少有所察觉。其结果是，经济学者们暗地里要“装不知道的阴谋”所产生的影响正在开始减少。对于《纽约时报》（3月7日星期日的杂志版）登载的一篇对日益增长的福利危机所作的通情达理的杰出分析（且不提其他地方发表的文章），我们怎么还能作其它的解释呢？这篇文章，据说是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一位社会学和计划教授赫伯特·J·甘斯写的，开始是这样说的：

“当尼克松政府的家庭援助计划被上届国会在1970年末搁置起来的时候，35%的纽约人口，25%的纽沃克人口和6%的所有美国人——共约1,250万人——是接受救济的，而从那时以来他们的人数继续增长，速度比预料的要快。”

为了进一步表明这问题的性质，甘斯教授可能会补充说，在1960年人口普查和1970年人口普查之间，美国总人口增

加了13%，而接受救济的名单则猛增了不少于94%。在这里肯定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六十年代中期由种族歧视引起的暴乱，对导致各城市在分配救济款项时做得更加“慷慨”方面确实起了作用，而穷人在今天显然比之十年以前更加意识到他们的权利），但凡是对这问题哪怕只作过粗浅研究的人都不怀疑，真正的推动力来自日益增长的贫困，而这种贫困是和被掩盖的失业增长数字有关的。在指出了处理这个问题的若干建议之后，甘斯继续说道：

“没有一个计划……能对福利问题本身有太大的用处。这个问题的确是美国经济的中心问题，这种经济根本不需要那些寻找勉强糊口的工作的全部失业者，它也不能满足那些需要较高工资以维持家庭的所有劳苦穷人的要求。所以，要最后结束福利问题，就要求：或者重新改造这种经济以便在够生活的工资水平上提供充分就业，或者改变公众对福利的信念以便政府为社会所不需要的人和工资低的人提供适当的收入。”

实际上，这是下述意思的另一种说法，即：只要存在着垄断资本主义，就依然会有福利问题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如果能从历史的经验吸取任何教益的话，那么这个教益肯定就是：在这个制度下，权力是掌握在这样一个阶级手中，它既无意改造经济也无意每年将数百亿美元的钱交给那些社会所不需要的人和工资低的人。

可喜的是，学院派的社会学学者们和《纽约时报》都准备认真地来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只按统治阶级的思想办

事。我们希望经济学者们——这本应当是他们的专门工作——有一天将跟上来，这不会是过高的要求吧？

但是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真正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教育群众方面的任务要比学院的社会科学家们广泛得多和重要得多。我们不仅必须正确地教育人民群众了解这个制度的本质，而且还要告诉他们，社会主义是有可能把我们从目前的深刻困难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途径。我们能否及时地达到这一目的，其成功或失败也许会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可惜这并不是什么修辞上的夸张，它是既严肃而又毫不夸张的事实。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①

1970年2月

在新古典派经济学领域中,和平占有最高地位。战争、军国主义和对土著居民的镇压,都仅仅作为干扰和谐的均衡模式的因素来加以处理,而且这种均衡模式将为我们提供分配稀少资源的普遍真理。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确信经济过程必须被理解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在社会有机体中政治力量起主导作用,其中战争至少是同和平一样典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就被看作是主要决定因素,它们决定着技术改革的形式和方向、一国国内的资源分配以及国家之间(特别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资源分配。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来,那种在新古典派经济学中被当作衡量经济效率和社会主义的最后尺度的价格和收入关系,是被当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产物的,而在这种制度中,政治力量和“纯”经济力量是交织在一起的。罗莎·卢森堡用以下方式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考虑的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

^① 这是哈里·马格多夫 1969 年 12 月 30 日在美国经济协会年会讨论“帝国主义的经济”的一次会上提出的论文。

面]：‘和平竞争’的领域、工艺技术上的奇迹和单纯商品交换；它把这一方面同另一方面（即资本的疯狂暴力的领域）严格地割裂了开来，而后一方面往往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对外政策中偶然发生并且完全独立于资本的经济活动范围以外的现象。

实际上，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过程的一种手段。资本再生产的诸条件使资本积累的这两个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只有把它们放在一起考虑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情况。”^①

美国历史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例如，昆西·赖特教授——他领导着在芝加哥大学主持下的一项重要对战争的研究——在1942年指出：“美国一向夸耀自己爱好和平（也许有点理亏），但在它的全部历史中，它的陆军或海军不在某个时候和某个地方采取积极作战行动的时间只有二十年。”^②

赖特教授把未发生任何种军事行动的年份叫做和平年份。如果我们按月份来计算战争月份与和平月份并一直算到目前为止，就可以得到一幅更能说明问题的图景。把美国军队采取军事行动的月份加在一起——从独立战争开始并包括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对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惩罚性远征以及较重要的战争——我们就能看到，美国在它历史的四分之三时期

① 罗莎·卢森堡，《资本的积累》，纽约，1964年出版，第452—453页。

② 昆西·赖特，《战争的研究》，芝加哥，1942年出版，第一卷，第236页。

中,即2,340个月中的1,782个月,是从事战争活动的。^①换句话说,平均每四年中我们的武装部队就有整整三年在从事军事活动。这个比较数字并不表明美国为贯彻自己的意志而使用武力的全部范围。举个例说,它并不包括如象美国炮舰以前“从扬子江口……溯江而上巡逻将近二千英里,一直深入到中国的心脏地区”的那种活动。^②

因此,我们看到有关战争的开支在我们整个历史中构成联邦预算的主要部分也就并不奇怪了。撇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份和战后时期不谈,因为这个时期的记录是众所周知的。以十年为单元,把从1800年到1939年间,陆军、海军、退伍军人的补偿金和年金以及债务利息(在“新政”时期以前联邦所负的债务主要是战争开支的结果)等项的联邦开支列一个表,就可以看出:除了一个单元(十年)外,至少有54%的联邦开支是用于该十年中的军事活动或备战活动或偿付由以前的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债务。^③这个例外的十年就是大萧条那十年(1930—1939),当时百分比下降到略低于40%。在14个单元(140年)中有7个,联邦预算中有关战争的部分占70%或更多。

这种几乎不断地把军事活动当作急务的做法,显然不是因为害怕野蛮人的入侵所激起的。当然罗,法国、英国、西班牙和俄国正在争夺殖民利益和商业利益,这是当时现实生活

① 从劳伦斯·丹尼斯,《为了生存而行动的思想》的表中计算出。科罗拉多-斯普林斯,1969年出版,附录Ⅰ。

② 海军情报局,《作为实业界后盾的美国海军》,华盛顿,1923年出版,第4页。

③ 从《美国历史的统计,殖民地时代到1957年》中的材料计算出。华盛顿,1961年出版,第718—719页。

的一部分，而处于幼年和青年时期的美国则必须在这种现实生活中过日子。有时，必须考虑自卫的问题。此外，解决国内紧张局势——如南北战争——对美国生活的军事方面也起了比较重要的影响。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建立帝国这个范围之内。因为，从殖民地和革命的时代开始，在美国历史中就一直存在着一条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搞扩张主义的路线，其目标是要创立并发展一个美帝国。最初的扩张主义需要军事投资，它集中在三个主要突击方向：(1) 统一成横贯大陆的国家，(2) 取得对加勒比地区的控制，和(3) 在太平洋地区占据一个重要地位。^① 应当指出，这一扩张主义并不限于在今天被认为是美国的大陆本土以内：从建国初期起，力争对海洋的控制以保护和促进国际贸易，一直是美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把西海岸并入美国的这种努力，除其它理由外，就是被为了进行亚洲贸易而要控制太平洋海港这一愿望所推动起来的。^②

当世界上各主要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这些在建立帝国的初期阶段所获得的经验成了极为有用的经验。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若干决定性和相应的发展标志着这一新阶段：

(1) 在先进国家中经济权力开始大大集中于比较少数的工业和金融巨头手中。虽然相竞争的利益集团还继续存在，但发达经济的成败现在已和新的大公司的繁荣密切地一致起来了。这些大公司的工作方法要求对国际资源的供应和市场进行控制。

① 理查德·W·范-阿尔斯丁著《美帝国的勃兴》，芝加哥，1965 年出版。

② 同前，第五章，《注定的命运和帝国，1820—1870》。

(2) 英国作为世界商人和世界财东的垄断地位的衰落。开始有能力进行竞争的工业国家——特别是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要求改变现有的贸易关系和国际市场的再分配。

(3) 工业化和新的造船技术使各竞争国家能够建立它们自己的海上力量，使得英国不能再对主要海洋航线保持其单方面的控制了。正如昆西·赖特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本书中所说的，“造船方面的发明和工业化的扩展结束了英国能强制交战双方接受和平的时代。”^①对海洋航线的控制也包括建立海军舰队可以加油和维修的军事基地。决定性的机动军事力量的存在，一方面要求取得战略性的外国领土以支持军事基地，另一方面又提供了积极追求殖民地的手段。

(4) 新帝国主义的最初阶段产生了列强相争控制尚存的外国领土的竞赛。据西奥多·罗普说，在1880年后“除奥匈帝国外每一个大国……都卷入了……积极的、自觉的殖民扩张主义。……”^②传统的殖民国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和俄国——中，后四国还继续增加了它们的属地。（西班牙在丧失了古巴和菲律宾后进而征服了西属摩洛哥。）而同时五个新的强国参加了争夺殖民地的竞赛：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和美国。说到美国，当然正是西美战争使它完全全加入了帝国主义阵营。正是这次战争中的成功，加上随后对古巴和菲律宾“土著”的扫荡，满足了美国两个长期的扩张主义野心：在加勒比海的领导地位，扩大通向拉丁美洲其余地区的通道，和在太平洋有一个牢固基地，以便在亚洲下

① 昆西·赖特，前引书，第一卷，第299页。

② 西奥多·罗普，《现代世界中的战争》，纽约，1962年出版，第206页。

更大的赌注。

就美国而论,在走向帝国的过程中有三个性质不同的阶段:(1)美国作为世界其余国家的粮食和原料供应者、资本的输入者的时期,这时海上贸易利益还相当强大;(2)美国作为制造品和资本的输出者开始同其它工业化国家竞争的时期——这时少数工业和金融巨头开始统治经济舞台;和(3)美国成为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了最大的制造业者、对外投资者、商人、世界财东,以及美元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时期。

推行扩张主义战略的精力和决心时时有变化。当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过渡时,而且由于国内外的情况不一等原因,看来美国有时好象是“孤立主义者”,对进一步扩展它的影响和控制好象不感兴趣似的。^①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世界规模的商业机会的追求则从未停止过。甚至当国内正在寻找应付危机的解决办法时,如在“新政”年代,发展对外商业在政府和私人企业的议事日程上也是名列前茅的。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主要的工作杠杆就是这样起作用的,即反复强调扩张主义是压倒一切的战略。这样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这些年的历史远远不是一个新的起点,而是在上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所形成的环境中获利并迅速成熟了的长期趋势的顶峰。

战后在帝国建设方面的跃进和美国社会向飞扬跋扈的军国主义的过渡,同两件事联系在一起:(1)希望顶住并遏制社

^① 孤立主义通常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参看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纽约,1962年出版,第四章,《关于孤立主义的传说》。

会主义国家并击败旨在把不发达国家从对帝国主义的从属地位解放出来的民族解放运动，和(2)扩张美国力量，以填补因西欧和日本在亚、非、拉影响的衰落而形成的“真空”。

同社会主义的兴起进行搏斗当然不是一项新的任务。帝国主义国家从1917年以来最优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毁灭俄国革命。索尔斯坦·维布伦在他1920年对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评论中对凡尔赛和约所作的评述是最恰如其分的：

“过去几个月的事件将会表明，和约(以及国际联盟)的中心的和最有拘束力的规定是一项未经记录的条款，根据这项条款列强要纠合在一起去镇压苏俄——除非这项条款的记录在国联或列强的秘密档案中找到了，否则它仍然是未经记录的。除了这项未公开宣布的条款以外，看来这个和约中就没有什么具有稳定性或拘束力的规定了。当然，这项为了征服苏俄的条款没有写进条约的正文；不过倒不如说它是羊皮纸，在它上面写着条约的正文。”^①

美国未参加国际联盟并不反映它在遏制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方面的努力不够：在俄国，这种努力采取武装干涉和以粮食和其它经济供应支持反布尔什维克军队的形式；在匈牙利，则是操纵粮食供应来帮助击败贝拉·库恩政府。当时的肯定不是对俄国的侵略性或对匈牙利的军国主义的恐惧。也不能说政治或宗教理想起了很大作用。很明显，确切的动机

^① 索尔斯坦·维布伦，《和平的经济后果》，载《我们转变中的秩序论文集》，纽约，1934年出版，第464页。

就是恢复自由企业失去的领域并防止传染性的革命病菌蔓延到西欧和各殖民地国家去。他们认为，任何这种蔓延都会严重影响其余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定和繁荣。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决不限于在一个国家范围之内。它是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产生、发展和兴盛起来的。卡尔·马克思甚至说过这样的话：“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①我们或许可以补充说，帝国主义的本来的使命是充实这个轮廓，建立复杂的贸易、金融和投资的国际体系。有了这个体系，在世界上某一部分对贸易和投资机会进行限制，当然也就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限制了私人企业在世界其它部分的行动自由。因此保护自由企业的广度就成为世界范围的了。

美国在很久以前就接受了要在世界其它部分为贸易和投资开放门户并保持其开放的使命。可是，障碍不仅来自那些不愿被人过问的异教徒，而且来自较老的国家在各个殖民地建立起来的特惠关税制度。政治上殖民主义的衰落和其它大国的虚弱就使美国肩负起保卫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责任，同时也为美国企业提供了攫取特殊的滩头阵地和门户开放的大好机会。

有了这样大的任务，难怪美国今天会拥有如此大的“平时”战争机器，它既是遍及全球又比过去历史中所有任何其他国家所曾有过的更大。帝国主义必然包含着军国主义。的确，它们在过去是相依为命的孪生子，现在也一样。然而，甚

^① 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至在爭夺殖民地的高峰时期也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国家集团拥有过象美国今天拥有这样大、分布这样广的战争机器。在1937年,当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备竞赛已经在进行着的时候,所有大国——美国、英帝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合在一起平均每人负担的军费开支是25美元。(德国平均每人负担58.82美元是那时最大的。)^①在1968年,美国一个国家,按1937年的物价计算,平均每人负担军费开支132美元。越南战争只是造成这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在1964年,我们最近的一个“和平”年,按1937年的物价计算,平均每人负担的军费开支就已经是103美元了。^②

军事支出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增长,其原因之一无疑是武器的种类更加复杂多样了。(而且,正是先进的飞机和火箭技术才使美国跨越全球的军事态势成为可能。)另一原因当然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我想提出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巨大的军事机器(包括西欧国家的军事机器)的一大部分是为了在殖民主义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保持帝国主义的贸易和投资网所付出的代价。前殖民地之获得政治独立推动了这些新国家中为争取经济上以及政治上的独立的内部阶级斗争。要使这些国家在政治独立的范围内继续在经济上从属于各大宗主国,就要求(除其它事项外)美国在世界范围驻军并对所在国的统治阶级进行直接的军事支持。

① 昆西·赖特,前引书,第670—671页。

② 军费开支的数字是指用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防”和“空间研究及技术”等项所采购的商品和劳务。1964年和1968年的数字是1968年7月和1969年7月的《现代商业概况》发表的。对价格变动的调整是使用《总统的经济报告》(1969年1月,华盛顿,1969年出版)中所给的材料作出的。

对于美国军队分布的确切情报官方是保密的。然而前海军陆战队司令、已退休的戴维·肖普将军应该是能够作现实估计的人，他最近在《大西洋》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说道：“我们保持着1,517,000穿军服的美国人在海外119个国家中。我们有八个条约帮助保卫48个国家，如果它们要求我们这样做或者我们想干预它们的事务的话。”^①除目前在越南使用的部队外，美国海外武装部队的主要部分分布在429个主要的和2,972个次要的军事基地上。这些基地拥有在30个外国中的4,000平方英里的面积，不用说还得加上夏威夷和阿拉斯加。^②还有大量的军事援助计划在支持着这些基地，并作为较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并入帝国主义体系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协调者。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

“美国军事援助……从1945年以来每年平均在20亿美元以上。在1952年财政年度上升到多达50亿美元，而在1956年财政年度则下降到低达83,100万美元。受援国家从1950年的14个上升到1963年的69个——迄今为止的高峰。总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大约80个国家接受了总数为500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除了11个最坚定的共产党国家和一些紧密依靠英国或法国的国家外，很少国家没有从美

① 戴维·肖普将军，《美国的新军国主义》，《大西洋》杂志1969年4月号。119个国家这个数字似乎太大。肖普将军或许把岛上的基地也包括在内了，并把它们算作单独的国家。据我们的推测，用来配备基地、管理军事援助和训练外国军官的武装部队分别驻在70到80个国家中。

② 1969年4月9日《纽约时报》。

国接受过这种或那种的军事援助。”^①

以上事实的叙述决没有把美国军国主义所发挥的国际作用都囊括无遗。考虑到篇幅的限制,只允许我们简单提一下:(a)积极促进国外商业性的军火销售(占近年商品出超的相当大的部分),(b)对外国军事人员的广泛的训练,和(c)使用经济援助项下的资金来训练当地的警察部队以“处理群众示威和反间谍工作。”^②总之,这些补充手段大体上说是为了保持非社会主义世界依附于和效忠于自由企业制度,具体地说则是为了使它们依附于和效忠于美国。

政治上独立的不发达国家的军事力量常常起一种很特殊的作用。这是由于互相竞争的上层权力集团——大地主、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的相对软弱性所造成的,每一集团都和国际上大国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盟关系。当这些统治集团中没有哪个强大到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使其它集团俯首听命的时候,社会秩序就得依靠暂时的和不稳定的联盟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当现存秩序受到社会革命威胁时,军事机构作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角逐的焦点和(或)作为政治安排的组织者,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篇幅的限制

① 乔治·塞耶,《战争商业——国际军火贸易》,纽约,1969年出版,第37—38页。这是1966年5月1日《军事援助实况》中所提出的材料的摘要,补充了包括一直到1968年财政年度在内的最新数字。

② (a),见同前书。(b),见约翰·邓恩,《军事援助和军事人材:美国训练和技术援助计划的政治潜力》。未出版的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61年。(c),见埃德温·刘文,《美国和对拉丁美洲安全的挑战》,俄亥俄,1966年出版,第16页。

不允许我们对不发达世界中的军国主义的这种特殊作用加以讨论，而人们也许可以说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制度在沒有殖民地的情况下的主要支柱。这种支柱正是由上面所述种种策略——军事训练和提供顾问、广泛的军事援助计划和鼓励美国军火的销售——所支持和哺育起来的。

正在力图控制世界其余部分的这种军国主义，同时也在对美国社会性质的形成起着作用。指出军费开支对就业（或失业）形势的关系，就能对这种影响之大有某些了解。在1969年的头三个季度，大约有830万人由于军事计划而被雇用：350万人参加军队，130万人是国防部文职人员，350万人从事生产和运输军队所采购的商品。^①与此同时，至少有370万人失业。^②

考虑一下假若这830万人都不从事军事事务，那将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沒有可资替代的就业出路，这就可能意味着总数超过1,200万人的失业，或14.3%的失业率。美国以前

① 关于武装部队和国防部文职人员的就业材料采自《国防导报》（人口调查局）1969年11月号。为军事生产的私营工业所雇用的人数的估计系根据理查德·奥利弗所作的研究《国防开支的就业效果》，《每月劳工评论》，1967年9月号。奥利弗先生估计，由于国防部开支的结果，在截至1967年6月30日为止的财政年度中私营工业中雇用了2,972,000人。我们把最近的材料包括在这一估计之内是依据：（1）假定从1967财政年度以来生产力并无增长或生产组成方面并无重大变化；（2）使用1969年头三个季度的开支数字；（3）加上空间研究与技术的开支和原子能委员会的一半开支，而这两项在奥利弗先生的估计中均未包括在内；及（4）按最后两年的价格增加作了调整。所以，最后算出的350万人的数字是一项粗略的估计，但可能发生的误差无论如何也不致于否定我们的估计。

② 根据1969年1月到11月《就业和收益》（劳工统计局）中的材料。370万人的估计数字是指全日失业人数加上非自愿工作不满星期的人相当于全日失业的人数。这一估计沒有把政府调查中不算作失业的人考虑在内。

有过一次这样的失业率，那是1937年。1931年，大萧条的第二个整年，失业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是15.9%，比这高不到2%。^①

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考虑加大效果的问题。有人估计，在国防方面每花1美元就会刺激起1—1.4美元的产品生产。^②如果我们只采用较低的估计，如果我们为了讨论方便起见，假定军用和民用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相等，那么，要是没有军事预算，我们就会达到大约24.3%失业的数字。试把这个数字同1932年大萧条最深刻时期的24.9%的失业率去作一个比较吧！

当然，有人会对这些粗略的概括提出反对论点。比方说，失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极有限的时间内会起点弥补作用。可以设想，假如随着军费开支的锐减并不发生财政崩溃的话，那就会降低利率从而或许会刺激建筑业和某种州和市一级的投资。征税的减少会使消费者的需求增大。联邦社会福利计划的扩大也会有它的效果。但是这些反措施能否同防务开支对经济起同样的影响则决不是明显的。

经济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所创造的简洁模式的俘虏，因而他们就忽视了经济得以持续运转的至关重要的动的因素。比方说，他们往往低估了（如果不是忽视的话）持续的通货膨胀对于有关存货积累和在工厂和设备上的投资等商业实践所具有的特殊效果。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几乎完全忽视股票市场和不动产投机对(a)进行商业投资的决定和(b)特别

① 《总统的经济报告》，1969年1月，第252页。

② 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署，《裁军的经济效果》，华盛顿，1962年出版。

重要的奢侈品贸易行情看涨的影响。通货膨胀和投机——军国主义的伙伴——一直是战后繁荣的主要动力，而它们是太容易被忽视了，因为经济学者们可以轻轻巧巧地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组数字从这一类目转移到另一类目，好象在经济上作这种转移就和人们记账那么简单似的。

上次萧条的经验仍然是对经济学者们的一项挑战，要求他们对经济在现实中运行的方式作出解释。例如，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在十年萧条之后我们在1939年的处境如何。个人消费开支终于上升到新的高度——按物价不变计算要比1929年高出6%。但是与此同时，非住宅的固定投资支出比1929年的水平低42%，而住宅建筑则低20%。^① 尽管消费开支连续上升了六年之久，而且法国和英国重整军备的订货也开始源源而来，投资界仍然处于萧条状态，失业仍占总劳动力的17%以上。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认识到战后年代庞大军费开支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它集中在制造耐用商品的领域和刺激机器与设备方面的需求。如果我们把军事部门对耐用商品的开支同私人对同类商品的开支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耐用商品制造业产品中的63%是直接或间接卖给联邦政府的。^②（这些材料是1963年即受越南战争影响以前的材料。）我认为，正是

① 《总统的经济报告》，1969年1月，第228页。

② 根据《美国经济的投资—产值结构：1963年》（《现代商业概况》1969年11月号）表中的数字计算出来的。采用了由于（a）私人固定资本构成总额和（b）联邦政府的采购而有的直接和间接产量的百分比。在计算生产耐用商品的每项工业的总产量时都用了这些百分比。据一般估计，联邦政府采购额中的85%都是为了军用。仅就耐用商品制造工业来说，这数字或许还会高一些。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军费开支在提高生产和就业并把它们维持在新的水平上的独特作用。

的确，国防开支还有其它方面的影响也可以帮助说明战后经济的规模和结构：军事和空间计划鼓励和资助的研究发展工作的独特作用；国防开支在促成主要大工业和大银行业的发展和繁荣方面的特殊地位；美国军事力量对接受美元为国际通货所给予的支持；^①军事订货源源而来，轻而易举地满足着经济，它们对私人经济部门来说则起着激素注射的作用。

至少可以作这样的结论：凡是从其基本模式中略去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分析，都是远远脱离今天世界的现实的。说得更现实一些，可以说这些理论和分析只起了模糊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重大问题和危险的真实情况的作用。

^① 在美国黄金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只有在外国银行愿意把美元债权余额保持在美国以代替黄金支付时，美元才能起国际通货的作用。有趣的是，前财政部主管货币事务的副部长罗伯特·卢萨把美国军事力量当作维持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一个因素：“而且，美国的政治稳定和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增加了把余额保持在这个国家而不是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的要求。”（罗伯特·卢萨，《世界经济的货币改革》，纽约，1965年出版，第9页。）

公司合并运动: 对权力的研究

1969年6月

在过去的一年左右,专门报道公司合并运动的宣传材料非常之多,但是,据我们所知,对这项运动的重要意义进行严肃探讨的文章却并不多。因此,回顾一下某些突出的事实,检查一下这些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或不意味着什么,也许还是有些用处的。

首先,不管用哪种有关的标准来衡量,这项运动引人注目的重要性都是毫无疑问的。下面的表格是根据4月19日的《商业周刊》报道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资料制成的:

	1966	1967	1968
进行合并的总次数	1,746	2,384	4,003
资产值1000万美元以上的制造业 或矿业公司被合并的数目	101	169	192
被合并的资产值1000万美元以上的各公司 资产总值(单位: 10亿美元)	4.1	8.2	12.6
200家最大的公司进行合并的次数	33	67	74
被200家最大的公司合并的各公司 资产总值(单位: 10亿美元)	2.4	5.4	6.9

给我们提供上述数字的文章并没有发表1969年上半年的完整数字,但是单靠一项统计数字就足以证明:近几个月来,合并运动非但远远没有结束,而且实际上是加快了步伐。同1968年被合并的资产值1,000万美元以上的各公司资产总值126亿美元相比,按1969年上半年以来的合并率推算,

今年被合并的资产总值大约会是 180 亿美元。

关于把目前这项合并运动的规模同美国历史上早先的合并运动来进行对比,《幸福》杂志(1969年2月号,第80页)指出:“以前美国也曾出现过合并运动。第一次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另外一次则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每次都持续了约十年。但是目前这次合并运动持续的时间已超过十年,而且规模也大得多。”

关于合并运动对于大公司在整个经济制度中的相对重要性究竟起着什么影响,那就更难估计了(而且的确会是不大可能的)。原因在于,合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的集中)并不是唯一在这里起作用的因素。此外,还有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积聚这因素,它是通过独立的各个公司的增长所造成的,而不是通过各公司的合并造成的。集中和积聚这两种力量同时起作用,而且彼此又互相加强。关于战后期间上述两种力量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1947年到1963年间200家最大的制造公司在制造业中所占相对份额的增长得到一些概念。1947年的份额是30%,1954年增至37%,而1963年则增至41%。^①

自从1963年以来,大公司的相对重要性当然还有进一步的生长,不过,由于上面刚提到的那些原因,要是把这种增长说成完全是由于合并运动所造成,那就错了。其实,即使根本不存在什么合并运动,大公司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

^① 1947年和1954年的数字摘自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报告,引自巴伦和斯威齐合著,《垄断资本》,第226页的注释;1963年的数字摘自《商业周刊》(1967年9月30日)的一篇特别报道,《大公司:增长的竞赛》。

也还是会增长的。这是根据以下两个已经确立的事实得出的结论：(1)平均说来，公司越大，它的利润率就越高^①；(2)一个公司获利越多，通过资本的內部积累，它的发展也就越快。因此大公司一般都比较小的公司发展快，即使根本不存在任何合并运动，大公司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会有相应的增长。合并运动毫无疑问加速了这个进程，但是合并运动决不是这项进程之所以起作用或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

在估计合并运动的经济意义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另外一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某些特定的特征和运动规律就开始起作用。吸收经济的剩余变得日益困难，而资本主义制度则面临空前尖锐的选择：要么让经济停滞、大量出现失业，要么为了社会性的浪费和毁灭性的目的而增加生产。至于说垄断进一步发展到了某一特定程度是否会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转的方式产生相应的影响，则决不是很清楚的。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在三十年代的表现是特别与之有关的。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的时间之长和程度之深，以及随之而来的回升到1937年告一结束时尚有40%的劳动力仍然失业这一事实表明：到1930年，垄断化所达到的程度已经足以完全支配经济的运转，并足以阻止那怕只是接近于充分就业的实现，除非通过大规模的公私两方面的浪费来实现。换句话说，美国今天的极其不合理和毁灭性的制度早在四十年前就完全形成了。从那时以来，垄断化的增加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霍华德·S. 谢尔曼新近出版的研究报告：《美国的利润问题：对经济积聚和商业周期的研究的导论》，康内尔大学出版社，1968年。特别是其中的第二章。

无疑使情况变得更糟了，而不是使情况产生了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合并运动对小企业的影响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大公司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对小企业的影响问题。激进派和反对垄断的自由派往往都断定，大公司的统治日益增长就必然意味着小企业的衰退和下降。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华尔街日报》（4月10日）报道了一个最近的情况，一开始就这样说：

“你是不是耽心各个集团正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在并吞公司，以致到本世纪末 200 家左右的超级公司就会拥有美国全部的企业呢？”

“请放心。目前，新组成的企业比卖掉的企业要多得多。

“这些年轻企业中的大部分当然都是很小的，而且有好些连一年的寿命都不会有。但是，自从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代以来，小企业组成的速度是飞快的。

“分析家们估计，今年会开办 45 万到 50 万个新企业，比六年前增长约 25%。与之相对比，芝加哥的一家金融咨询公司——W. T. 格里姆公司——预测 1969 年将会有 5,400 个公司通过合并或被吞并而不复存在。

“政府公布的去年 12 月份的新企业指数（它统计企业组成的净增长数，即把新企业的数目减去停止活动的企业数目），是 1948 年年中以来最高的。”

这些新企业的大多数当然都是零售业或服务性行业方面的，但是在各种制造业方面的也有不少。小企业的大量存在

和大公司的利益远远不是矛盾的，在许多方面它们是为大公司服务的。如果我们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就会远离我们的话题，但是指出小企业的存在使大公司在以下三个具体方面得到好处，可能还是值得的。

(1)每一个大公司采购数以千计的物品，大的大到巨型机器，小的小到廻纹针。其中大多数都由其他的大公司供应，但对大公司来说，有好些物品的利润前景太不吸引人了，于是这方面就成了小企业的统治领域。既然情况是这样，大公司自然情愿让大批的供应者之间进行竞争，以保证价格低廉和质量优良。

(2)大公司的产品市场要经受季节性和(或)周期性变化的影响。这就是说，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对产品的需求可以分为较大的部分和较小的部分：较大的部分可以看作是稳定和可靠的需求；而较小的部分则是波动的需求，随着市场的变动甚至可能消失。大公司根据产品和市场的性质采用各种战略来对付这个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采用的战略中至少有一条内容，那就是准许一些较小的公司进入这个行业去满足波动需求的某几部分。在大公司垄断价格保护伞照顾之下，这些小公司在需求强烈时可以干得很好。当然，事物还有另一个方面，当需求微弱时这些小公司就可能受到严重打击或者甚至被搞垮。无论如何，它们对深思熟虑的大公司来说总是起着一种稳定和平衡的作用。

(3)最后，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许多技术革新的职能是由小公司而不是由大公司承担的。小公司往往被具体组织起来生产某种新产品或试行某种新的生产方法或新的产品销售方

法。这样做并不违反大公司的意志，相反还得到它们的衷心赞许。搞革新是有风险的。大多数小单位试制失败了，可也有少数中了头彩，而正是这种优厚的奖赏促使一大批希望中头彩的新户不断进行尝试。从大公司的观点看来，为了证明哪些方面的革新是切实可行并且有利可图的，小公司的这些革新活动起着非常有益的作用，何况所冒的风险还是由别人来承担呢。随后，大公司就可以进入这些革新的领域，不是把那些成功的小公司买下来，就是用自己的形式来模仿别人的革新。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还有其他商业和技术方面的原因，但是上述的三个原因就足以驳斥那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即，资本的集中和积聚会造成小企业消失的倾向。大公司的相对重要性在增长；但是只要整个制度在扩张（资本主义如果不扩张就无法生存），这就不仅不排除而是实际上绝对需要有一大批小公司的存在。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使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目前的合并运动，尽管用历史的标准来衡量，其规模毫无疑问是巨大的，但看来对于美国经济的运转或结构并不会有很深刻的影响。它并不意味着什么真正的新东西，它的意义毋宁还是和以前差不多。这一点对那被大加渲染的这一事实也同样适用：即是说近几年来那些所谓集团所进行的合并活动是最为惊人的。这些所谓的集团是指那些不仅在一个（商品）市场或几个有关的市场进行业务活动，而是在十几个或甚至几十个往往彼此很不相干的市场进行业务活动的公司。《幸福》杂志最近发表的 500 家最大的非金融性公司一览表中，头五家最

大的公司中就有两家(通用汽车公司名列第一,通用电气公司名列第四)一向是这种意义上的集团。还有其他许多公司,也许甚至占大多数,也同样够资格被称为集团。“新”集团之所以引起激动,其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它们的“新”,而在于别的方面。

首先,新出现的集团都是麦迪逊大道上的公共关系公司^①与它们在华尔街的子公司和同行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捧起来的。这些集团——与象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和塞罗克斯公司(XEROX)等不算集团或比较不具有集团性质的公司一起——都被捧成为“富有魅力”的公司。它们的主要头头们被描绘成为金融伟人兼(或)技术天才;它们的经营方法被说成是具有奇妙和神秘的气质;它们的发展潜力被吹得神乎其神。1968年2月5日的《巴隆》杂志有一篇讽刺小品很值得加以整段整段地引用,因为它既有真实内容又有欣赏价值。这篇文章据称是为了对有望组成新集团的组织者进一言而写的:

“谢谢你来信告诉我,你已经决定要成为一个搞集团的人。这该是时候了,你应该变聪明起来,下定决心,正如人们所说的,飞黄腾达,赚它个几百万块钱,别为了使你那肮脏的翻砂车间的获利不致下降而把自己累得筋疲力竭了!

“你问到该怎么干的问题。我看,得有头脑、有胆量,搞些来路不明的钱、再加上一张笑脸和一双擦得亮亮的皮鞋就应

^① 麦迪逊大道是纽约的一条大街,最大的一些广告公司都集中在这条街上。所谓公共关系公司也就是一种广告宣传公司,不过名字较好听一点而已。
——译者

该算是足够的了。其实，它并不比我们从前做孩子时玩儿的那种写连锁信的游戏困难多少，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你可别作弄自己，其结果也可能差不多，不过你赚的钱可就要多得多了。

“总之，头一件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些真正行家们的讲演和年度报告搞到手，这些行家们懂得那套江湖咒，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说实在的，最合我口味的是，远在西海岸的一个专门治灵魂怪病的机灵家伙——唉，可惜你不是一个象他那样能治点什么毛病的大夫。这种大夫们可受证券分析家们的欢迎呢！不管怎样，请读一读他的东西吧，他是个什么局面都能对付的人。

“他对旧金山的证券分析家们作了一次讲演，谈到了什么‘先进的物质体系’、‘研究与发展的投产’以及‘发展的工具：核聚变、重复运用以及进行联合行动’等等。他告诉《商业周刊》说，他搞合并的目的是为了提供‘畅通无阻的市场，使我们能销售高级技术物资和产品’，还谈到什么‘核动力将大规模占领市场’。

“这些话都出自这样一个家伙的口，他的销售额中有三分之二是供国防用的部件、阀门、起动机、构件以及代客购销金属……。

“在旧金山的演讲会上，代表惠特克公司的人准是花了至少一个小时去谈论技术、哲学和未来，但却一字不提他们目前搞什么业务，只是一再重申他们是‘先进物质体系领域中’的一个大有发展的公司。杜克公司买进了一个制造钓鱼竿的公

司……他就设法使那些分析家们深信他的合并活动是向新物质使用方面前进了一步。接着他又进一步合并了一个制造绳索的公司，这么一来他当然就完全有办法准备进入海洋学领域了——那可是一个行业极多的领域，顺便说这么一句……。

“关键在于：你必须对分析家们描绘出对路的形象，使得他们承认你是搞新企业的人。谈论这种自由形式的公司的联合行动以及它与变革和技术的互相关系。告诉他们你有一幢没有窗户的房子，房子里尽是天分特高的研究员，正在策划着未来，因此你的公司充满了技术发展方面的机会。它将会形成变革，而不是仅仅象笨头笨脑的老通用汽车公司那样只会做变革的应声虫……。

“如果你做了几桩好买卖，如果经济保持上升而且你的运气也不错，那么你就会发财并且成为美国工业界的巨头之一，而且你的股票持有者们也能赚几个钱。如果你做的买卖不好或者经济局面在不应该变坏的时候变坏了，那么至少你该知道赶快撒腿就跑。”

所有这些神乎其神的公共关系活动，其目的当然是要说服华尔街^①相信这些富有魅力的股票比正规的收支表和损益表看来所显示的价值要高得多。最迫切的目的是，用股票市场的术语来说——是得到尽可能高的价格收益比率。一般用老式方法经营管理的公司的股票，一般增长率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率相当(大约是每年增长4%到5%)，大概可按每股收益

① 华尔街在这里主要是指纽约证券股票交易所。——译者

的 10 到 15 倍价格出售。在另一方面，那些被高度吹捧起来的富有魅力的公司的股票则可以按每股收益的 30—40 倍或甚至更多倍的价格出售，因为这些公司能够抛出记录来证明它们在过去几年中发展极快。不仅近年来新集团的滋长发育的秘密在于此，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新阶层之所以能发财和出名其秘密也在于此。为了能够正确地分析这些现象，回顾一下公司和金融生活中的一些事实会是有用处的。

首先，必须把有关如何控制典型的大公司的那种情况牢牢记住，作为主要的背景材料。当然，在法律上讲，股票持有者们是公司的所有者，而经理班子只是他们的代理人。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大公司的股票都广泛地分属于成千上万的股票持有者，没有任何个人或集体拥有的股票超过极小的百分比。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碰巧掌权的经理班子一般都能继续掌权并委派它们自己的接班人。^① 在伯勒和米恩斯合著的名书《现代公司和私人财产》（1932 年版）中，他们两人发现 200 家最大的非金融性公司中的 44% 在这个意义上是由经理班子控制的。罗伯特·J·拉纳的一篇最新的研究报告（载《美国经济评论》1966 年 9 月号）指出，到了 1963 年，这个百分比已上升到 84.5%。《商业周刊》在报道拉纳的研究报告时，对一个比较 1929 年与 1963 年情况的图表作了以下的说明：“在 200 家最大的非金融性公司中，专业的经理班子几乎到处都获得

^① 有许多公司的现任经理班子都是原经理班子的嫡系后代（往往是指狭义的家族），这些原经理班子则是在早先时期当大股东拥有公司全部或大部分股票时所委派的。通过这个方法，那些早期的大股东们的家族往往在他们持有的股票已不占现有股票总额的较大百分比数之后很久还能继续控制某个大公司。

了最后控制权”。当然，要是有人能够收集到大多数股票的投票权——偶尔这种情况是有过的——这类公司的经理班子总是有可能被撤换的。不过，要搞这种突击行动是既费钱而又困难的。经理班子拥有一切有利的条件，在正常情况下它可以自由处理它的业务活动，不怕来自外界的攻击。至少在出现新的合并集团以前，情况总是这样。一会儿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其次，我们必须了解一下这些新集团是怎么进行活动的：看看它们是如何通过接管以前是独立的公司而日益发展的，并且看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它们是如何使每股收益得到那种增长的（这种增长对其价格/收益比率被哄抬得很高是很紧要的）。

我们可以把接管（或合并）分为两类：一种是，从被合并的公司看来是自愿的，另一种则不是自愿的。一个公司可能由于许多原因而愿意被另一个公司所合并。例如，某人的大部分财产是某个公司的股票，而这个公司则是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办起来的。假如这种股票没有上市不能马上出售（这种情况是常有的），那么他的继承人在他死后就会发生麻烦。他们将必须付巨额的财产税，可是却没有多少现款来付税。要是他们不得已非出售股票不可，那么很可能就得按比股票的真实价值低得多的价格出售。明显的解决方法只能是：上面讲的这个人应该趁他还活着的时候卖掉他的股票，把现款和（或）可以马上脱手的证券留给他的继承人。通常，最有利的出售方式是，找一家大公司买进他的股票，以得到这家大公司的一定数量的股票作为交换。之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这种

交易不必纳税，而出售股票所得到的现款或债券则需纳资本增益税。愿意被其他公司合并的另外一个常见原因是，某公司需要资本进行扩张，可是缺乏门路，而进行合并的公司则恰恰有办法向银行和货币市场搞到钱。或者，两个进行合并的公司双方都愿意成为一个更大的企业的组成部分，从而提高声望并减少某些特定市场波动的危害。总之，不管某个公司基于什么原因而愿意被别人合并，它是自愿的行动这件事本身就使整个进程大为简化了。在包括新老集团在内的所有集团的成长中，自愿合并的公司都是表现比较突出的，毫无疑问这类的合并将来还会继续进行。

非自愿的合并可就有不同的问题了，而以下我们就专门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个被吞并的公司的股票通常(也许总是)都广泛分属于许许多多的股票持有者，换句话说，这种公司都属于我们已经讲到过的占 200 家最大的非金融性公司多数的那种类型的公司。通常的程序是，进行合并的公司秘密地买进吞并对象的略少于 10% 的股票(因为买进 10% 以上的股票就得报告证券交易委员会，那就马上会被公众知道)。下一步，侵略者(以下称 A 公司)可能就会同受害者(以下称 B 公司)进行接触，提出一些目的在于战胜后者抵抗的论点和劝告。如果此计不成(情况也往往是这样)，A 公司就打出它的王牌来了——向 B 公司的股票持有者提出收买股票的方案。这种方案是以往往高出当前市场价格的价格，也许比市场价格高得多，买进 B 公司的股票——要嘛买进全部打算收买的股票，要嘛买进占全部现有股票中的一部分百分比的股票。可能用现款来偿付，也可能用 A 公司自己的证券来偿付，或二者兼用。

等到情况发展到了这个阶段，B公司的经理班子差不多也就算被击败了。股票持有人都是冷酷无情的，只关心发财致富。如果这时候有人出价收买他们的股票，出价比他们从市场上能得到的售价要高，他们中大多数人是会接受的。如果A公司用自己的证券而不是用现款来偿付，他们可能就会有些犹豫，这时B公司的经理班子就会尽最大努力去说服它的股票持有者们不要接受A公司的收买方案，留着原来的股票也许会更加有利一些。不过，通常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股票持有者们认为A公司的前景不太好，他们只要一转手把作为偿付款项的证券卖掉（这种证券在成交时总是比他们所放弃的那种的价值高一些）再买进他们更喜欢的其他证券就行了。

为什么进行合并的公司能够对被合并的公司的股票持有者出那么慷慨的收买价格呢？这里起作用的有两个因素：第一，价格/收益比率和股票价格的算法；第二，税法的影响，尤其是税法把偿付债券利息视作开销费用，从而在计算净收入时是可以减免征税的，而红利则是要从净收入来支付的。举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有关的原则。

把进行合并的公司叫A，被合并的公司叫B，合并后的新公司叫AB。假定开始的情况如下：

	现有股票股数	付税后的收益	每股收益	价格/收益比率	每股价格
A	1,000,000	1,000,000美元	1美元	40	40美元
B	1,000,000	1,000,000美元	1美元	15	15美元

这时，A提出以它的一股在市场上值40美元的股票来换取两股B的值30美元的股票，给B的股票持有者以每股五美元或 $33\frac{1}{3}\%$ 的增益。不过，这些股票持有者们并不是唯一的赢利

者。假定合并后的公司的价格/收益比率继续保持 40，合并后的结果将会是：

	发行股票股数	付税后的收益	每股收益	价格/收益比率	每股价格
AB	1,500,000	2,000,000美元	1.33美元	40	53.20美元

其结果是，由于把现有股票的总股数从 200 万股降低到 150 万股，总收益不变则每股的收益就会有所增加，而同样的价格/收益比率就使股票的价格也提高了（其中 A 的股票持有者所拥有股数和以前一样）。看来，每个人都得到了好处，只有 B 的经理班子除外。他们已不再是自己当老板了，只要 A 的经理班子高兴就可以随时把他们一脚踢开。这个例子说明了，在搞合并的游戏中，高的价格/收益比率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它还讲清了，这方面的行家在向投资和投机的人们介绍一种超级最新型的、不断发展的机器的形象时可以说得多么动听。这种局面带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他们搞得越成功，就越能制造出不断发展的表面现象（用每股收益的尺度来衡量），只要把更多价格/收益比率低的公司合并过来就成了呗！

第二个例子是要说明这种合并能在逃税方面大走红运，它是根据 1969 年 2 月 27 日《纽约时报》财政金融版发表的一篇题为《集团迷宫》的报道改写而成的。A 公司发行了 100 万股股票，每年付税后的收益为 200 万美元（每股 2 美元），不付红利，每股售价 40 美元。B 公司发行了 1,000 万股股票，付税后收益为 3,000 万美元（每股 3 美元），每股付红利 1.5 美元，每股售价 39 美元。A 公司提出对每一股 B 公司股票付给票面值为 50 美元的社债一股（即一股无担保的债券）并按 7.5%（每年 3.75 美元）付给利息。为了使提出的方案更加有吸引

力，A公司还可再加送准予在将来购买合并后的公司股票
的证书，不过这并不影响当前情况的数字。B公司的股票持有
者在债券价值方面可以得到每股11美元的增值，加上每股
2.25美元的当前收入。据假定，合并起来的公司在付税之前
的收益和合并前是一样的，即6,400万美元。可是付税后的收
益就大不相同了。合并后的公司在计算应征税的收入2,650
万美元之前，可以从付税前的收益6,400万美元中减去3,750
万美元的利息付款。因此付税后的所得便是1,325万美元了。
由于现有流通的股票只有A公司的100万股了，很自然每股
A公司的股票收益就从2美元增加到了13.25美元。这次吃
亏的是美国国库，少收入了1,875万美元之多。当然吃亏的还
有B公司的经理班子。A公司实际上利用了B公司本身获得
收益的力量加上政府慷慨提供的资金把B公司合并过来了，
并且在这过程中还使A公司自己的股票价值大大地增加了。

现在应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任何一家经营方式保守的
公司(股票市场给予它的价格/收益比率不是特别高，它的资
本结构中并没有许多负债)都很有被风行一时的集团之一(它
的价格/收益比率高得出奇，它毫不犹豫地靠大大地举债来提
供资金)吞并的危险。使得这种局面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正
是：处境危险的那一类公司包括老资格的大公司中的很大一部分，而这些大公司是属于美国经济与政治权力结构的顶层的。最近有一期《幸福》杂志在讨论它所谓的“合并浪潮”时是这样说的：

“这一浪潮看来实际上是阻挡不住的。华尔街深信，即使

股票市场来个暴跌也只能阻挡它一会儿。这个运动中的一项
重要力量就是提出收买方案或出价接管。侵略者对被侵略对
象的股票持有者提出的收买价格是如此不可抗拒，以至于他
们把足以进行控制的股票都让给了侵略者。就这样，股票持
有者上了阿道夫·伯利和其他赶不上时代的经济学家的当，
被撵弃到了无能为力的所有权冷宫里，却又发现自己无意
之中行使了股东的权力……

“被侵略的目标都是一些全国最正直、最谨慎、最有力量
而且最自信的公司。自信心在减退。一些自豪的老商号已经
被吞并掉了，好几十个富有经验的经理人员被解雇了。每五
个大公司的经理部门中也许就有三个害了大祸临头、沮丧、恐
惧的流行病。那些心烦意乱的经理人员本来是应该照管公司
业务的，但却像进行某种秘密探险似的行事，花了大量的时
间去征求以下几种人的意见：律师、经理咨询顾问、投票专家
以及精通抵制接管艺术的公共关系专家。”（吉尔伯特·伯克，
《合并运动风行一时》，载《幸福》杂志，1969年2月号，第79
—80页。）

在同一篇文章的后一部分，作者根据这个论点得出了最
后的结论：

“被吞并目标规模巨大这一点已不再是纸面上接管的障
碍了。一两年前，华尔街爱开玩笑的人士还说只有通用汽车公
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算是安全的公司了，但是现在有些专
家对于通用汽车公司是否安全的问题也不是那末有把握了。
一位善于遐想的金融家说，‘通用汽车公司在许多方面都是一

个理想的吞并目标。它的价格/收益比率很低，发展相对地慢，资产基数极大，现款极多，净价值很高。它利用杠杆作用的程度是低得可怜〔那就是说，在它的资本结构中，负债与剩余资产的比率很低〕。’象杜邦公司一样，通用汽车公司负债是很少的，后者继承了前者的财务政策。通用汽车公司实际上是联邦政府的伙伴，联邦政府拿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利润总值的一半以上。事实上，有些人就争辩说，通用汽车公司应该借贷几十亿美元来买进(通用汽车公司)自己的股票。这样就会使每股的收益增加并起杠杆作用——使每股收益的增长比整个公司收益的增长来得快。

“可是，通用汽车公司却没有大大地借债。现在，假定有些合并集团的英雄们印制了价值 150 亿美元的社债，说不定还印制了另外 100 亿美元的股票和准购股票的证书。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每股付息 4.3 美元，目前每股售价约 80 美元。我们的英雄会提出，譬如说把他的债券价值定为每股 125 美元，并对每一股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付 5 美元或 6 美元的利息。一旦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持有者发现，社债(即借据)真正会从通用汽车公司本身的腰包里来偿付，并且联邦政府还会负担一部分费用，那么他们恐怕都会争先恐后地把他们的股票换成社债债券。听起来这好象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象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却一直在发生啊！’”(同前引，第 161 页)

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暂时停下来问一问：那些自命不凡居然威胁着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核心堡垒的集团究竟都是些什么人呀？对这问题的回答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进入企业界的“新人物”。他们不象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那类人物，他们没有在某一大大公司里当职员然后慢慢爬上去（即使在大公司里呆过，也是不久就离开了的）。他们以搞自己的企业起家，往往从象电子或计算机这类新技术领域开始，利用从1948年开始出现的靠军事工业推动起来的经济扩展局面，随着他们各项新事业获利甚丰自然而然壮大了起来。在这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学到了玩弄金融权术的手法，开始拼凑日后的大集团。举个例子来说，林—特姆科—沃特公司（这家公司在《幸福》杂志1967年列举的50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中名列第38位）的创建人詹姆斯·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个海军电工（连个大学学位都没有），战后开始自己搞电气承包生意。从这样搞起，发展成一个在1967年销售额近20亿美元的集团。在某些方面来说，里顿工业公司（在《幸福》杂志1967年的表中名列第44位）是更加重要的例子。它从一家在1954年销售额为300万美元的公司发展到1967年销售额超过了15亿美元。最初同里顿一起搞得很成功的伙伴们，其中很多人在学会了这套本事之后都纷纷离开里顿公司去搞他们自己的集团了，这一点是特别引人注目的。^①

在合并运动的头十来年中，大多数的合并行动可以说都是在公司体系的外围进行的。美国资产阶级内部正在形成一个新的阶层，这个阶层是在人们可以称之为拥有财富和权势的老贵族集团之外的，但还没有和这集团处于明显的对立地

^① 要知道详情，可参看：1967年12月2日《商业周刊》中的《里顿：培养集团的二级学校》一文。

位,而这些老贵族则是以大公司为基础,在形成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大约是1890年—1929年)爬到顶峰上去的。不能指望那些出身微贱的亿万富翁(他们之中有不少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会永远满足于继续置身于公司体系之外。因此,从一两年前起,他们就开始侵夺行动,到处挑出个把大公司来把它并吞掉,引起了其他公司的日益不安。

这种做法及其反响可以通过以下三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来找到线索:林—特姆科—沃特公司的接管威尔逊公司和琼斯—劳克林钢铁公司,以及利斯科数据加工设备公司企图接管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事件。

威尔逊公司是一家肉类包装兼生产运动器械的公司,以其1967年的销售额99,100万美元为基础,在100家最大的非金融性公司中有一席安稳的地位,比林—特姆科—沃特整个集团还要来得大。可是,就在这一年中,这位林某通过玩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手段和金融权术(其中包括从某一欧洲银行辛迪加得到了一宗好几百万美元的贷款),居然把威尔逊公司接管过来,从而在500家最大公司名单中从原居第168位一举跃居第38位。在1967年,它所吞并的公司中还有大亚美利加公司,而这家公司本身也是拥有其他一系列企业的公司,其中包括布兰尼夫航空公司。在吞并了威尔逊公司大约只有一年之后,林某就下了他最得意的一着棋——接管琼斯—劳克林钢铁公司。琼斯—劳克林钢铁公司是美国第六大的钢铁生产公司,是《商业周刊》(1968年5月18日)称之为“钢铁密友兄弟会”的很有地位的成员之一,并且与梅隆帝国的匹兹堡诸友邻公司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使用高价收买手法的典范

之一：琼斯—劳克林公司的股票售价约为 50 美元一股，而林—特姆科—沃特公司则答应给股东们每股总值 85 美元。其结果当然是想象得到的。等到把琼斯—劳克林公司列为林—特姆科—沃特公司的子公司时，林—特姆科—沃特公司大概就成为 20 家最大的工业公司之一了。

可能正是这个事件比任何其他事件更加引起了《幸福》杂志(上面引过的文章,第 12 页)所描述的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内一片近乎惊恐的气氛。詹姆斯·林毕竟正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人物。《新闻周刊》(1967 年 10 月 9 日)刊载有关他生平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前不久,达拉斯的石油巨商和得克萨斯体系的其他台柱们只要一提起詹姆斯·林的名字就会马上引起哄堂大笑。在烈日曝晒的街道顶上 40 层楼的有冷气设备的私人俱乐部里,这些实业界巨子们一屁股坐在棕色牛皮沙发上,对这位来自奥克拉荷马州雨果城的、新兴的、年轻的公司合并专家进行取笑。

“一位石油巨商咯咯地大笑说,‘我才不愿意同一个中国佬做买卖呢!’^①第二个人就问,‘你听见了吗?他下一步打算吃掉贝尔电话公司呢!’第三个人问道,‘他打算给这公司取个什么名字?是不是叫玎—玲公司呀?’^②”

林某这位快速专家只不过最近才在得克萨斯州发迹成了

① 詹姆斯·林大概是华裔美国人,指不愿同林打交道。——译者

② “玎—玲”是电话铃响的意思,“玲”与“林”同音。他们根本不相信林某能够把美国最大公司之一贝尔电话公司吃掉,之所以要提林某作为电话公司的名字之一,只是为了取笑林某“不知自量”而已。——译者

暴发户的，可是现在却迈步走向匹兹堡了。^①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和与他相类似的其他人对华尔街和派克大道^②的最后堡垒发起进攻呢？沒等多久就有了答案，正如人们可以预测得到的那样，答案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大公司体系开始利用它的巨大的金融力量进行活动；另一方面，大公司体系号召它安插在政府中的忠实奴仆们别再睡大觉，而起来去尽他们的职责。

当一个名字叫做索尔·斯坦伯格——一个29岁的金融“天才”——创办的利斯科数据加工设备公司企图接管纽约的化学银行未遂时，上述答案的两个组成部分都得到了出色生动的说明。利斯科公司在计算机工业方面进行业务活动并拥有一个大的保险公司。尽管它发展得很快，但在《幸福》杂志（1968年5月1日出版）1968年最大公司一览表中则还占不上一个席位。而在另一方面，化学银行（以前的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则被列为全国第六大的银行，资产为84亿美元。1969年2月，利斯科公司对化学银行展开了进攻，并且明目张胆地准备对化学银行的股东们进行高价收买，搞一次致命的打击。但还不到2月底，斯坦伯格就被迫承认自己是失败了。当时，企业界的报纸对此只作了简单的报道，大部分都没有披露过细节详情。经过了一两个月之后，真正的内幕才被报道出来。《商业周刊》（1969年4月26日出版）中一篇题为

① 匹兹堡是美国钢铁工业中心，指林某吞并了琼斯-劳克林，准备染指钢铁工业。——译者

② 派克大道是大亨们在纽约市内住所集中的一条街，与“华尔街”一词一样，都是用来喻指垄断集团的。——译者

《为什么利斯科公司没有搞到化学银行》的文章（此篇文章整个地都很值得一读）的一些摘录如下：

“我一向知道存在着一个公司体系’，利斯科数据加工设备公司的总经理、脸蛋丰满、29岁的亿万富翁索尔·斯坦伯格说道，‘可我以前总以为我也是这个体系的一分子’。

“利斯科今年2月份合并巨大的纽约化学银行未遂，使斯坦伯格和巨大的、保守的金融势力干上了——这场对抗是如此尖锐以至于华尔街到现在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它。一位华尔街的朋友说，最后‘索尔总算知道了，的确有那么一间密室，那些大亨们在那里坐着，抽着长长的雪茄烟。’

“化学银行是家既老而又富有的银行（美国第六大的商业银行，总资产有90亿美元），而且还很有权势。它是一家放款的银行——许多最站得住脚的大公司都向它借款，并且也是经理美国政府证券的大银行。它的董事会中，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杜邦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奥林—马西森公司、尤尼罗约尔公司（原美国橡胶公司与罗约尔公司合并后的新名。——译者）、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等的最高级经理人员参加。

“从来还没有让这么强大的银行被一个外来者搞走过。对化学银行和它的许多最好的主顾们来说，斯坦伯格这个年纪轻轻、有时还挺不懂礼貌的后生小子、而且又是个犹太人，当然太是一个外来者了。一位同业银行家说，‘化学银行害怕，如果让利斯科公司接管了的话，它会失去它的许多公司和私人的信托业务。这些主顾们对这样一位斯坦伯格是不会坐视而

无动于衷的。’

“显然有些主顾曾威胁化学银行要取消某些业务往来，这些主顾是不希望一个非银行家能够过多掌握他们的金融往来情况的……。

“好多星期以来，华尔街最时髦的谈话资料都是与2月份那15天所发生的事情有关的——或者说与人们认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有关的……。有一件事倒是的确发生过，那就是利斯科公司的股票在两星期中从每股140美元暴跌到了106美元。许多华尔街人士认为，之所以大幅度下降是由于银行的信托部门抛售它们手中的利斯科股票的缘故。

“至少有一家租借计算机的主顾——也许还不止一家——显然曾经威胁过利斯科公司，如果它当真要把化学银行买进的话，就不再在业务往来上照顾利斯科了。利斯科的主要投资银行家，怀特—韦尔德公司于2月7日告诉斯坦伯格说，他得在沒有该公司援助的情况下自个儿去接管化学银行。

“投资银行家莱曼兄弟公司承认，它曾受到各商业银行的压力，要它别帮利斯科公司的忙。这倒是挺逗人乐的一种局面，因为莱曼兄弟公司本身就是大笔大笔向银行借款的户头。

“全国的大银行，由于想到了它们之中的一个成员正在被吞并而大为震动，的确曾团结一致以造成——用一位银行家的话来说——‘华盛顿和阿尔巴尼^①都感觉到了的一股大规模的反击巨浪。整个工业界都为之震惊。’

“在华盛顿，化学银行得到了尼克松政府、国会等最上层

① 阿尔巴尼是纽约州的首府。——译者

的支持，也得到了金融调节者们的帮助。在阿尔巴尼，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马上要求通过防止纽约州的银行被吞并掉的立法。阿拉巴马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约翰·J·斯巴克曼于2月28日在参议院提出了一个相类似的法案，把全国性的银行都包括在内了。

“究竟化学银行自己在这事件中插手到了什么程度，现在还弄不清楚。事实上，正如一位华尔街人士所指出的，‘化学银行用不着自己出面干太多事。它有那么多的朋友，而且每个朋友都愿意帮它的忙嘛。’”

事实表明，在利斯科—化学银行事件中，大公司体系的反击只不过是勒令那些暴发户不得越轨的全面战役的头一炮。在3月24日的那个星期中，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提出诉讼，要把琼斯—劳克林钢铁公司同林—特姆科—沃特公司分开来，并且同时迫使林接受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在诉讼有结果之前，琼斯—劳克林公司保持其作为组织上独立的一个实体，从而一旦政府胜诉时，琼斯—劳克林公司就可以在困难最小的情况下由新的业主来接管。《商业周刊》(3月29日出版的一期)把这行动叫做“华盛顿对那些有合并狂的大亨的首次全面出击”。看来，林某向核心层的进军只进到了匹兹堡那样远就不得不付出代价了。

最后，5月1日出版的《幸福》杂志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一栏中才真正把幕布拉开了，把幕后进行过和正在进行的情况公诸于众了。下面就从另一篇文章中摘几段，这篇文章是值得全文阅读的(文章的标题是太恰当不过了：“搞合并的

集团被围攻，老企业笑得合不拢嘴”）：

“近年来华盛顿对搞合并的集团所表示的兴趣，和对‘华盛顿参议员’棒球队的前景所表示的兴趣差不多。林登·约翰逊政府的司法部并不认为那些集团对自由竞争构成多大的威胁，所以联邦贸易委员会在1967年不准普罗克特—甘布尔公司接管克洛罗克斯公司后就消极起来了……。

“对比起来，在今天首都的兴趣排列顺序中，反托拉斯与合并集团的问题仅次于越南问题、反弹道导弹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了。目前，正在对合并集团的反托拉斯方面进行的联邦调查约有12起。摆在国会面前就有一大批禁止航空公司与铁路公司合并的法案。众议员威尔伯·米尔斯提出了一项取消对合并接管减免征税的法案。银行界的合并集团……成了严格的行政立法措施的靶子。政府新任主管反托拉斯的负责人，司法部副部长理查德·麦克拉伦在今年春季已经对合并者们展开一场广泛的法律斗争。在最近的12起较大的集团合并中，政府已对5起的合法性提出了异议。

“这一大批联邦措施造成的结果——也许并不完全是没有意识的——使13个集团的股票的市场价值在1月27日到3月24日期间贬值了50亿美元以上（百分之二十一），从而把它们进行合并的潜力削弱了……。

“这种对合并活动的突然的、不拘形式的、未经协调的进攻，甚至使献身于反托拉斯的纽约州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和密西根州参议员菲利普·哈特都感到惊异，而他们两位分别是众院和参院反托拉斯司法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我从

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企业团体居然会请求联邦政府来调查企业的活动。可是，我们一些主要的大公司的合并实践恰好造成了今天的结果……’。

“使得华盛顿下决心采取行动的那些重大事件是不难理解的。倒不是由于合并的次数多了或者集中率大了，而是由于对进行公司活动的传统方式造成了威胁。‘多年来’，哈特参议员说，‘对我主持搞的反托拉斯意见听取会，谁都一点儿也不关心。可是今天那些如此善良的人们却正在被人吃掉’。……

“尽管首都各界对于目前合并活动的危险性有近乎一致的看法，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对詹姆斯·林抱怨华盛顿的害怕‘集团并发症’表示相当支持的。……甚至哈特参议员也讥讽地指出，许多建议和措施并没有‘涉及象通用电气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或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早已确立了集团的。它们只是针对那些威胁老派大公司的最新的集团。’……”

关于那些外来的暴发户们企图打垮公司体系的尝试就讲到这里。他们的确使大亨们吓了一跳，但是后者看来现在正在证明大亨们仍然握有那种巨大的本钱，用以保持对在美国这个公司国度里的实权的垄断。

那些不享有特权的亿万富翁们将会从这次经验中总结出什么教训呢？当然，现在我们还并不肯定地知道。但是，看来他们大概会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是不可分的。如果你想要有经济权力，那你就必须同时把目标对准政治权力。这种想法可能引导他们下一次就去设法首先抓住华盛顿的关键的立法和官僚机构，这样这些机构

将能帮助他们日后向公司体系的内圈发起进攻，而不是阻挠他们。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就会需要一个政治工具，用以反对公司体系所控制的共和党和民主党。

对于法西斯类型的运动来说，暴发户的资本往往是这种运动的财政支持的重要来源，而这种运动则力图利用普遍的不满情绪和怨气来推翻现存的政治结构。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新的集团的兴起和受挫折，很可能接着将大大加强各种法西斯倾向，而1968年乔治·华莱士的总统竞选活动就说明，在美国的某些地区和人民的某些阶层中已经确有这种倾向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很可能是：老的财富集团由于害怕法西斯的胜利会影响它们自己的权力，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依靠它们的久经考验的政治武器。

在目前的阶段，我们只能肯定地这样说：现在已经看得出，在今后的一个时期政治局势将非常混乱和非常不明确，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合并运动进程则看来肯定会使这种局势更加复杂化。

对多国公司的几点看法

1969年10月—11月

现在已经有大量关于人们愈来愈多都称之为多国公司的著作。^① 多国公司指的是,在一国设有总公司并在其他国家设有各种各样子公司的那类公司。可是,这些著作中简直就没有一本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的,这一事实对于美国(就这问题而言,对任何其他地区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现状是个很好的说明,因为这显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本论文的目的并不是试图用概括的方法来填补这个差距,而是要提出一些关键问题并建议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寻找答案。

—

首先,就“多国公司”的名称谈几句。毫无疑问,在很多的

^① 举出这方面的三项主要著作如下:(1)贾德·波尔克等著:《美国在海外的生产和国际收支》,全国工业会议理事会,纽约,1966年版。波尔克是个经济学家,国际商会美国理事会的代理会长,先后写过不少有关对外投资的研究报告和工作备忘录。(2)雷蒙德·弗农:《多国企业和国家主权》,载《哈佛商业评论》,1967年3—4月。弗农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学教授,负责主持一项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有关多国企业和国家主权的大规模研究,并把写成的东西叫做“临时报告书”。(3)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美国在海外的商业:关于直接投资的六次讲演》,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1969年。金德尔伯格是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所著的《国际经济》一书也许是这个学术领域里的主要教科书。为了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从《美国在海外的商业》一书的注释中搞出一份很有用处的书目表来。

著作中,使用这个名称是为了进行宣传 and 辩护,认为国家的缺陷和对抗被克服了,因而出现了一个前途富有希望的新机构。但当我们进行分析时,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荒谬的。目前我们只想谈谈以下这个问题:是放弃使用这个名称,还是清除这个名称的伪辩性并用它来进行科学研究。

这个问题决不是一个新问题,而且很难说已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解答。譬如说,这种情况同有关“第三世界”的名称问题就很相似。“第三世界”名称的原义是想用来勾画出一些国家的面貌,这些国家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选择它们自己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苏联集团的官方人士除外),当然知道这种勾画捏造得象九元一张的钞票一样虚假^①。这些国家真正是被全球性资本主义制度压迫和剥削的大多数,而这些国家要真正得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条道路。了解到这一点,他们究竟应当抛弃和不信任“第三世界”这个名称,还是采用这个名称并设法给它以新的含义呢?总的说来,看来他们是选择了后一种办法。这可能是基于以下这个假定:既然这个名称已经通用,而且无论如何也还会被人使用,那么最好能够把这个名称的伪辩性去掉就行了,而且从总的情况来看,这种处理办法也还相当成功。例如,对于皮埃尔·贾勒把他写世界帝国主义剥削的书定名为《对第三世界的抢劫》,就没有人感到是不妥的。主要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活动家们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

^① 美元没有票面值是九元的钞票,其他货币也没有,以此来说明“假得太厉害了”。——译者

为“第三世界”这个名称只是用来指大量情况很不相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国家的简便的总称。正是这些国家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金字塔的基础。

我们感到，对待“多国公司”这个名称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这个名称已经被广泛使用，几乎可以肯定，它是经得住任何可能对它进行的攻击而能够存在下去的。此外，谁也不会怀疑这个名称所涉及到的现象的现实性。我们也同样可以尽力去掉这个名称的欺骗性，象对待“第三世界”名称一样，使它成为描述和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现实情况的一个有用的名称。

二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多国公司的多国性的确切性质和界限。它之所以是多国性，是指它在许多国家营业，不是为了按国家来分的各个企业单位，而是为了整体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我们将会看到，从它的这个特征产生出一些关于多国公司的最重要的后果。我们的确可以说只有这一点才是构成使用“多国”这个名称的正当理由。在所有其他重要方面，我们都象在同一国的公司打交道一样。当所有权和管理权同属一个国家，没有分散到公司的整个体系去时，情况就更是这样。这个通则有两个例外，即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和尤尼莱佛公司。在这两个公司中，英国资本和荷兰资本真正通过庞大的、平行的领导机构来分享所有权和管理权。但是，这两个例外都属所谓最老的那种多国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出现的二、三百个多国公司中，没有一个是照此办理的。

与人们普遍的期望相反，特别是欧洲共同市场并没有出现由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分享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新的多国公司。跨越国界进行合并和接管的事例倒是不少，许多欧洲的大公司当然和在其他国家的对等公司作出了一些工作安排，但是我们不知道有过任何真正分享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新事例。

在这里，我们要同辩护士们的著作中最顽固的论题之一正面交锋。这些作者们说，诚然一直到现在，任何多国公司都是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所拥有和控制的，但是，趋势是走向股票持有和经营管理的真正国际化。为了支持这种观点，他们引用了两个事实：外国人（主要是欧洲人）通过美国股票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高达百亿美元；多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在其中级，甚至是高级管理机构中愈来愈多地雇用了当地人。这些辩护士们硬说，假如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多国公司受一国支配的局面就会被打破，它们就要成为所谓世界公民，而不再是哪一个国家的公民了。

这里不必为这些事实进行争论，尽管事实并不象有时被断言或暗示的那样有份量。真正要争论的问题是他们对这些事实所作的解释。关于股票所有的问题，摘录《纽约时报》1968年2月22日的一篇报道中的以下一段是很有启发的：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专家们指出，在欧洲资本流向美国证券市场和美国大公司在欧洲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一种联系。

这些专家们说：‘欧洲人……所买的美国大公司股票正是美国大公司投资到欧洲的资本的那一部分’。

这事实上意味着，欧洲资本和美国经营管理当局联合在一起向欧洲投资。这是可以断言的。”

由于欧洲的股东，正如美国的股东一样，通常对经营管理的组成和政策方面不起什么影响，这就等于说，许多欧洲资本家并不把资本直接投资到欧洲的企业，而是把资本交给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来处理。所谓所有权的“国际化”就这样变成了美国资本控制外国资本的许多途径之一。

谈到国外子公司雇用当地人作职员的问题，这同分享控制权是完全不相干的，因为控制权是原封不动地属于母公司的。如果母公司的董事会和最高管理机构也开始有很多外国人参加，那自然是个值得仔细分析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发生过这类情况。也许有个别外国人是某些多国公司的董事会的成员，但是我们还没有见过任何外国人担任最高经理人员职位的例子（如果有任何这类情况，辩护士们的著作准定得大吹大擂一番的）。英国《现代经营管理》杂志驻美国通讯记者约翰·撒克里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看起来至少是打了折扣的说法）：

“在大的国际公司中有两大类经理人员。一类是母公司的本国经理人员，在国内、国外或者总公司指挥业务活动；第二类是管理国外分支公司的本地经理人员。

“有关的人员很少谈论这两类不平等的人员的存在。就算承认其存在，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公司的思想体系认为，人人都有得到提拔和成功的同等机会——每一个勤勤恳恳干活的经理人员在他的办公桌的某个抽屉里都摆着日后当

总经理用的计算尺和当总经理用的名片。

“两类经理人员之所以存在是有一些合理且充分的理由的。但是，它的存在却严重阻碍多国公司建立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国际化的管理机构 and 一批国际化的经理人员，在这类多国公司里，一个人的国籍并不比他的领带的颜色或鞋子的样式来得重要。由于这两类经理人员的存在，我们可能永远也理解不了究竟什么才算是经理班子的多国性的严峻考验：例如，一个意大利人当了美国人拥有的多国公司的总经理，或者一个拉美人在主管荷兰人拥有的多国公司。”^①

所有这一切都不应该被认为是意味着多国公司中存在着第二类低一级的经理人员是不重要的。恰恰相反，这些人员构成了多国公司业务所在国当地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他们的利益(工作、薪金、奖金、提升)决定于母公司；他们只有把本职工作搞好并且表现得忠心耿耿才有希望得到提升和成就。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母公司的利益往往是和它业务所在国的利益相互冲突的。因而，如果多国公司不象他们经常所宣传的那样对他们的管理机构实行国际化，他们势必会使他们业务所在国的一部分当地资产阶级非本国化。这自然削弱了当地的资产阶级，使得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更难以抵制来自强国的要求和压力。^②

① 约翰·撒克里，《毕竟算不得那样多国性》，载《相互作用》，1968年11月号第23页。（这篇文章是总标题《多国公司——大亨们的光辉和苦难》论文集中的一篇）

② 这部分当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外国公司的利益的一致超过了同他们本阶级和本国利益的一致，而且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不限于直接受雇于外国公司的那些人。这里也包括其他的各种人，如供应商、转手承包商、律师等等，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靠外国子公司的。

三

前面引用过的约翰·撒克里的一文说：“资本有它自己的国籍。”假如我们理解得正确的话，这是完全对的。资本的国籍并不属于资本所在的那个国家，而是属于掌握这些资本的人。一般地说，这意味着资本的国籍也就是拥有资本的人的国籍，但是，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例如，一个德国的公司从法国的银行借了款，这笔款就归德国人掌握，成为德国资本的一部分，一直到借款归还为止。因此，某一国的资本把另一国的资本攫夺过来并加以合并，在原则上讲是可能的。

但是，人们也许要问，资本属于哪一个国籍又有什么要紧呢？难道资本不是和与它密切联系的货币完全有同一种性质吗？难道资本不能完全和货币一样发挥其作用，不管哪国人掌握它？这都是一些难题。简单的回答是不适宜的。但是，为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指出以下就够了：资本虽然具有其量的方面，但基本上不是一种东西或物质，而是一种关系。在抽象理论的领域里，假定在有一种由大量的小竞争单位组成的单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要研究的关系就是：数量相对少的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数量大许多倍的一无所有因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阶级之间的那种关系。资本是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手段，然后把两者结合起来，而产品则是按补偿已消耗的价值并加上剩余价值的情况下出售的。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但却被资本家侵吞了。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可用来剥削工人的资本。工人之所以是工人（无产阶级）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本，因而不得不在忍受饥饿痛苦的情

况下受剥削。^①因此拥有资本纯粹是剥削工人的权利。所有的资本家都有这样的权利。因此，资本家们在如何对待工人方面利益是一致的。总之，资本是有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事情就更复杂了。那种认为由大量互相竞争的单位组成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概念，尤其是个极其抽象的概念，而且它意味着存在一个协调一致的、没有分裂的资本家阶级。这个概念作为一种说明或教学手段是有些用处的，它只和一个国家(英国)的某一时期(十九世纪中叶的三十多年)的实际情况相近。但是，要把这个概念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或长期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一部分，则还需大大加以修正才行。

事实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始终或多或少地受到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障碍——地理的、政治界限的、需求和成本方面的特殊情况等——所阻挠。这些障碍造成了资本家之间的地位不平等(也造成了工人之间的不平等，但这个问题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内容无关)。有一些资本家在剥削工人方面有比较优越的权利；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更重要的是，有一些资本家能够(例如通过垄断价格)把另一些资本家腰包里的剩余价值掏到自己的腰包来。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不再仅仅是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之间的普遍化的剥削关系了，尽管所

^① 这个论题当然象一条红线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著作的整体中。对这论题的解释和论证再没有比《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篇题为“所谓的原始积累”更加有力的了。(《资本论》，克尔编，第一卷第八篇。应当注意到，《资本论》的不同版本中，篇、章、节的划分并不相同。)我们觉得，无论谁开始学习《资本论》，最好在读第一章“商品与货币”之前，先学习这一篇。

有资本都具有这种性质。现在的资本家发生了分化，一部分资本家在剥削工人和或剥削其他资本家方面拥有比另一部分资本家更大的力量。以前阶级之间的简单关系现在变成了既是阶级之间又是阶级内部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阶级间的冲突仍然是基本的，但是现在又加上了另一些起伏的冲突，这些冲突有时在有些地方还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国家界限一直是世界上资本家阶级内部之所以存在着最深刻和最持久的分裂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的起源时期。资本主义并不是完全形成之后才在世界上出现的，如同雅典女神离开宙斯神的头那样。^①资本主义是城市中新兴的市民阶层同封建贵族进行了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的结果，而且是一个一个地形成的。在这些斗争中，资产阶级通常和一些国王或王公们结成联盟，而这些国王和王公们为了对他们自己的封建领域行使统治权进行过长期的斗争。通过这种方式，一系列民族主义的君主国家先后出现了。随着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体系范围内得到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增大到能够迫使君主成为挂名领袖的地步，听任资本家不但控制经济而且控制整个国家机器。

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自然要利用它对国家的控制，提高资本的盈利率，如制定一些有可能对工人榨取更多剩余价值

① 古希腊传说宙斯是“众神之父和万人之王”，他和聪慧的女神墨提斯生了智慧的女神雅典娜。宙斯害怕墨提斯会生下一个比他更强有力的子女，于是当墨怀孕时他就把她一口吞了下去。后来宙斯感到头部疼痛，就叫匠神用铜斧把他的头辟开，这时全身披挂的雅典娜就大声呐喊，从宙斯的头里跳了出来。

——译者

的措施，在国内市场上排除外国人，制定适宜的征税和开支政策，强迫弱国接受不平等条约，征服其他领土或合并某些殖民地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再提什么资本在性质上是协调一致的了：资本的力量和盈利率不仅是资本在数量方面的职能，而且也是资本的其他具体特征方面的职能，其中，国籍就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这方面要补充一点。那种把资本单位和国籍割裂开来的想法本身就是矛盾的，然而根据一些辩护士的理论，跨国公司正是在变成与任何国籍无关的过程中。资本是一种特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决不是天然的和永久的，而是属于历史范畴的和可变的。这种生产关系意味着一些阶级和集团被另一些阶级和集团剥削的生产关系，是通过激烈斗争建立起来的，而且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强制工具，即国家，才能维持其存在。因而没有国家的资本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按照今天世界的组成状况来看，只有国家才有国家机器，根本不存在什么超国家的国家。因此，要让资本存在就必须要有国家。例如，如果资本所属的那个国家的国家机器崩溃了，那么资本也就失去了不可缺少的保护者了。然后，这一部分资本要么被合并到另一个国家的资本中去，要么就由某个革命政权加以接管，不再成其为资本了，而这种革命政权致力于废除全部这种生产关系，资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最后，一个国家的资本所以能够在其他国家进行活动，只是因为所有的资本家阶级基本上都保持类似的生产关系，并且他们感到，从全局看来，允许这种资本的国际流通是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的。

四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的确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①这里有两个基本的理由。第一，资本家(资本所有者和运用者)的权力和地位同他的资本的大小成正比。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往上爬的途径就是积累资本。第二，任何裹足不前的资本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正如马克思在他的光辉著作中指出的那样：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使那种投在一个产业企业上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竞争会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当作外部的强制规律，统治着每一个资本家。它强迫每一个资本家为维持他所有的资本而不断去扩大他所有的资本，但资本的扩大只有借助于累进的积累。”(《资本论》，克尔编，第一卷，第 649 页。)^②

这些考虑对于早期的公司资本家和个体资本家都同样是适用的。而且他们都深深地具有企业世界的这种思想意识：即对增长的崇拜已经到了信奉世俗宗教的地步。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大公司的年度报告说：“这个公司或其他任何公司的真正安全只有通过健康的、不断的、有活力的增长才能达到。一个公司就象一个人一样。当它停止增长，当它不能通过增长来补充自己时，那么它就开始恶化……。没有增

^① 特别参看《资本论》，克尔编，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和第七篇第二十四章，第三节。

^② 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49 页。——译者

长、发展和继续改善的机会,就没有安全。”^①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抽象词汇来说,增长意味着把一个时期内一个资本单位所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加到下个时期的资本中去。较大的资本产生较大数量的剩余价值,这就使增长增加得更快,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传统地集中研究个别资本单位的这种行为对于整个经济产生的全面影响。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谓的企业学说一直不适当地忽视了这种螺旋形过程(资本——剩余价值——扩大的资本)的含义。下面高度概括的描叙也许可以帮助提供一些线索,顺着这些线索进行一些有成果的研究。

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们都是从一个互相竞争的工业中的一个厂商开始讲起,我们也这样办。它的产量在总产量中的比例是小的,它的产品和受同一市场欢迎的所有其他厂商的产品大体上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厂商的生产只能上升到这样的一点,即生产出一个追加单位产品的成本等于市场价格(超过这点,成本就超过价格,因而就使利润减少了)。这就是著名的平衡状态,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并不以之作为学习的开端,而是视为这个课题的结束。

当资本家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地位时,有利可图的途径就一清二楚了:他必须降低成本以便增大他的利润限界(假定他能够按照现行市价出售他的产品,所以他不存在销售的问题)。降低成本通常是要扩大生产规模,引进新的、改进了的技术。凡是这样干得有成就的资本家就兴旺发达起来,而落

^① 引自罗克韦尔——标准公司的1965年年度报告。该公司以后和北美航空公司合并为北美罗克韦尔公司。

后的资本家就会被抛弃在路旁。

可是这种过程无论如何不可能无限期地这样继续下去。成功的厂商的增长和失败的厂商的消失造成厂商平均规模扩大的时候的到来，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时的每个厂商不再是很多厂商中的一个小生产者了，全把市价作为按最有利可图的方式去调整生产的依据。和以往不同，现在每个厂商的产量在这个工业部门总产量中都占有很大比重，因此每个厂商势必考虑到它自己的产量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可能性，人们以不完全的或垄断的竞争、接近于垄断和垄断等为题目进行过一些适当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只需指出，每个厂商除了继续谋求降低生产成本外，他们都力求使自己尽可能接近垄断的地位，要么单干（使产品与对手的产品有所不同），要么集体干（公开地或者暗中和对手勾结起来），这已成为每个厂商所采取的正当途径了。因此，为了进行理论分析，作以下的假定也许是适宜的：一个典型的厂商就象一个垄断者那样行事，把产量降低到生产一个追加单位产品的成本等于市场价格这个水平之下，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当这种情况在大部分主要工业部门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已经进入了垄断阶段。

根据我们现在的观点，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垄断阶段中，每个厂商面临的生长问题出现了根本不同的情况。它不再简单地是个不断降低成本和扩大同等质量产品数量的问题了。降低成本当然仍旧重要。但是，现在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就要求在增加产量方面采取放慢政策。因此，如果这个垄断厂商仍然把自己局限于它一开始和早期发展的工业领

域內，那它就不能指望得到继续增长。这并不完全排除这部门工业的扩大生产，但是，扩大生产完全受成本和需求的因素所限制，而这些因素和这个厂商的能力完全无关，也就是说，增长的愿望取决于是否有利可图。因此，垄断厂商受到来自内部的强制力的驱使，走向它固有的业务领域以外和更远的领域。这个厂商愈是走向垄断，需要安排和希望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数额就愈大，这种强制力的力量也就愈大。

至此我们感到，我们基本上阐明了近代资本主义历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现象之一：即公司愈来愈大就要在工业方面和地理方面起变化的趋势，或者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个趋势是，一方面变为一个集团，另一方面变为一个多国公司。今天美国 200 家最大的非金融性公司（这些公司合起来接近于占全国工业力量的一半）的大多数都已经发展到集团化和多国化的阶段了。

五

在前面一节里就提出了以下的论点：资本自我扩张的过程通过竞争和垄断两个阶段。在竞争阶段，每个厂商的发展是依靠：降低成本、赚取较大的利润、在增加生产能力方面投资——生产同竞争者的产品本质上没有差别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总是能够按照现行市价或者可能稍微低一点的市价出售。大体上照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厂商生意兴隆并且壮大起来，而另一些厂商落在后面掉了队。每种工业中的一般厂商变成如此强大，以致于必须考虑到它自己的产量对市价产生的影响。就这样，它开始越来越象一个垄断者那样行事了，它

的继续增长问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垄断利润使它有可能比以前更快地增长，但保持垄断价格的必要性要求它采取放慢政策，并且审慎地调整扩大生产能力的问题。由于各种因素同时发生作用，结果产生了一种难于抵挡的动力，驱使垄断厂商向它们固有的业务领域以外和更远的领域发展，侵入新的工业和新的市场，一句话，走向组成集团和多国公司。

这并不是说，垄断厂商之所以大力向国外投资仅仅是由于寻找剩余资金投资出路的压力所造成的。例如，资本总是流向有可能利用低工资进行剥削和其他成本便宜的地方。同时垄断阶段又加添了另一条战线。某一工业在垄断的情况下，通常是有不止一个，而是几个占统治地位的公司。因此，当居于领导地位的厂商之一向某个外国投资时，同一行业的竞争巨头们马上就会跟踪前往，以保证它们在当地市场上获得“适当的”份额。此外，关税壁垒、专利权和当地的其他条件造成这种情况：大公司发现它们通过投资比仅仅出口产品更能控制某一外国的市场。的确，大公司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有设法控制世界大部分市场的手段，而且，为了它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它一定会继续争取这样做。

了解到下列一点很重要：在断垄情况下，所谓资本总是从利润低流向利润高的工业和地区的这个通则不再适用了。垄断本身的定义就是防止资本自由流向受保护的高利润领域；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在这领域据有牢固地位的垄断者小心翼翼地不让投资超过当地所能负担的程度，同时却又向别的地方寻找剩余资本的出路。因此，资本流动的方向和传统经济理论所指出的方向恰恰相反的情况不但是可能的，而

且可以说是很普遍的。^①

单凭这一个事实就足以驳倒资产阶级学说所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据这个教义说,任何寻找最大利润的资本流动都会自动地保证资源得到更有效的调配(还有其他理由可以说明这个被视为普遍法则的观点为什么是谬误的,但那些理由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除非有其他情况,它指的完全是那些已经进入了垄断阶段并且正在向新的工业和新的地区扩张的大公司。控制美国经济的大部分大公司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西欧和日本的大公司的情况也在日益变为这样。

扩张的过程可采取两种形式。原公司可以在这个工业内或它进入的国家内建立新的企业;或者买下某个现成的企业。我们还不知道任何经验主义者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据我们看来,一般都宁愿买下现成的企业。而且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在一个新的领域或新的地方从头建立一个据点势必是费用昂贵而且花费时间的。而收买一个现成的企业,则既不费事又省时间。至于说打算收买的这个企业生意好坏的问题那倒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对一个脆弱的公司有更多的文章可做,因为用比较便宜的价钱就可以把它买下来。而且无论如何,总公司通常总是要按照它自己的式样来改组新的子公司,并且充分利用由于规模宏大和力量雄厚给它带来的有利条件。

这些有利条件是什么呢?人们通常总是想到大公司之所

^① 研究一下美国汽车工业的情况就可以明显地证实这些看法。一方面它是美国垄断化程度最高的和利润最高的工业,而另一方面,控制这门工业的三巨头却继续大量地向其他工业和国外进行投资。

以兴旺发达，是因为它有能力通过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得到好处。自然，这种论证方法是有相当价值的。但是，当它扩张到新的领域中的时候，经济规模问题对于事业的成败的影响就很小，甚至是没有影响。第一，因为新领域中的工艺可能和原工业的工艺完全不同，大规模的生产方法可能用不上。其次，因为当一个公司在外国建立工厂生产它原来的产品时，它会按照市场的规模来慎重地确定它的工艺，而不是照搬它国内大规模生产的方法。^① 大公司的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不在生产本身，而在其他方面。它们当中主要(没有必要按其重要次序排列，因为重要性会随着具体情况发生变化)有以下：(1)拥有充足的资本进行投资，而且在国内和国外金融市场上可以几乎没有限度地按优惠条件得到信贷；(2)拥有大量有经验的优秀管理人员，可以根据需要把他们派到属于该公司管辖的任何地方去；(3)拥有一个庞大而且有效率的销售机构，该公司所属单位都可以加以利用；(4)拥有研究和发展机关，为了解决各种技术问题和市场问题，可以随时投入工作。小的独立公司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欠缺的，因而就没有能力去同巨大的多国公司集团之一所属的子公司进行不相上下的竞争。因此，只要这种子公司一进入某个新的领域时，它往往会很快地向前发展，直到同其他少数几个大公司并列于领导地位。到这时，竞争行为就得为垄断行为让路了。这个新近成熟的子公司所获取的利润开始比它能够安全投资的数额要多，这些

^① 汽车工人联合会老会员利奥·芬斯特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指出，为了适应它们在拉丁美洲低产量的工厂的需要，美国大汽车公司设计并使用了崭新的低产机器和设备。《墨西哥汽车诈骗案》，载《民族》周刊，1969年6月2日。

剩余的利润就流回总公司所保管的资本总库。这时，这个子公司从本来是剩余资本的出路所在变成了剩余资本另一新的来源，从而刺激整个公司去寻找可以进行扩张的其他新地区。总之，这个子公司变得更加集团化和多国化了。按照逻辑推断，这个过程最后将要导致：要么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主要工业都被几百家大公司所控制，要么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被推翻。在目前，看来我们走向第一种结局的步伐要比走向第二种结局来得快些。国际商会美国理事会的贾德·波尔克提供的下列估计，至少就数量方面而论，看来是有道理的：

“国际投资及其产量在过去二十年当中增长的速度比世界总产量〔国民生产总值〕大一倍。其结果是，生产国际化的部分现在已占世界总产量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比重在继续增长。在世界市场中占所有产品的几乎四分之一已经是国际公司的产品了。假定世界总产量按照六十年代典型的速度继续增长，国际投资的产量也同样按照六十年代典型的较快速度增长，我们预料到本世纪末，粗略的估计数字如下（表省略）。这个最后数字（53%）说明世界经济的一半以上将是国际化了的。”^①

波尔克所说的“国际化”自然是意味着被一小撮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多国公司吞并掉。

假如情况象现在这样下去，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展望。应该把它和辩护士们的著作中的一些神话般的故事来进行对

^① 贾德·波尔克，《生产的国际化》油印本，国际商会美国理事会出版，1969年5月7日。

比,因为这些著作企图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假如他们不是公开说的话):多国公司能够大力帮助不发达的国家建立由他们自己控制的工业。因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 P. N. 罗森斯坦—罗丹——他可决不是大公司的最使劲的辩护士——在谈到拉丁美洲时,预见到将逐步把多国公司从它们在拉丁美洲的子公司分开并撤退出来。在指出了“外国股东和东道国在观点上的一些主要冲突”后,他接着讲:

“这些冲突是严重的,但不是不能解决的,只要彼此谅解,是能够和解的。将来外国剩余财产投资的理想的总格局将是最后由当地国持有多数股票的合伙经营。这个本国化的数额按预先的协议将占到外国企业股票的 51%。这样消除紧张的结果将改善投资的气氛到这种程度,即外国投资者可以改变对新格局的敌视和踌躇的态度,开创出一个新的共处局面,学会在持有少数股票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经营管理的问题。”①

人们倾向于表示怀疑,如果投资到国外的 51% 的股票被卖掉,这种“新的共处局面”怎么会有助于多国公司把本来对它们可以增值的大量资本来进行投资。但是,这种说法没有抓住要点,即多国公司实际政策的总方向,并不象罗森斯坦—罗丹博士所喜欢的那样,是要增加它们在国外子公司持有股票的数额,如有可能就增加到百分之百。甚至当地资本家只持有少数股票,它至少总是潜在利害冲突的根源之一(举一个

① 美洲国家发展银行,《多国投资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与一体化》,朗德泰布尔出版社,波哥大,哥伦比亚,1968年4月,第78页。

极端的例子，假如母公司想关闭它在某一国家的所有营业机构并移往他处)。当地资本家握有大多数股票自然就意味着母公司丧失了控制权的决定性要素(如对原料来源、生产方法、价格和市场份额的控制)，而这些都是作为企业总体的多国公司机构的本质和目的。甚至当它们被迫接纳当地的伙伴，他们的目标也总是在合伙关系的幌子下，操纵当地的法律和政客，以便把决定性的管理权保持在他们自己手中。由于资本固有的扩张趋势是垄断公司增长的原动力，只有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对所有有关的可变因素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都有保证时，才能使赚取利润和继续不断地扩张这一过程的目的得到落实。正如他们在企业报刊所喜欢说的那样，这个游戏的名称就叫做增长(在世界范围内)，而不是缩小。除非或直到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它干，多国公司肯定是不会把股票卖掉(或者洗手不干)，从而丧失对它们说来如此重要的控制权。它们现在是买进而不是卖出股票，而且它们正在竭尽全力让这种局面维持下去。^①

六

前面分析中的一个含义特别值得提一提。巨大的垄断公司愈加集团化和多国化，它们的最高管理机构脱离任何具体产品和生产过程也就愈远。总公司关心的愈来愈是纯粹金融方面的事务，即利润和积累方针的决定，而把生产、工艺等问题的处理权交给下属机构，子公司和负责生产甚至在更大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爱德亚多·加里诺，《巴西工业取消国有化》，载《每月评论》，1969年12月号。

的程度上是负责公司许多产品销售的工厂经理。例如，这种情况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公司结构中就充分地得到了反映。这个最大的汽车公司的总部设在金融中心的纽约市，它的国内主要工厂则分布在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及其附近，它的生产、装配、销售方面的子公司遍布于全世界好几十个国家。我就不相信那些住在纽约的绅士们关于汽车制造方面的知识会比我们这些人懂得多。但是，事实清楚地说明，他们对于如何赚钱的知识可比我们多得多！

这意味着多国公司中的最大的公司往往只是些掌握公司所有权的公司，并不进行什么业务活动，而且愈来愈是一个金融实体，每年收入和处理好几十亿美元，完全根据金融条件来制定它们的决策（在有关的企业著作中，把这些公司的收入同它们业务活动所在国的国家收入进行比较的奇闻逸事和说明材料可多啦，这些材料都是想要证明这些企业实体所具有的优势）。它们自然和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关有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是这些金融机构的非常重要的顾客和业务伙伴。就“控制”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得发生的问题，因为它们之间没有严重的利害冲突以致于会干扰它们间顺利合作的关系。不过我们的猜想是，如果讲到影响的话，通用汽车公司或美孚石油公司完全能够从一个象大通曼哈顿或第一花旗那样的大银行得到它所想得到的东西。

简单地说，多国公司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金融资本的关键体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特征（1917年）需要稍微加以修正：“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

的内容。”^①

七

多国公司和它业务所在的外国之间自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大多数辩护著作总是力图降低语调，要么把它说成是不很严重，要么说是可以补救，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下面我们把这些矛盾的内容列出一个相当全面的表，整理为这些外国感到的“主要的六怕”：^②

(1) 怕国际公司拿走的东西太多，留下的太少。这种担心常常表现在：外国大公司拿走国家的资源(石油、铁矿、粮食等等)、所有的利润、当地最有才干的人(从而有头脑的人也就所剩无几了)而只留下了少许领低工资的次等人才，说工资低是指比在国内的母公司的工资低。^③

(2) 怕国际公司会粉碎当地的竞争，并且很快地垄断当地市场，如果不是垄断当地全部经济的话。“谁能和拥有巨大技术资源而且它的每年销售额超过了法国国家预算的一个大公司去竞争呢？”

(3) 怕国防上和世界市场竞争所需要的现代化工艺依赖外国供应。

(4) 怕国际公司的当地子公司会被母公司所属国政府当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页。

② 商业国际协会，《国际公司和国家》，纽约，1968年5月(油印版)。

③ 造成这种恐惧，可以用总公司在洛杉矶的多国公司塞浦路斯矿业公司对塞浦路斯的掠夺作为一个典型的实例，这个实例在《对外投资》一文中已进行了分析，载《每月评论》，1965年1月号；上面已全部摘引，第31—32页。

作外交政策的工具。以美国的子公司为例，怕美国政府对一些市场(红色中国、古巴、北朝鲜、北越)实行禁运；或者怕美国政府禁止母公司将某些对当地国防和其他方面有用的工艺技术送交给子公司；或者怕美国政府会阻止美国的母公司向当地子公司输出新的资本，并且要求当地子公司实际上把全部收益汇回本国，这样就使当地国政府的国际收支蒙受损害。

(5) 怕把好的职位都给了母公司国家的人而不给当地人。

(6) 怕母公司会无情地作出决定根本不管对当地城市、省甚至全国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例如，决定关闭一个工厂，从而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

不用说，这些害怕都不是胡猜乱想的产物，它们都是根据许多痛苦经验的总结。它反映出来的这些利害冲突本质上都和多国公司最基本的特征有关系，即多国公司内所属各单位的政策都是由一个中央管理机构制定的，都是着眼于整体的(即母公司)利益，而不是着眼于不同部分的利益。从总公司所有者和经理们的观点来看，这显然是应予遵循的正确途径，而且也的确是唯一可能的途径，因为首先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可以想得到的理由把多国公司这个实体维系在一起。但是对各部分来说(以及对它们业务活动所在的社会和国家来说)，那就意味着多国公司简直就不存在什么必须在制定它们自己政策时加以考虑的利益。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列举一大串具体事例，说明母公司的利益是如何(有时是偶尔的，有时事实上是一贯的)不把子公司(被认为是不同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益放在眼里的。不过，我们可以再从那些对多国公司很友好

的资料中举出一两个例子,来说明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每一个主权〔国家〕都知道,一个可以为东道国产品提供出口市场的多国公司也同样可以撤离这个市场,并把依靠这种出口为生的职业都一笔勾销掉。如果在尼日利亚生产某种部件的成本终于比意大利低,这个公司集团就可以把它的业务点从意大利搬到尼日利亚。

与此相类似,一个能够为东道国政府的经济提供外国资本的多国公司集团同样可以把资本撤走用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外国投资者在拉丁美洲经常遭到‘非资本主义化’的责难。”^①

以上的最后一段指出了多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根本的利害冲突。正如保罗·巴伦曾雄辩地论证过,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它的生产剩余额的大小和利用的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被多国公司渗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生产剩余规模的大小和其利用的控制权都操纵在不同国籍的外国资本所有者或其官员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多国公司虽说不算是东道国一切经济发展的敌人,但至少算符合这个国家任何阶级或集团利益的一切经济发展的敌人,只有那些丧失了国民性并供外国资本驱策的人除外。

八

多国公司和它业务所在的外国之间的利害冲突造成了多

^① 雷蒙德·弗农,《多国企业和国家主权》,载《哈佛商业评论》,1967年,3—4月号,第163页。

方面的政治斗争，在跨国公司所占比重最大的一些不发达国家里就更是这样。在这些国家里，当地资产阶级是分裂的，而且大都不能独立活动或采取主动。很重要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其余的很多资产阶级则被社会革命给吓呆了。因此，当地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一般说是亲帝国主义的和反动的。它的统治因而也得到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国的支持。实际上这意味着不发达国家的当地资产阶级的主要后台老板就是美国，因为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是美国的公司。再引雷蒙德·弗农的一段话如下：

“这些跨国公司的绝大多数都是由具有美国法人资格的母公司来领导的，而这些母公司的绝大多数主要是属于在美国居住的股东所拥有的。如果把每家在半打或半打以上的国家拥有并控制生产设备的美国大公司名字列一张表的话，那么这个名单就会有 200 家左右。

固然，把同类的欧洲大公司也列一个表，那就会包括尤尼莱佛公司（英、荷）、鲍沃特斯公司、飞利浦电气公司（荷）、奥利维蒂公司（意）、雀巢食品公司（瑞士）、汽巴公司（瑞士）、贝西奈公司（法）等久负盛名的公司以及其他几个公司。但是欧洲的名单要短得多，大约只有 30 家公司左右，而且这些公司的海外利益还不及美国在海外利益的五分之一。”^①

为了把美国方面的情况说清楚，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政府正是由那些把触角已经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公司所控制

^① 雷蒙德·弗农，《多国企业和国家主权》，载《哈佛商业评论》，1967年，3—4月号，第158页。

的。美国的政治“科学”当然不承认这一事实，但是，凡是直接和政府工作有关系的人们对此是很清楚的，虽然他们不经常这样说。象美国电讯交通委员会委员这样一个政府高级官员尼古拉斯·约翰逊先生在最近一次电视节目中就爽快地承认了这个事实：

“基本上，我想你们必须先从以下这个现实情况出发，即这个国家主要地是由大企业所操纵，是为富人办事的。或许你必须住在华盛顿才了解它，或许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能直觉地感觉到，这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我想，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只是民有的政府了，这个‘民’肯定是指公司，而且是为富人办事的。”^①

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当地资产阶级及其美国后台老板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包括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农民和工人、小资产阶级、学生和知识分子及军队中的一些成员。由于没有进行革命（革命目前还是他们最后的威胁，不过迟早一定会成为他们的目标），农民和工人大都被排除于政治舞台之外，虽然这些阶级的一些分子可能支持民族主义的政体，这种政体主要是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由知识分子和军人来领导的。这样的政府或者试图组成这种政府的那些人的目标，并不是剥夺或者驱逐多国公司（这样将会卷入反对帝国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去），而是设法缩小多国公司的范围，限制它们行动自由，采用各种经济和政治压力，迫使它们的活动比以前让它们自由行动时更加符合国家的利益。今年早些时候

^① 美国广播公司“迪克·卡维特的电视节目”，1969年8月25日。

夺得政权的秘鲁军事独裁政府就是这种政府的一个好例子。它的头一批行动之一就是沒收了新泽西美孚公司的子公司国际石油公司的财产。这个公司和秘鲁政府为了征稅问题爭吵了半个世纪多，因而在这个过程中已成为秘鲁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①这个政府也进行了土地改革，从而打击了另外一个多国公司——W. R. 格雷斯公司——的利益。但在此同时，这个政府又明确表示它并不想大规模地打击外国资本，尽管从外国资本的观点看来这种威胁总是存在的：这种局势可能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而这个政府，或者可能接着出现一个更激进的政府，将会不顾一切采取全面国有化的计划。

可以看到，由于存在着这样的背景，对多国公司来说，这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陷阱和危险的世界。多国公司最基本的要求是：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到任何地方去做生意，不受任何外部权力的限制。用上面引用过的国际商业协会的文件的话来说：

“国际公司为了要最大限度地扩大企业的增长速度、竞争能力和利润，无论在什么地方或在什么时候都需要自由地移动资本、原料、技术设备和技术人员。它们需要有根据经济方面的理由来作出决定的自由。为了对竞争、对新的机会和威胁、以及对来自消费者、工人和投资者的压力等作出反应，这种自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国家不能给予这种包罗一切的自由，除非否认它们

^① 关于国际石油公司争端的背景，参看哈维·奥康纳，《世界石油危机》，每月评论出版社，1962年，第17章（“秘鲁：美孚石油公司的势力范围”）。

作为国家的本质，那就是说，否认它们是有主权的一个集合体，而主权则意味着绝对有权管理它们自己的事务，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此，多国公司和国家是彼此根本对立，并且这种对立是不可改变的。每一方的逻辑，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另一方。或者换个方式来说，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程正在导致以下两个结果中之一：要么是世界帝国，要么是世界革命。

多国公司所在国的民族主义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就是反民族主义^①。难怪，这种意味深长的反民族主义竟会在意识形态方面被变质为最纯粹的、最善良的国际主义。让我们听听商业国际协会对于多国公司的目的和理想是怎样狂言乱语的吧！

“国际公司的理想国将是世界政府。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人民、货物、思想、劳务和货币都可以绝对自由地来往于任何地方。没有陆军、海军和空军，只有本地的警察。只有一个单一的全世界性的专利权和商标制度、关于建筑和安全的条例，关于粮食和药物的规章。一种单一的世界通货。一个单一的中央银行。

各个民族国家和世界政府的关系就如同美国各州和华盛顿的关系一样，或者如同瑞士各州和伯尔尼的关系一样（换句话说，它们将不再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存在）。显然象‘国际

^① 在这里提一下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很有意思的。他是多国公司在学术界中最好的朋友，现在自称是一个“反民族主义者”。可以参看他的《美国在海外的商业：关于直接投资的六次讲演》，纽黑文，1969年，第144页。

收支’这类字眼只有在写人类在同一星球上学会和平的生活之前的野蛮时代的历史书中才能见到了。”^①

但是,作者们又悲叹起来,“理想国不会很快地到来。”由于他们没有说清楚那是什么含义(也许是故意如此),那末今天世界上的多国公司也就不能说成是美国政府的主要工具了。但是,美国的所作所为比任何语言都更加雄辩地说明了唯一可能代替理想国的是什么。美国的所作所为,首先在越南、也包括古巴、非洲和南美洲,甚至在欧洲,如果达不到以美国为样板的由各州组成的一个世界,那末它至少也决心尽它最大的力量达到由驯服的卫星国组成的一个世界。

① 同前引。

金融控制论的卷土重来： 是事实还是幻想？^①

1971年11月

罗伯特·菲奇和玛丽·奥本海默合写了一篇题目叫《谁统治着大公司？》的长文章，共三个部分，分别载于《社会主义革命》第一卷的第四、五、六期上，目的是想要证明美国的大公司是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控制的。为了要确立这个论点，菲奇和奥本海默（以下简称菲和奥）认为有必要攻击保罗·巴伦和我在《垄断资本》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我们被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经理主义者”的帽子，并被指责为犯了严重的错误，有时故意疏忽，有时添油添醋。这个迷失了方向的“集团”究竟有多大倒是不很清楚，因为只具体点了另外一个人——詹姆斯·奥康纳——的名，说他是属于这个“集团”的。不过，菲和奥显然不把我们三个人看作是孤立的三个人，而是把我们看作某种重要的理论倾向的代表人物，而这种倾向是能够对美国的左派起严重的迷惑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是有必要予以详细的答复了。

—

首先，菲和奥曲解了《垄断资本》一书所提出的理论。其结

① 本章作者是保罗·斯威齐。

果是，他们提出的许多证据，即使不是毫不相干的话，也是无论如何驳不倒这理论的。这一点本身倒不是太严重的，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金融控制论辩护，把巴伦和斯威齐两人打倒顶多只是附带的次要目的。可是，遗憾的是，尽管他们兢兢业业想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却犯了那么多方法论和分析方法上的错误，甚至还有许多事实上的错误，这就使得他们对大公司业务活动方面的研究本来还可能有的任何价值也化为乌有了。

让我们先从菲和奥摘引《垄断资本》一书中的一段话开始。这段话的目的是要把典型的大公司的特征勾划出来：

“(1)控制权操在经理班子手里，那就是说，操在董事会加上主要的经理人员手里。外界利益的代表往往(但并不总是)参加董事会以便协调公司和顾客、供应商、银行等双方的利益和政策，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内圈人物的手里，这些人物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公司身上，而且他们的利益和事业都是与公司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经理班子是个自己使自己不断掌权的集团。从实际效果来看，所谓对股东的机构负责根本只是一纸空文……。

(3)每个公司的目标是自筹款项，实现财政独立，而且一般也能做到。至于筹集的钱则完全由经理班子支配。作为一项政策，公司还可以向或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借贷，但它一般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的，因此它能够避免受到那种在五十年前的大企业世界中那么普遍的金融控制。”^①

^① 第一部分，第87页。这段话见《垄断资本》第15—16页。第二段是菲和奥删节的，但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无关。

十分明显，巴伦和我在这几段话里一点儿也没有否认有“外界”的董事存在或否认公司有向金融机构借贷的事实。因此，菲和奥根据这点所举出的全部例证都完全是不相干的。菲和奥应该回答的问题并不是银行家是否参加董事会或公司是否向银行借款。肯定是有银行家参加董事会，而且公司也是向银行借款的。问题在于：这些活动是否使银行和银行家们控制了公司。可是在这一点上，菲和奥除了进行推测、重复一些说法、拼凑了一系列关于个别情况的故事外，却毫无贡献可言，因为他们拼凑的那些个别情况与目前争论的问题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却绝对不能构成一个可以进行概括的有效基础。稍后我将对某些所谓情况“研究”进行考查，但在考查之前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个是关于银行信托部门握有公司股票的问题。菲和奥大量引用了帕特曼委员会的材料。这个委员会指出，这类公司股票数量很大并且高度集中在几十个最大的大城市银行的手中。这些银行是不是因为其信托部门掌握大量公司股票就对这类公司保有了控制权呢？菲和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带着抒情语调宣称：

“六十年代公共团体掌握股票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这就使那种硬把所有权和控制权分裂开来的论点站不住了，而这种论点正是经理主义理论的基础。所有权和控制权再一次被华尔街的大银行——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第一花旗银行的信托部门统一起来了。这种统一让人们回忆起摩根时代，这时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它们给予贷款的权力控制

着各个公司。”(第二部分,第 68 页)

既然是如此重大的转变,那么读者就会这样想:总应该有经过仔细编选的文件根据吧!可是,菲和奥在证明银行受信托掌握股票和对公司控制之间的因果联系方面却一个例证也没有举出来。与之相比较,在摩根时代(大约是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却十足地有数以百计的有充分文件根据的案例,说明对公司的金融控制。银行家们,特别是银行主管信托业务的官员们,当然会很简单地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关于这种控制的证据材料:他们会告诉你(这不光是为了留下公开的记录),他们的业务是为信托受益人的利益而进行投资,而在这个职能方面信托官员们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他们不仅没有控制各个公司;他们甚至连任何这类的责任都不愿负,因为负了这种责任就会带来各种各样令人头痛的事,并且一旦经营亏损还会使他们去打花钱很多的官司,因为信托受益人会以受托人行为不正当为理由提出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①

我当然不能证明这些否认控制的人是老实的并且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这两件事可决不能等同起来),就象菲和奥不能证明事情正好相反一样。不过,由于我曾和一些搞信托业务的人进行过非正式的谈话,并且考虑到他们庞大的官僚机构是在顾客的律师、法院和银行检查官们众目睽睽下经营业

^① 在信托和受托的领域里,资本主义法律在受托人对受益人所负的责任方面不但作了严格的规定,而且总的说来也是严格执行的。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它所牵涉到的人主要是 C. 赖特·米尔斯称之为“极富”的阶层,这些人对他们的权利是十分了解的,而且如果没有法律专家的意见,他们是决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

务的，我倾向于排除他们是在搞宣传或说谎的那种可能性。可以肯定地说，把银行由于掌握信托股票从而对公司拥有的权力和摩根时代的金融巨头们的权力进行对比是荒谬到了极点的。作这样的对比，不仅暴露了自己对公司的历史知识很贫乏，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对过去一个世纪商业世界所曾发生的变化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①。

然而，必须承认，菲和奥为了支持金融控制论而提出的关于组织机构性质的论点是有道理的。这种论点并不能说明存在任何类似全面或永久的控制，但它的确指出了，当一个公司的经理班子经营得很差劲儿的时候，银行进行决定性的金融干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菲和奥指出，华尔街传统的法则

^① 举一个小例子也许就会把我的想法都表达出来。谁都知道第一花旗银行是个庞大的银行，它的副行长有几十个，它的支行遍布（纽约）市区，它设有几个主要的部门（消费者部、公司部、信托部、房地产部、国际部），并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总之，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官僚化了的公司，它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同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在这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把第一花旗银行的两个前身公司之一的第一国民银行拿来同它们进行对比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在老乔治·F·贝克 1931 年去世以前，第一国民银行无论在那种意义上说都是归贝克控制的。贝克在 J·P·摩根还活着的时候几乎和摩根齐名，在摩根 1913 年死后继承了摩根的衣钵。晚至二十年代，第一国民银行只有五个副行长并且都兼任董事。它设在华尔街二号的——幢小建筑物里，不接受存款少于一百万美元的存户，根本不同一般公众有业务往来。第一国民银行的代表们通常和摩根的代表们一起，是几十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在华尔街，谁都不怀疑他们的权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后，商业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使得这种走控制公司路线的银行再也办不下去了，而事实上第一国民银行是被花旗银行吞并掉了，花旗银行则是搞今天占优势的新型银行业务的先驱者之一。这样一种变化反映了银行与公司之间关系的性质上的改变，这一点看来是够明显的了。菲和奥的研究报告中最糟糕的——对我来说是最令人沮丧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对构成垄断资本主义历史的特征的质的变化居然没有察觉到，更不用说有什么了解了，而第一国民银行的故事只是这种变化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一直是：“如果你不喜欢经理班子，那就卖掉。”可是，他们接着说，公共团体的大规模投资的增长使得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运用这一条法则。他们在这里引用了戴维·洛克菲勒以下的话：

“我猜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投资者会更多地对经理班子提出要求；随着持有股票数目的扩展，公共团体以及个人都会觉得有义务更加积极地关心公司的的确确有个很好的经理班子。特别是当他们持有股票的数目大到使得他们不能立即或很快地处理掉他们的投资时，那就更会是这样。当他们对他们持有股票的某个公司的经理班子不满意时，现在的做法就是把投资立即或很快地处理掉。”（第二部份，第 62 页）

为了进行辩论，让我们假定这种局面正在形成普遍现象。那就是说，在典型的情况下，公共团体投资者现在（或不久将会）能够进行干预以保证有一个戴维·洛克菲勒所说的“好的经理班子”。问题在于，他所谓的“好的经理班子”究竟是什么意思？菲和奥没有提这个问题，也许提了这个问题就会对那种默示或明示的有关金融机构动机的假定产生严重的疑问，而那种假定是在他们的论文中到处出现的。但是，不管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回答，至少我对以下的事实是不怀疑的：即，对戴维·洛克菲勒和他的大多数金融同僚来说，一个“好的经理班子”是指有赚取利润和扩展公司赢利基础的很好记录的那样一个班子。应该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行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那样），并且正是这种行为赋予了资本主义以它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性特征——价值增殖

过程。

如果在这一点上我是正确的话，其含意就很有趣味了。在这个意义上的金融控制肯定是个反对资产阶级“经理主义”的理由，正如可以加尔布雷思为例证那样，据这种说法，今天公司的经理们已不再对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感兴趣了。但是，对于据说以巴伦、奥康诺和我为代表的那种“经理主义”，那种可以称之为戴维·洛克菲勒论点的说法却是完完全全给予支持的，而且越是认真地对待这个论点，这项支持就越加有力。因为我们只是这样说：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大公司是资本的基本单位，它是根据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和资本积累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进行活动的。很显然，就以下的事实来说，我们的见解因而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金融界的看门狗们在监督这个过程并且责成经理人员只能走为公司（间接地也为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获得并扩大利润的这条规矩矩的道路。

我并不是说一小撮大银行握有大量的信托股票不产生重要问题。特别有一个问题——这正是帕特曼众议员特别担心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方面——那就是银行的贷款部门和驻公司董事会的代表们所掌握公司业务的机密情况就会让同一银行的信托部门知道。银行与公司之间的正常关系使银行比一般投资者了解内幕情况要多得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银行本身也不否认这一点。假如这种内幕情况让信托部门知道了，并且被它用来经营管理它的顾客的有价证券，那末很显然就会使一部分投资者得到好处，而使另一部分投资者吃亏。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破产就是一个适当的例子。据

《商业周刊》(1971年7月24日)的报道:

“帕特曼委员会的助理人员贝尼特·D·格尔曼发现,大通曼哈顿以及其他几家大银行正好在该公司崩溃前夕抛售了该公司的大量股票,而这几家银行都是对该公司贷有尚未清偿的款项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在一个星期中就把它信托掌握的436,000股股票都卖掉了。

帕特曼很快就注意到,当时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斯图尔特·桑德斯同时也兼任大通曼哈顿的董事。他进一步指责道,抛售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股票的局面强烈表明,几家银行在抛售他们的股票时是步调一致的,为的是不使价格发生暴跌。”

银行对上述指责的答复当然是来个道貌岸然的否认。《商业周刊》引了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以下的话:

“洛克菲勒说,我们银行的信托业务和受托投资职能是由同我们的商业贷款活动完全分开和不同的部门来行使的。为了保证银行由于其各种职能而获得的情报得到正当使用和控制,银行主管商业的部门不得将内部情况告诉(或偶然透露给)受托投资部门或信托部门主管养老金或私人信托的科室。”

当然,任何熟悉商业是怎么搞法的人都会几乎百分之百地把这种说法不当一回事。在这方面,帕特曼取胜是易如反掌的。不过,要说金融市场受人为操纵对于大亨们有利对于

小人物不利，这肯定算不得什么新发现。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银行掌握信托股票的增长对这种操纵过程所起的特殊歪曲作用已经或将会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运行起任何根本性的影响。

我们将在后面再回到关于菲和奥是如何处理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破产的问题上来。

二

且不提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我发现简直不可能用一种合乎逻辑或比较系统的方法来讨论《谁统治着大公司？》一文。菲和奥从这个问题跳到那个问题，从假设跳到事实又从事实跳到假设，从作出论断跳到案例研究，简直十分令人惊讶。例如，在该文第二部分一开始，他们就提出银行掌握信托股票的重要意义的问題，并且引用了上述戴维·洛克菲勒的话。他们接着又引述了某些案例，说明金融机构（不一定是银行的信托部门）在处理大宗股票方面有难处。我们现在把这个假设拿来检验或印证一下，至少拿来说明一下：银行掌握信托股票是控制公司的渊源之一。以下就是菲和奥怎样从假设跳到“证明”的：

“面对着那种潜在的损失，公共团体投资者会决定要干预公司的事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例如在六十年代，金融机构在合并运动中就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二部份，第 63 页）

菲和奥落荒而逃，这会儿又给我们讲了好几页的奇闻轶事，大部分都是从《幸福》杂志和《华尔街日报》里摘下来的有

关各式各样的金融机构(银行、投资银行家们、互助基金会)怎样与近年来的合并运动有牵连的问题。所有这些加起来只不过说明,金融机构的一大部分业务和公司有这种或那种联系而已。肯定说这也算不得是什么惊人的发现。的确,菲和奥在结束这一节(题目叫做“金融机构行使它们的股东投票权吗?”)时已相当接近于承认这一切都是小题大做:“金融机构并不总是行使股东权利〔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证明它们曾经行使过这种权利〕并不能证明它们漠不关心或无能为力。这可能意味着经理班子的表现是令它们满意的。”正如在引用洛克菲勒的那段话时那样,“好的经理班子”问题又再一次被提了出来。金融机构对公司经理班子究竟有些什么要求?可是菲和奥却再次拒绝回答这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我想他们是挺聪明的,因为如果他们直截了当地答称:金融机构希望经理班子经营获利,那么对他们在文章后一部分辛辛苦苦拼凑起来的许多论点就会是致命的打击。

这种方法论上混乱的例子决不止一个:它恰恰是典型的。我想,细心的读者只要有所警惕是不难查明的。我这篇批判文章其余部分的目的是想把那些可能使读者产生误解的种种具体论点和理论予以驳斥,因为有些读者以前对于公司行为和金融方面没有怎么接触过,带着完全合理的希望,想要通过读菲和奥的书来获得有用的资料和知识的。

付出红利的问题 菲和奥假定金融机构十分关心在公司利润中增加付给股东红利的比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据说其理由是:第一,提高红利付出率是使公司股票价格上升的“稳妥”方法;第二,用越多的利润来付红利,那么给

投资留下来的钱就会越少，这就会迫使公司更多地向银行借款。这些理由中，无论单个理由也罢、两个理由合起来也罢，没有哪一个可以声称有一丝一毫的普遍有效性。提高红利付出率导致股票跌价的情况就是有嘛：例如，假如有些投资者和投机者判断，提高红利的结果会使公司的现金下降到可预见的需要之下，从而就会危及公司的偿付能力。这个问题很复杂，没有什么简单的公式可以适用于一切情况。由于同样的原因，银行主要关心的往往是限制或减少红利而不是提高它，其目的是要保证公司有足够的钱去偿付现有的债务。我不能不说，这种手法对菲和奥来说是太有代表性了，在他们的文章中，只要对他们当前的目的有用处，他们就提供大量证据来说明银行的这种关心。讨论红利付出率问题是在文章的第三部分，特别是第 39 页到第 40 页，在那里，银行对公司清偿能力的关心连提都没有提到过。另一方面，在第二部分的第 81 页上，他们提出了一个题目为“长期贷款的条件”的图表。在表中，列举了《幸福》杂志称之为最大公司的头五十家都同意的取得长期贷款的条件（这些条件叫做“限制性条款”，也是贷款协定的正常特征）。在五十个案例的二十四個中，提到的唯一条件是“限制红利”；在另外两个案例中，限制红利被列为两个条件中的一个。看来，银行对提高红利付出率的热情关心，说得温和一点，总还不算是怎么大的吧！

更为奇特的是，菲和奥提出了一个有统计数字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即金融资本施加压力以提高红利付出率。在第三部分的第 39 页上，他们提出了一个题为“1960—1970 年间从公司资产规模来看红利的付出”的图表。这个表说明

每一年中公司资产规模和付出率之间都有相互密切的关系：公司越大，红利付出率越高。尽管结论没有用多少话，它显然暗示了：这反映了金融资本的权力和公司的规模之间也是同样相互有关这一“事实”。可是，奇怪的是菲和奥竟然没有注意到——假如不是没有注意到，那么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向读者指出——在六十年代那十年中，各类资产规模的公司都出现了红利付出率急剧并不断下降的现象，而金融资本恰恰在这个期间内却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例如，在最大规模的一类公司中（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1960年的付出率是70.8%，而在1970年则为55.5%。难道是金融家们缺少菲和奥赋予他们的那种权力？还是缺少菲和奥赋予他们的那些目标？还是二者都缺少？我想，看来最合理的回答是：二者都缺少。

在我们结束对这问题的讨论之前，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菲和奥是怎样处理“证据”的。由于巴伦和我认为：“今天，利润的取得和积累占有统治地位，就如同过去也占有统治地位一样”，菲和奥竟断然说：“根据巴伦和斯威齐的说法，垄断的发展对资本的积累根本没有影响。”（第三部分，第37页）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时，我吃惊得揉了揉我的眼睛。怎么可能有人真正读了《垄断资本》这本书却看不出这本书讲的正是垄断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呢？^①不过那不要紧，巴伦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怎么说的是一回事，而菲和奥有兴趣要证明的东西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想要证明，在过去这一百来年中，资本积累率是下降了，而这是由于金融资本权力日益增长的

^① 参阅例如第81—88页和第八章。

缘故。

应指出的第一件事是，菲和奥把资本积累率说成是用于再投资的金额所占利润的比例，这对一个公司来说，正好是与红利付出率成反比的。人们当然可以建立一个高度简单化的资本主义模型，在那里厂商使用利润进行再投资是资本积累的唯一形式。但这同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却完全不一样，在那里资本积累还采取许多其他的形式进行——红利受益者和其他相对的高收入者的储蓄款项、由于物价上涨而进行的所谓强制储蓄、投机性利润的投资等等。企图用只是在抽象的理论分析方面有意义的概念来解释历史的实际进程，就象菲和奥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是完全不恰当的，且不用更强烈一点的词汇来说。尽管这样，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再来看一看菲和奥能够用他们自己个人给资本积累下的定义讲出多少道理来。

我们已经看到(第 121 页)，根据他们自己的数字，过去十年的红利付出率大幅度下降，那就意味着，按他们的说法，资本积累率以相同幅度上升了。但是，上个世纪的情况怎么样呢？这里就有个收集十九世纪相应的数字的问题。当然，谁也没有收集过这类数字，而且由于缺乏原始数据，除了用大胆猜测和凭印象办事的方式之外，我看谁也办不到这一点。但是，这并没有把我们的作者们吓倒：

“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企业家们，把他们的利润积攒起来并在商业活动中保留这些利润，他们的英勇素质是经济史上常常讲到的故事。这时资本积累率显然是很高的。可是究

竟有多高，我们却较少听到过。要求各个工业部门的合计数字都全部精确大概是不可能的。（第三部分，第 38 页。重点号是引者加的）

其次，菲和奥引用了一本“被广泛采用的教科书”的作者所说有关“一家基础雄厚的英国纺织公司”的话，对此他们又加了两句：“其他可找到的记录”表明，“尤其在企业成长发迹的早期阶段，保留下来的利润实际上达到接近于百分之百。有一些企业甚至更加拚命地要求保留利润。”菲和奥满以为这些超过百分之百的数字准可以稳稳当当地把平均数字提高起来，于是他们很自信地往下写道，“因此，尽管现有的历史记录有缺陷，看来可以稳妥地作出如下结论：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们至少积累了它们利润的一半，很可能比一半还高得多。”（重点号是引者加的）

读者被这种炫耀科学的经济史的讲法弄得眼花缭乱，现在可以接受这种论断了，而这种论断显然准是可以用来证明，早期的资本积累者的“现代对等人物”的确是些与众不同的人物。哎呀，这个读者现在可得大大地失望了。作者告诉我们说，“通过考察红利付出的比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关目前积累率的相当精确的概念。”（他们事实上已把积累率说成是与红利付出率成反比的。）接着又讨论了上面所分析的付出率问题。不过，根据菲和奥自己的数字，1970 年未加权的平均付出率是 42.3%，这个“完全精确”的事实却被审慎地给漏掉了。把这个百分比同菲和奥的 57.7% 的积累率对照一下，后者看来非常适合“至少……利润的一半，很可能比一半还高得

多”的公式。

面对着这种本领高超的手法，简直令人有点哭笑不得！

折旧问题 巴伦和我被指责为犯了菲和奥所认为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认为，折旧是公司内部款项的来源之一，在使大公司的经理班子不屈从于金融资本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屈从于金融资本正是摩根时代的特点。菲和奥说，不是这样，“折旧是固定资产的费用——是费用，不是增益。象税收的减免，应付倒账的准备金，火灾损失等等一样，折旧同样不能用来扩大资金。只有保留下来的收益才是能用来扩大资金的唯一内部款项”。（第二部分，第69页的注解）在初级会计理论上来说，这些都是完全对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讲的是公司财政，在这个领域里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

首先，甚至在理论上谁也不知道折旧的“真正”数额是多少，因此在实践中差不多总是按税务当局所允许的数额估算。^①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税务当局是资本家阶级领导阶层的明目张胆的奴仆，这就意味着：有代表性的一点是，本来应该被划为利润并应予征税的一大部分资金事实上却被称为折旧，从而完全逃避了征税。因此，在实践中，菲和奥断言折旧不能被用来扩大资金的说法是错误的：折旧往往正是被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

其次，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里争论的倒不是扩大资金多

^① 在一个强大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为什么折旧作为费用在理论上不确定，这个问题在《垄断资本》一书的第99—104页作了解释；但是这个问题，就象在现实的垄断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显然不会引起菲和奥的兴趣。

少的问题,而是能得到多少现金的问题,因为缺少现金就不得不依赖银行,如果缺得极端厉害就意味着破产。在这方面,被贴上折旧标记的一块美元和被贴上纳税后的利润标记的一块美元具有完全同等的意义。它们二者都可以用来为公司的任何一项目的服务,它们的用处决不限于更新损耗或陈旧的资产设备。从公司经理班子(不论大小)的观点看来,关键的概念既不是折旧也不是保留下来的收益,而是现金的流量。一个公司如有相对大量的固定资产,因而在折旧账项下有雄厚的现金流量,那么在理论上它完全有可能整个地脱离一个行业并进入另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行业,无须保留一分钱的利润,也无须向银行借一分钱。肯定地说,这样极端的事情大概是不会发生的,可是理解一下这种事情怎么样能够发生以及为什么能够发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具有雄厚的现金流量的公司是从来也不必恭恭敬敬地去求助于银行的。相反,有时银行倒是很可能有求于公司:只要这样的公司想增加额外资本去合并另一个大公司或进行野心勃勃的国外扩张计划,它可以在几个可能给予贷款的银行中挑挑拣拣,让这些银行去竞争而坐收其利,最后还可以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金融家们。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以及许多其他统治美国经济的大公司所处的地位恰恰就是这样。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象菲和奥那样把外界提供资金和金融控制等同起来是多么的愚蠢!从逻辑上讲,也同样可以把这种现象当作公司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有控制权的迹象嘛。

谁控制谁的问题 我并不是说大公司控制银行是正常的

现象。在大企业圈子里的董事会和经理办公室内究竟进行了一些什么活动，我知道得不够——知道得不比菲和奥多，还不足以作任何这类的断言或甚至假定，而那些与之直接有关的先生们大概也不会把我们所缺乏的材料告诉我们。菲和奥用来“证明”银行控制公司的数据，同样可以用来证明公司控制银行这一理论，指出这一表面上证据确凿的事例，是很有意思和有益的。而且，菲和奥同我一样明白这一点，这是从他们似乎曾极力使之不引人注目的两个小小的脚注里看得出来的。

脚注中的第一个(在第一部分,第 99 页上)是针对某些未指名的人说的,“这些人论证说:银行与公司的相互关系也可以很容易地用来证明公司控制了银行,正如反过来说一样”。据菲和奥说,这些人应该考虑银行持有股票的问题。好吧,我们已经考虑了银行持有股票的问题(那就是说,银行的信托部门持有股票),但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股权是被用来作为控制工具的。那么对它们间的相互关系怎样看法呢?就其本身来说,当然可以正确地认为,这种关系“也可以很容易地用来证明公司控制了银行,正如反过来说一样”——或者不如更确当地说,就其本身来说,它们什么也没有证明。既然菲和奥显然知道这一点,人们就不能不怀疑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不厌其烦地在相互关系问题上如此大做文章。

第二个脚注(第二部分,第 77 页)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有些经理主义经济学家〔这次又没有指名〕认为公司控制了银行而不是相反,因为公司通过它们的存款成了对银行的纯贷款者。”我并不是这里提到的“经理主义经济学家”的一员,

因为我必须承认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个论点。就其本身来说,我也不相信这个论点有多大的份量:在揭示因果关系或统治与从属的关系时,全球性的数字常常没有多少用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大公司和大银行为着谁的存款应该存放在哪里以及谁向谁借款的问题进行公开或暗地里的谈判中,力量对比对哪方有利,但看来还没有什么办法凭经验来断定这个问题。也许最稳妥的假定是:双方都握有强大的王牌,它们相互之间的借贷活动没有为假定一方控制另一方提供任何根据。

可是,与此同时,人们不应该忽视:从菲和奥所使用的低级滑稽手法的观点看来,现在所争论的论点正是反对他们的主要论题金融控制论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他们贬低这个问题到只占三行脚注的地位并不说明他们在科学上是有正直感的。

互惠的问题 菲和奥的论文用很长的一节讨论他们所谓的“金融控制和互惠的兴起”(第三部分,第77—92页)。“互惠”是个商业术语,用来指公司之间同时互相买进卖出的普遍做法。通用汽车公司需要商用机器,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则需要汽车和卡车;它们间的互相需要为它们互相间的有利可图的交易提供了基础。由于菲和奥使用了“互惠的兴起”这个说法,看来他们以为这种做法多少有点新颖吧。此外,他们还深信互惠和金融控制是联系在一起的;深信互惠是和所有那些假定公司有牟取最大限度利润的行为的理论相矛盾的;并且深信象巴伦和斯威齐一流的“经理主义者”——他们被认为是不了解这种做法的——在他们的理论中是不会考虑到互惠

问题的，因此互惠的存在本身就能驳斥他们的理论。

就象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菲和奥在这里又暴露了他们对美国经济史的无知。互惠是十九世纪就在美国声名狼藉了，当时铁路公司和它们的供应厂商与主顾们都是普遍这样做的。只要我们记得，在十九世纪的后五十年，对铁路的投资超过了对所有其他工业的投资总额，我们就能理解，没有比把互惠当作新近才有的发展更糊涂的观点了。也不能主张互惠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衰退了，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期间才得到复苏的。州际商业委员会在二十年代发表了一个多卷的报告书，证明了当时各个铁路公司之间盛行的互惠做法与早期的情况差不多，而联邦贸易委员会（建立于1914年）在它存在的整个期间差不多都不断地对禁止这种做法进行了大体上劳而无功的斗争。

至于说巴伦和斯威齐忽视了互惠的问题，我必须请求读者们原谅我花点时间来引证《垄断资本》一书的一段话（第50页）：

“作为大企业特征的‘我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来源于公司投资量很大以及公司经理班子合理的盘算。总的说来，这种态度是专用来对待其他大公司的，对于较小的企业家是不适用的。譬如说，三大汽车公司互相之间是按照舒姆皮特合适地称之为‘互相尊重’的方式办事的，但三大公司对成千上万为它们销售产品给公众的推销商的态度则骄横和专断得厉害。其原因当然是：每个大公司都认识到其他大公司的强大和有报复力量，因此作为一项经过审慎盘算过的政策总是

避免去得罪它们。不过，采取互相尊重的态度决不限于对待竞争者。如果一个大公司不是另一个大公司的竞争者，那么就很可能是个主顾或供应者；在这个公司关系的领域中，互惠是主要的原则，它肯定会象竞争时一样责成各公司采取互相尊重的态度。”（重点号是引者加的）

也许还应该补充一句，这里提到的“竞争”一词是指垄断或近乎垄断的竞争，不是传统经济理论上的单纯的竞争。这一点从上下文看来是很清楚的。

菲和奥也许会争辩说，巴伦和斯威齐既承认互惠普遍存在，同时又坚持公司是为了牟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行事，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是，他们这样争辩，只是因为他们假定公司都典型地受金融家的控制，而这些金融家同时又控制着其他公司，因此这些外来的金融家们无法同时使所有的公司都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菲和奥解释道，“这就是说，限界主义者处理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问题，而对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简单事实却视而不见：即，同时代表两个公司的董事不可能为这两个公司都去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第三部分，第79页）然后菲和奥就用典型的菲和奥手法得出以下的结论：

“举梅隆国民银行董事长约翰·A·小迈耶这个例子来说吧。他同时兼任以下四个大工业公司的董事：通用汽车公司、海因茨公司、阿姆科钢铁公司和美国铝业公司。这四个公司都彼此有生意往来……就算迈耶的动机是好得不能再好，他又怎么能够使他兼任董事的四家公司同时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呢？如果他想为通用汽车公司买进便宜的钢材，那么

他就不能使阿姆科钢铁公司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反之亦然。对一个同时代表两个公司的人来说,要在公司间的销售方面同时为两个公司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掌握了这一点,那么学究气的微型经济学就完全站不住了。”

这种论点的问题出在它忽视了“经济生活中的简单事实”,那就是说,迈耶的首要责任是为梅隆国民银行牟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可是并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上的理由硬说这和所有四个其他公司都去最大限度地牟取它们的利润相矛盾嘛!

当然这并不是说,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铝业公司、阿姆科钢铁公司和海因茨公司彼此之间不会乐于进行种种互利的交易。这只是说,如果它们真的进行这种交易,那么每个公司都会为了自己而尽最大的努力,而不是简简单单执行能在幕后指挥所有四个公司的某个金融家的命令。在另一方面,迈耶先生兼任四个公司董事这一事实决不足以保证这些公司会选择彼此作为互惠的伙伴。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可能发现与美国钢铁公司做笔生意比同阿姆科钢铁公司做生意更加有利可图。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情况,有时可能考虑到有共同银行联系的关系,有时则可能不考虑。

令人觉得有趣的是,菲和奥举出的有关事实上的(而不是可能的)互惠关系的具体例证,却不能支持他们自己的论点:即,“看来,美国这个公司国度里的互惠体系和金融控制体系是并行的,而且前者是由后者建立起来的”。(第三部分,第78页)他们引用了国会的意见听取会记录来证明,橡胶与石油公

司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惠关系。从一个渴望加入这种安排来进行竞争的石油公司的观点看来，它们的阵容如下：

主 顾	供应商
B. F. 古德里奇公司	海湾石油公司
美国橡胶公司	德士古石油公司
费尔斯通公司	壳牌石油公司
固特异公司	太阳与辛克莱石油公司

我写这段时手头没有各公司的手册，但我倒很乐于相信菲和奥想必一定审慎地考察过以上这些成双成对的公司之间的连锁关系、银行联系等等。据此，我的结论是：他们对此什么也没有提及，这一事实说明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倒并不一定说明作者的无能。

但是，在下一页上，菲和奥却最后提出了他们的“证据”，这证据是由以下这个典型的句子开头的：“请考虑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橡胶公司（现在的尤尼罗约尔公司）间的关系的历史。”只要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谁也不怀疑这三个公司过去是，也许现在也还是，在杜邦家族的共同控制之下，或者说，它们之间一直进行广泛的互惠往来。^①菲和奥的注意力集中在1962年以前的情况，当时美国橡胶公司自愿几乎按成本把汽车轮胎卖给通用汽车公司，从而实际上把杜邦拥有10%左右所有权的一家公司的利润移交给了杜邦拥有差

^① 菲和奥企图把“杜邦—威尔明顿信托公司”指定为控制性权力的具体代表，用这个手法来把杜邦家族的控制与银行的控制联系起来。这完全是一个狡猾的诡计：威尔明顿信托公司实际上只是杜邦家族的家庭银行，在整个杜邦体系中绝对不起任何独立的作用。

不多 25% 所有权的另一家公司。问题是，这不过是作者们要求我们考虑的那种关系的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现状。自从 1962 年以来，部分原因是由于反托拉斯诉讼迫使杜邦公司出让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但可能也由于杜邦公司经营管理的战略有所改变的缘故，情况已经有了根本上的改变。菲和奥再次把一些与他们的论题相矛盾的事实放在一个只有三行文字脚注里去处理（第三部分，第 90 页）：“自从杜邦公司出让（通用）股票以来，尤尼罗约尔公司占通用汽车公司轮胎采购的份额下降到了 42% [这个份额比通用汽车公司占整个汽车市场的份额要少]。不过，尤尼罗约尔公司的董事长维拉说，该公司现在对通用汽车公司销售轮胎还是赚钱的。”

结果是，杜邦的这一小段历史对菲和奥的外界（金融）控制论并没有帮上忙，倒是给巴伦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一书中所采取的立场帮了忙。在概要地叙述了约半个世纪以来各家美孚石油公司典型行为的改变之后——原美孚石油公司是 1911 年根据谢尔曼法案分成好几家的——我们写道：

“老的各家美孚石油公司可能仍然受洛克菲勒的影响，甚至还受其控制，但可以得到的公开材料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假如它们是受控制的话，我们只能作这样的推论：洛克菲勒们决定，促进他们利益的最好的方式是准许，或者鼓励，每一家美孚公司去促进其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各家公司的行为或由各家公司组成的该体系的经营方法来说，洛克菲勒的控制权问题就与之没有什么相干了……”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大公司都是孤立地在进行活

动，不存在什么联盟或协调，没有什么协议和集团。与此相反，这些行动方式——象它们之间的对抗、竞争和斗争一样——正是垄断资本的十分本质的东西。我们所断言的只是，决定有关阵容顺序的，不是与外界控制中心的联系，而是内部经理班子的合理估计。例如在石油工业方面，各家美孚公司随时准备并且愿意与美孚以外的各公司联合在一起或与之进行斗争，就如同随时准备并且愿意与另外几家美孚公司联合在一起或互相斗争一样。一切都取决于：怎样做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垄断资本》，第 19—20 页）

杜邦的例子完全可以用来支持这个论点。尽管菲和奥的意图与此相反，他们却为我们的论点帮了忙，这倒是颇有讽刺味道的。

在他们发表了无所不包的概括性意见并把现有的各种经济学斥责了一通之后，菲和奥却以一种可爱的方式回到现实中来并且作了表白（也许还有点儿不好意思），说什么对此我们到底用不着太认真嘛。他们书中有关互惠这一节的结论是个最好的例子。他们写道：“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政府的起诉（就象对杜邦公司进行的那种起诉）现在阻止了外界的金融界人士对销售和购买进行控制。”我不会发表这种特殊的反对意见，因为我怀疑——除了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外——政府的起诉在这方面起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我倒是可以同意他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换句话说，互惠的联系并不决定于股票持有数目、董事会中的席位、以及与外界金融机构的联系。”在这之前的十四页书当然都是用这样的假定为根据的：互惠

的联系恰恰正是以这种方式决定的。可是，现在菲和奥实际上却承认，他们提出的所有似是而非的“证据”对于本问题的关系很少或甚至没有关系：

“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互惠关系是由某种其他方式来决定的〕要求人们对公司间的关系进行实际的调查，调查价格、质量和劳务的传统的市场因素是否事实上决定了市场的份额。〔有什么理由假定这是唯一的另一种可能性呢？〕但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和其他外界集团对公司之间的关系的全面影响，看来为进一步调查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三部分，第 91 页）

就这样最后来了一个“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呼吁。好极了！在菲和奥的整篇论文中，这是我能够衷心表示同意的少数几点之一。

资本积累的方式 菲和奥的论文中有比较长的一节（第三部分，第 31 页）叫做“资本积累的方式”，他们把这种方式定义为“把利润用作公司本身的资本并予重新使用的方式”。（第 47 页）这是又一个菲和奥所专有的概念——我不记得曾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碰见过它——在读了几遍以后，它给我的印象是这样一种稀奇的混合物：看起来似乎是仔细研究过的事实，可又伴随着一些大体上与题无关而且有时是十分荒谬的猜测和说法。例如，在这节中的开头一段，我们看到：“积累率的加速破坏了行会生产，把主人与工匠的关系改变成为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物质生产力方面的积累率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从上文（第 10—12 页）我们已经看到菲

和奥是如何为资本的积累率下定义的，可是现在他们又加上了“物质生产力方面的积累率”这一未予下定义的概念。这些比率尽管没有被说清楚，但想必一定在前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是存在的，并且被认为是一直在增长，而到了现在则起了实现社会变革的作用。这是对真正的历史进程的彻头彻尾的神秘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积累的东西。只有在社会变革已经发生之后，谈论积累率才有其意义，但甚至在那个时候也不是指菲和奥历史地歪曲了的那种意义。

据我看来，还有许多其他段落都是同样错误或混乱的，但是去分析它们则没啥意义。不过，我还是想设法解开一个我认为是菲和奥的主要理论论据的谜。假如我误解了他们，那么我很乐意接受指正。

关键的一段如下：

“在资本转移的进程中，一个经营获利较低的工业的公司将它的剩余价值投入另一经营获利较高的工业的公司。资本就这样得到重新组合。它为一种新的社会目的服务，生产不同的商品或劳务。它进行自我扩张的潜力是以人们的某种不同的需要为基础的。这种跨行业的转移和‘古典’的积累是不同的，在后者，剩余价值被企业主转变为资本，但资本仍然留在同一个公司内。

这种资本积累的新方式是比较成熟的垄断企业的典型做法……。”(第三部分，第 49 页)

根据这种观点，古典的积累——我想这是指在自由竞争

的资本主义时期的积累——完全在公司厂商内部进行，而每个厂商都只从事某个特定的生产行业。只是到了后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了一种“资本积累的新方式”，这种方式允许资本从一个生产行业转移到另一个生产行业。这种转移进程是由金融家们主宰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操纵，常常让某些生产行业大吃其亏（如铁路、公用事业），却又硬要另外一些生产行业“大赚其钱”（如计算机业、影印业等等），当然利润中最精华的那部分则留给他们自己。从这种转移进程——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据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积累的新方式”——产生了其他两种积累的新方式：借贷资本的积累和投机性资本的积累。这些新的积累方式具有“一种先进的社会化了的形式”，却又具有“一种彻头彻尾腐朽和破坏性的内容”。（第三部分，第75页）它们“相当于在资本主义本身内部的一种原始的就其社会性质来说是反动的计划形式”。（第77页）据菲和奥说，“投资过程社会化的下一步必定是其社会关系的变革：消灭金融寡头，代之以在人民议会管理之下进行工作的工人委员会。”（出处同上）

上面最后一句话的纲领性的暗示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不过在本书中我不想讨论这些问题。我只想提请大家注意菲和奥关于“古典积累”的奇特概念。假如没有资本转移的过程，假如每个厂商原来搞哪个行业就一直搞那个行业，而且假如所有的积累都是通过把利润用作公司本身的资本来进行，那么整个竞争机器——这无论对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来说都是中心问题——就全部消灭了。因为除了通过资本从获利较少的工业流向获利较多的工

业这一途径外，平均利润率是怎么得来的，供应又怎么能按与生产的价值或价格相等的价格来适应需求呢？难道菲和奥真的对经济思想史如此无知以致于对所有这些都不懂得？还是，懂是懂得的，但他们故意搭起一个稻草人（“古典的积累”）来作为一个起点，使他们能够把实现资本转移过程的（某些）方法捧为“新”东西呢？说得温和一点，无论哪个假定都不是十分奉承的。

现在不是讨论资本积累形式的历史变迁和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在其中所起作用的时候。只要指出以下两点就足够了：从资本主义最早的时期起，资本积累总是包括除了直接把利润用作资金以外的许多其他形式——顺便插一句，直接把利润用作资金在大公司的时代比在“古典”时期所占的重要性是更大了，而不是更小了一——其次，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组织动员资本投入获利最大的行业方面总是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当然，随着金融家们的这种作用也带来了对工业企业的影响，有时则带来了控制，但是，只是在垄断资本的形成期——大约在187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金融控制才是大企业世界中的正常状况。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公司普遍地都强大得足以自立了，在与金融界的关系上至少是平等的伙伴，而且往往还不止是平等的伙伴。^①

在菲和奥所引用的许多真正的事实中，有没有与这个理论上的剖析相矛盾的呢？我想是没有的。就象在菲和奥的通篇文章中那样，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一节中他们先假定有金

^① 在这里，就象在这整篇批判文章里一样，我都是随着菲和奥只把注意力限于美国。至于有关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可能有必要作一些修改。

融控制存在，然后依据金融家们被认为有的动机去“解释”所有的现象。在缺乏金融控制的证据的情况下，而且假定菲和奥对金融家们的动机又缺少真正的了解，这类解释不幸是毫无价值的。我只引用几个可能举出的例子中的一个。在讨论金融经理班子所谓阻挠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统一爱迪生公司等公用事业公司设想如何满足将来对它们的劳务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时，菲和奥写道：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能够发行足够的债券，把纽约电话公司和它所有其他摇摇欲坠的子公司统统照管过来。但是，看来它们很不可能这样做，因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发行了在美国出售的所有公司债券的四分之一。而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们正是掌握证券市场买卖两头的人们。如果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把它需要的所有债券都抛向美国证券市场的话，那就会使价格下降，其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会比摩根—斯坦利公司、狄龙—里德公司、第一波士顿国民银行等市场操纵者所愿意看到的还要快，还要大。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中代表该公司最大的债权持有者——象大都会保险公司、谨慎保险公司和公平保险公司等——的董事，也不愿意看到这些债券跌价。”（第三部分，第 66 页）

这简直是一系列文不对题的话。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债券占有公司债券的比例多少是不相干的。如果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需要出售债券来增加资本的话，只要按照任何其他公司能够得到的同样条件，它总是可以出售的。在这方面，我们可别忘了菲和奥所显然一无所知的某些情况，那就是，管理机

构总是准许公用事业公司按包括计算净利润前的利息付款在内的价格出售债券。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来说，它是所有受管理的垄断公司中最大的一家，这就是说，该公司的债券具有非常接近于政府担保的那种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银行和保险公司对出售(或买进)任何更多高质量的公司债券不感兴趣的时候，它们才不愿意出售(或买进)更多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债券。但是，既然菲和奥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这些金融家们总是促使公司多发行债券，那么这一点当然是很可笑的，恐怕菲和奥自己也不得不同意。

至于说到菲和奥在他们所谓的“积累的新方式”中看到了投资过程的“社会化”的迹象和“计划性”的萌芽形式，我只能说，我觉得这是最最荒谬的无稽之谈。在现代的工厂中，生产(不是投资)的真正社会化到处都有嘛；在大公司本身和在五角大楼内部，计划性岂止只有萌芽形式？当然这些都是未来的社会化和计划经济的征候。^①可是，从公司经济的金融上层建筑的一些部门里所进行的卑鄙的投机诡计中寻找社会化和计划性的证据——菲和奥的大部分证据正是从这些方面得到的，我认为这是可悲地缺乏比例感和历史观点的表现，而这种比例感和历史观点对有成果地运用政治经济学是非常关键的。

典型的和非典型的 上述评论使我必须进而对菲和奥的全部表演作出一个说到底必然是最决定性的严厉批评。他们不懂得，为了科学的目的，典型的材料必须掌握并集中精力处

^①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和大公司与五角大楼的计划性采取同样的形式。冬天里有春天到来的征候和春天本身决不是一回事。

理，而非典型的材料则可不予注意或摆在次要的地位。可是相反，他们对于那些可以支持，或者似乎可以支持他们先入为主的任何事实（或所谓的“事实”）抓住不放，至于他们抓着的现象是否典型的问题，他们根本连问都不问一下。

例如，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解释用霍华德·休斯的例子（第二部分，第 86—91 页）作为例证，来说明对美国经济的任何判断这件事呢？（菲和奥认定，“休斯的例子是外界金融势力要求在公司世界里起统治作用的突出事例。”）说得简单一点吧，休斯是个拥有亿万资产的家伙，他成为各家畅销杂志广泛报道的轰动材料，恰恰因为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有规范之外进行活动的。**

菲和奥对詹姆斯·奥康诺的一个绝对正确的观点所作的答复，甚至更加暴露了他们连科学方法的首要因素都没有掌握住。奥康诺写道，“说几个金融资本家操纵股票，牟取巨额暴利，疯狂地把一些工业帝国合并在一起或分裂开来，眼睛盯着的就是获取近期金融增益，这种描述和今天在绝大多数大公司中被称为经理班子决定政策的情况简直是不相符的。”（《每月评论》，1968 年 12 月号，第 32 页）

对此，菲和奥答称：“但是，‘近期金融增益’恰恰是那些集团‘运动’所追求的唯一东西，也恰恰是铁路和公用事业努力从事‘多种经营’所要达到的目的。”（第二部分，第 114 页）关于铁路和公用事业的多种经营的问题，这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不确实的：长远的金融增益才是说得通的唯一目的，而不是近期的金融增益。**但问题还不在这里。奥康诺是

针对“今天的绝大多数大公司”而作说明的，换句话说，是针对典型的公司行为而说的。从菲和奥的回答看来，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要么他们不懂得这对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

宾夕法尼亚中央（公司）据菲和奥说，“宾夕法尼亚中央问题说明……在公司制度进入老朽阶段时金融资本的无限制的统治地位。”（第二部分，第 105 页）乍一看来，对这一点的证明象是很引人注目的。“在 1970 年 4 月〔事实上是 1970 年 6 月〕破产之前，〔宾夕法尼亚中央〕总共十四个董事中有 11 个与 12 家商业银行互有 14 项兼职。经营铁路的宾夕法尼亚中央运输公司的 23 个董事中，与 14 家商业银行互有 19 项兼职。（第 107 页）此外，各大银行借给宾夕法尼亚中央大量的贷款：第一花旗银行——38,700 万美元，摩根保证信托公司——9,100 万美元，化学银行——2,000 万美元，大通曼哈顿银行——800 万美元。（第 110 页，表五）总之，看起来这无论如何是菲和奥声称银行有“无懈可击的地位”（第 109 页）的有利证据了。至于银行利用这种地位的方式，对菲和奥来说，则说明，“看来它们急于把除了铁轨以外的一切东西通通弄走”。（第 114 页）

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宾夕法尼亚中央实际发生的情况，我们看到的却与此截然不同。各家银行尽管有明显的权力，却并没有把“除了铁轨以外的一切东西”弄走，而是吃了一堆倒账，在财政上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在一篇关于银行贷款损失的报道中，《商业周刊》（1971 年 6 月 28 日）是这样写的：

“纽约股票经营商M. A. 夏皮罗公司估计1970年贷款的损失是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年，大部分是由于宾夕法尼亚中央崩溃事件造成的。纽约票据交换所协会的十个成员贷款的净损失总共达19,150万美元。这个星期，《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很有趣味的文件：第一花旗银行的董事长沃尔特·里斯顿给该行高级官员的一个内部通报。第一花旗银行是宾夕法尼亚中央的主要银行；在文件中，里斯顿承认，去年该行不得不修正‘我行净损失的估计数字，把它提高到4,770万美元，比原来所预计的数字大三倍以上。’”

不管银行由于与宾夕法尼亚中央的关系所可能得到的好处有多大——从菲和奥的说法看来，这些好处无论怎么说也不算很引人注目的——都不可能填平补齐那样巨大的贷款损失。

这怎么解释呢？难道银行虽然有牢固的控制权却笨得连保护自己的利益都做不到？也许这么说存在着某项真理的因素。但是，有一种更加说得过去的解释，那就是说，银行受了不老实的经理班子的蒙骗，同意了那些被打扮成为有利可图的、多种经营的计划，并大量地出了钱，可是那些计划事实上都是一系列赔钱的投资。这些赔钱投资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被宾夕法尼亚中央最高的经理人员个人装进了腰包。让我再引一段《商业周刊》关于银行贷款损失的报道：

“伍德拉夫〔制造商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在回顾宾夕法尼亚中央事件时，感到：‘过去我们对这个公司规模之大肃然起敬。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设法掌握更多有关该公

司的情况。不过我也听说过，宾夕法尼亚中央主管金融的官员很善于回避透露情况。’

政府中有些主管银行业务的官员则说得更加直率：宾夕法尼亚中央的财政数字都是‘捏造的，等到银行放款官员们发现时已经太晚了。’

有些银行家们对宾夕法尼亚中央则有‘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可没遭殃！’的感触。纽约六大银行之一的一位高级经理人员说，‘我们的处境比其他银行好一些，那是由于我们一位真正精明的、年轻的副总经理发现了问题。尽管戈尔曼’——宾夕法尼亚中央最后一任的董事长——‘是我们银行的董事之一，我们并不给他们以无担保的贷款。’”

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当然受过类似的蒙骗并且当过类似的受害者，将来无疑地还会这样。就我来讲，我倒并不希望从这一插曲中吸取任何重大的教训。不过，假如我是菲和奥的话，我说什么也不会引用这个例子来证明“金融资本的无限制的统治地位”。

巴伦和斯威齐论利润 我的目的一直是要批判菲和奥的论文，不是为了替巴伦和斯威齐辩护。但是，我不能让他们在进行了无耻的曲解之后就溜之大吉。他们在第二部分的第75页上写道：

“当然，对经理主义者来说，公司是从来不会赔钱的。剩余资金以及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都在不断增长。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斯威齐和巴伦关于公司财政的含糊不清的前提就是垄断利润的不可动摇性。由于利润数量增长越来越大并且

不受限制，内部资金就很充足。但是，利润的的确确是有波动的，而且商业周期也的确确是存在的……。

尽管经理主义者那样说，从 1965 年开始，美国的利润是下降了……”(重点号是原来有的)

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它说明：要么菲和奥对理论上的争论一无所知，要么是无耻地曲解了它，如果他们懂得的话。《垄断资本》的论点是，存在着剩余增长的倾向，但是垄断资本主义却未能

“提供消费和投资出路，而这种出路对于吸收增长中的剩余从而对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顺利运转都是必需的。由于不能被吸收的剩余是不会生产出来的，其结果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正常情况就是停滞不前。假定资本数量不变，成本与价格结构也不变，垄断资本主义的活动率的增长以产生剩余的数量能找到必要出路的水平为限，不能再高了。这就意味着长期不能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任其发展——那就是说，在沒有反作用力量的情况下，而这种力量并不是被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逻辑’的一部分——垄断资本主义只能在长期萧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垄断资本》，第 108 页)

在《垄断资本》一书的许多其他部分，特别是在第八章(“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在分析美国过去一百年左右的历史的全部或一部分时都应用了这个论点。书中沒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被解释为有菲和奥在上面摘引的那段话中所讲

的那种意思。同时，最后还应指出，说美国的利润从 1965 年开始下降也完全不是事实。以下是有关的官方统计数字：（《总统的经济报告书》，1971 年，第 282 页）

公司利润(纳税前)以及存货价格调整

(单位：10亿美元)

	所有工业	制造业
1960	49.9	24.4
1961	50.3	23.3
1962	55.7	26.6
1963	58.9	28.8
1964	66.3	32.7
1965	76.1	39.3
1966	82.4	42.6
1967	78.7	38.7
1968	85.4	42.4
1969	85.8	41.8
1970	77.4	34.1

可以看出，1965 年和 1966 年这两年总利润额急剧上升，而且在 1960—1970 年这整个期间内，尽管 1970 年有周期性的下降，总利润额增长了约 55%。这十年中的另一次下降（在 1967 年）也是周期性的。可是，菲和奥在上面引的那段话之后的几页竟然还能轻描淡写地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 1965 年利润下降时，公司就开始愈来愈依赖来自外界的金融资金。”^①（第二部分，第 93 页）当一个读者发现在自己所掌握的“事实”方面某个作者有错误提法时，这个读者对作者在其

^① 这个说法还应该根据菲和奥自己的数字（见上面第 122 页）来进行评价，这些数字表明，六十年代付出红利的比率急剧下降。利润增长而付出红利比率却下降，公司的内部资金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充足这一点不就很清楚了吗？

他方面的可靠性恐怕也不会有多大信心了，这一点总应该没有提醒菲和奥二位注意的必要了吧！

三

最后，我想回过来简短地谈谈菲和奥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谁真正统治着大公司？

我想，最简短而又最好的回答是：统治大公司的是垄断资本，被统治的不仅包括工业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也包括银行以及其他赢利的金融机构。我这里指的并不是什么形而上学的概念：公司当然是由人来管理的，不是由什么抽象的东西来管理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中所说的，“这里考察的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资本论》第一卷，1963年人民出版社，第XII页）问题在于：管理公司的人是什么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什么阶级关系和什么阶级利益的体现？

菲和奥要我们相信：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工业部分和金融部分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裂；它们之间有不同而且相冲突的利益；金融部分占了上风，把意志强加给工业部分身上。这个论点在通篇论文中都有所暗示，并在以下这一段里明确地表达了出来（第三部分，第46页）：

“激进派们……倾向于用以下这种观点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多方面的不合理性：即，推动现代工业的动力是利润而不是生产。但是这条公式现在也不合适了。正象生产和销售本身都不再是目的一样〔除了资产阶级经理主义者之外，有谁说过

它们本身是目的？），工业利润本身也同样不是目的——至少对控制大公司的资产阶级阶层来说是这样。正象生产必须对销售作出贡献，销售必须对工业利润作出贡献一样，工业利润也必须对公司寡头收归已用的金融利润作出贡献。具体说来，工业利润必须有助于：提高普通股票的价值；增付红利；给予投资银行家们以较大的佣金；给予商业银行以较大的贷款利息。关键之点是，追求金融利润可以部分地同追求工业利润分开来看待。”

尽管他们说的话不算多，但从他们所举的例子以及他们解释这些例子的方法看来，以下一点是很明确的：菲和奥不仅认为，追求金融利润和追求工业利润是不同的——这一点的确是不言自明的——，而且还认为金融家们在追求他们的特殊利益时，经常是以减弱基础工业系统长远的赢利潜力的方式行事的。这就等于说，公司的统治者们不是资本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了，也不体现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了。他们主要关心的已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剩余价值的总额，而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分给他们那一部分的剩余价值额，那怕这意味着把总额减少也在所不惜。换句话说，根据菲和奥的意见，那些控制公司的人并不代表整个的资产阶级，而只代表资产阶级的某一特定部分，有它自己的特殊利益，对整个社会是作为使之虚弱的寄生虫而存在的。按照这个理论，金融资本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且在更加直接的意义上说，也是工业资本的敌人了。这是根据以下的情况得出的结论：金融资本据说不是靠增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是靠压榨

工业资本来扩大它的利润收入的。这样，菲和奥就断定了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基本上是对抗性的矛盾。

理解以下一点是很重要的：这里争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统治阶级内部互相竞争的集团和派别对瓜分剩余价值进行争夺的问题。这种争夺在资本主义下总是存在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发生在金融领域内，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这种争夺就存在一天。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来没有把这种争夺看作是对抗性矛盾的表现：资本家组成一个反对社会上其他成分的一个统一的阶级，这个阶级直觉地懂得，它的主要利益建立在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和这相比较，为了瓜分赃物而进行的斗争只是第二位的東西。

不管菲和奥认识到没有，他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修改。假如他们是正确的话——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那么其影响就的确会很深远：不仅对经济分析是这样，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对政治战略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是不正确的。大公司的绝大多数，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工业公司在内，都是由这样的人来经营管理的，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与他们主要有关的公司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这就保证了他们所采取的政策——犯错误和估计上的不正确除外——会使剩余价值的总额增加，这才真正是使资本家们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单一的、基本上一致的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尽管他们之间有那样多的自相残杀的争吵和冲突。这就是我所说垄断资本统治着公司的含意：垄·断·资·本·是·那·些·正·巧·坐·在·美·国·大·公·司·的·经·理·办·公·室

和董事会办公室里的人所代表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当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观点是否同列宁关于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的理论相矛盾呢？我想是不矛盾的。事实是，今天大规模的联合多国公司本质上说是金融性质的单位，不是生产性质的单位——其中大部分是两种性质兼而有之。典型的情况是，这些金融性质的单位既拥有又控制十几家或者甚至几十家产品各不相同的生产性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都是以为整个集团牟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方式来经营的。

我认为，这种集团完全符合列宁关于金融资本的概念。列宁讲的金融资本，指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工业与金融业的结合。在美国，这种结合达到了顶点，其方式正好在于权力集中在一两百家大公司的手里。正是这种经济权力的集中才使得以下几个方面成为可能：不仅可以更加有效地剥削劳工，而且发展和运用了更加先进的技术，并且在有利地利用经济与社会资源方面与国家进行了更加紧密的合作。这种集中还使得从其他进行竞争的或垄断化较差的经济部门夺过剩余价值中更大的份额来成为可能，这些经济部门包括：较弱小的竞争者、其他较弱小的工业、机械供应厂商、零售与批发厂商等等。此外，垄断资本还尽量从老是波动的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榨取它可能得到的一切好处，还利用由整个经济体系通过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媒介而积累起来的资金以达到这个目的。其结果是，在一个混杂的垄断世界中，制造业、自然资源生产业、公用事业以及提供劳务的大公司都不算，也不能算是纯属“工业”方面的公司了。只有尽可能多地

集中发挥其控制作用，以便为它们自己榨取尽可能多的社会剩余价值，它们才能成其为垄断集团，才能作为垄断集团来进行活动。为了使自已拥有必要的控制权，大公司必须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并通过许多渠道来进行业务活动——既在资本和货币市场，也在工业市场进行活动。正是这一点为构成垄断资本的本质的那种工业与金融的结合提供了基础。

各个贪婪的权力中心之间进行着斗争，谁都在寻求更多的控制权并为自己牟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由于在这个斗争过程中这类结合采用了具体的形式，但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家里，在这个和那个经济地区里，结合的特殊形式是各种各样的。每一个权力中心的战略都必须充分考虑到维持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的价值，避免风险或使风险缩小到最低限度，考虑到竞争的大公司可能采取的反措施。不同的资本主义单位和集团的剧烈竞争同合伙安排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很严格的。因此，通用汽车公司为了广告宣传和促进推销不惜花大量的钱，从而与电视、广播和报刊业分享它的剩余价值。它也乐意同商业银行家与投资银行家分享它的部分利润，但在同时却以为用分期付款销售其产品提供资金的贷款公司的形式，为它自己保留了巨额金融利润中的精华部分。^①

在讨论各大公司分享和争夺剩余价值的各种不同方式时，我们务必不要忽视的一点是：它们所分享和争夺的东西的

^① 如果非和奥说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汽车公司都受银行控制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会准许各汽车公司保留巨大（而且利润也极大）的子公司（如通用汽车承兑公司等等）去为购销汽车提供资金，从而与银行直接的竞争，这岂不是完全不可理解了吗？

来源和规模大小都得依靠劳动一生产的过程。在经济的各个领域中的资本家们都很懂得这一点，那怕他们的学术理论家们却不懂得这一点。如果他们一旦贪婪到无视资本主义生存的这第一条原则，那末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下跌就会很快使他们清醒过来。分析到最后，使得资本家紧紧地抱成一团（不管是否自愿）成为一个单一的巨大利益集团的，正是由于通过日常生活这样一次再次地了解到金蛋究竟从何而来的缘故。

第二部分

通货膨胀，信用，黄金和美元

美元和黄金^①

1966年12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初若干年里，世界货币难题的中心是持续的美国国际收支顺差（从世界其余部分的观点来看，这就是那时著名的“美元荒”）。近年来，难题的中心一直是同样持续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换句话说，就美国整个国家来说，花在外国的钱一直比从外国收入的钱要多，而且现在还是这样。两者的差额，至少在最初表现为外国中央银行和外国政府美元持有额的增长。但是，如果外国中央银行和外国政府愿意的话，它们可以把这些美元去兑换黄金（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财政当局必须对外国人所交付的美元按每三十五美元折合一盎司黄金的兑换率出售黄金）。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认为美元“实际上同黄金一样”，它们可以保存美元并靠它赚取利息（在这个意义范围内，美元比黄金更好）。

事实上，外国中央银行和外国政府一直是两方面同时进行，既购进黄金又增加它们的美元持有额。显然，如果只是因为美国黄金储备迟早总会枯竭，长此这样进行下去是不行的。

^① 这篇文章原来比现在要长，它包括《每月评论》1966年12月号的一篇序言在内，而这篇序言大部分是专门讨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货币问题和危机的。文中有几处提到戴维·迈克尔斯的文章，指的是题为《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增长的金融危机》的文章。

这一部分原来的标题是《不可靠的人和阶级敌人》。

但是，有人时常争辩说，等不到美国黄金储备枯竭，美元“实际上同黄金一样”这个假定就会逐渐受到破坏，用美元挤兑黄金的风潮就会发生。这时，美国就会被迫放弃金本位（就是说，停止向交付美元的外国人出售黄金），就象作为当时世界金融领导中心的英国被迫在 1931 年放弃金本位一样。人们担心，结果就会发生同三十五年前出现的金融危机相类似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而那次危机曾大大加深并延长了三十年代大危机。

这样看来，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机器房里滴嗒地响着的一颗强有力的定时炸弹。除非能及时抽掉这颗炸弹的引线，否则一次毁灭性的爆炸就不可避免，有可能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未来生存能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怎样才能把引线抽掉，这显然是个关键的问题。

乍看起来，答案似乎很简单：美国必须停止象一个挥霍无度的浪子那样行事。美国必须下决心量入为出地过日子——花在外国的钱不多于从外国收入的钱，而不是在全世界各地乱花纸币美元，从而逐渐使人们对美元是否能兑换成黄金失去信心，因为黄金仍旧是唯一被普遍接受的货币形式。换句话说，对付逆差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逆差。只要这样做了，就能消除对于美元的可靠性及其自由兑换成黄金的一切怀疑，纽约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中心的首要地位就会得到保证。

然而，从其行动来判断，美国资产阶级并不接受这样的诊断和治疗办法。从 1950 年以来，美国一直让国际收支逆差存在；到现在为止，已经花去了那时黄金储备的 40%；外国的美

元持有額现在大大超过了美国剩下的黄金储备。至少在过去十年里，许多方面发出过不少警告和告急的呼声，但至今还从未采取过或甚至未开始采取任何减少逆差的确实认真的行动。正象戴维·迈克尔斯在下面的文章里所指出的，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已经考虑或在目前或可预见的将来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怎样解释这个看来似乎反常的现象呢？难道是由于盲目无知还是软弱无能？是不是美国资产阶级或许认为除了消除逆差以外还另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呢？

让我们来看看头脑清醒的美国资产阶级代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首先，他会强烈地反对把美国同一个浪子去类比。一个浪子借债度日直到他的债主不再信任他，接着他就被迫宣告破产：他入不敷出地过活，最后除了债务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炫耀。我们的资本家将坚持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同浪子的行径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诚然，就外国人的美元持有额有所增加的意义范围内，美国是负了债，但是与此同时，美国花在外国的大部分美元，并不是用来购买暂时的奢侈品，而是用来建设或购买贵重的资产。资产阶级代表会说，不应当同浪子去相类比，而同一个银行去相类比才是较合适的。

一家银行通过接受存款来聚集款项，进而投资于各种有收益的资产（对个人的放款、公司的票据和债券等等）。在任何时候，银行必须持有现金储备，以便应付存户的需要。但是这种储备从来不会高于存款总额的一个很小的比额：确实，如果所有存户都同时要求提取现款的话，（因为他们有权这样做）那么银行就无法满足存户的要求最后不得不关门大吉。然

而，在正常时期，如果银行遵循审慎的投资政策，资产可以出售或用其他方法变为现金（例如，放款可以收回），那么拖延一些时间以后，还是可以把全部存款都付给存户的。存户懂得这个道理，因而他们只是在他们正常的个人和业务方面有需要时才去支取现金，于是银行就能够继续行使它的有益的和有利可图的职能，作为那些有多余资金的人和缺乏资金的人之间的中介人。

我们的资本家朋友会对我们说，美国和世界其余部分（特别是欧洲）之间的金融关系，正同银行和它的客户之间的关系相似。美元持有人就同存户一样。他们当然可以在他们愿意的任何时候去兑换现金（黄金），但是，正如上面所举银行的例子那样，每个人都知道，如果美元持有人大家都在同一个时候去兑换现金，银行就没有足够的现金应付每个人的要求。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美国就没有有价值的资产来抵偿美元债务。同样，象在银行的例子中一样，美国投资于各种有收益的资产（分厂、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等等）。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出售这些资产以换取外国货币，这样获得的外国货币可以兑换成黄金，而黄金则可以用来清偿美元“存户”。

一家殷实的银行自然必须使它的现金加上投资超过存款总额，并保持充分的余额——这是一个商业实践问题，在大多数国家里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算一家殷实的国际“银行”呢？换句话说，美国的黄金储备加上较长期的国外投资是不是大大超过它的短期债务呢？这里介绍一下《商业现状》1966年12月号（表14，第40页）的一些最新数字。这些数字表明1965年的情况。外国人持有

的“短期资产和美国政府债务”（这些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美元持有额）达 325 亿美元。同时，美国的黄金储备为 138 亿美元，仅达可以立即要求兑现的美元债权的 42%。这就是那些担心美元不保险的人们常常惊慌地指出的差额。然而，如果我们把美国长期私人国外投资 708 亿美元和美国政府对外国人的信贷和债权 251 亿美元加进去，情况就很不同了。如果我们把资产加在一起（黄金+私人长期投资+政府信贷和债权=1,097 亿美元），减去短期债务（325 亿美元），美国这家“银行”有 772 亿的安全余额，这差不多等于外国人的美元持有额的 238%。

我们的资本家会指着这些统计资料，作为肯定的证据，说明美元远远不是一种弱货币，而是处于非常坚强的地位。他会说，外国的美元持有人没有什么理由要兑换黄金，就象大通曼哈顿银行或纽约第一花旗银行的存户没有什么理由把存款换为现钞一样。前述两种行动的任何一种都是不合理和不负责的。

我们的朋友大概还会进一步争辩说，外国人应该感谢美国维持国际收支逆差。大家都同意，近年来黄金生产不够满足世界各国在货币储备方面的需要。但是只要美元也被认为“实际上同黄金一样”，这些国家的货币储备就可以用美元来补充。事实上，各国也正是一直在这样做的，多亏美国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地向外国中央银行和外国政府的货币储备提供着美元。我们的朋友会说，这样的安排是极为明智的，应该予以确认，并定为国际货币机构的一个永久性的部分。只有当美国未能使它在外国的资产同它的短期美元债务增长得

一样快的时候，这种安排才是不稳当的。但是现在没有这种危险：美国在外国的资产实际上比美国的短期美元债务增加得更快，而且逻辑上也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这一过程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还有一件事我们的朋友没有说出来，但肯定准是这样想的：从美国的观点看来，这种安排还有一个的确不算小的优点，它大大地便利了美国资本对外国经济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渗透，并且居然还能把这种渗透说成是一种卓越的国际美德。因为这正是美国在外国资产的巨大增长的意义所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资产阶级不顾愈来愈尖锐的警告和呼声，没有表示任何要采取行动来消除国际收支逆差的态度。要是采取了行动，那就会阻止美国在国外的经济扩张，同时有损于美国资产阶级认为正在圆满运行和完全稳妥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最好还是劝告美元的外国持有人别再考虑购买更多的黄金，接受现有的制度，并努力使这个制度能更好地起作用。

但是，正象前面所说的那样，那些“不通情达理的”外国人却一直采取另外的做法。他们——特别是法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一直在把他们相当大一部分的美元持有额兑换成黄金；并且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大概还会继续这样做，也许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其规模还会更大。这样做的理由无疑是各种各样的，正如一些美国人所想的那样，其中可能会掺杂着一大堆“过时的”经济思想——崇拜黄金、对于美元安全的不合理的恐惧等等。但是，正如戴维·迈克尔斯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从与之竞争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说，他们这样做具有

十分令人信服和完全适当的理由。用拒绝接受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所创造的美元的办法，他们用不着威胁要耗尽美国的黄金储备，就可以希望以此来迫使美国去消除逆差。这样做还能阻止美国对他们的经济进行渗透，并使他们能够避免逐步沦为不折不扣的美国新殖民地的命运，因为这种命运看来现在正在威胁着他们。从这个立场看，美国人所认为的目前国际货币制度的特殊优点——就是它便利了美国资本的扩张并且事实上加强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看来正是它的最大祸害。

因此我们看到，在货币制度的一切错综复杂和奥秘后面，存在着利害和权力之争的实际问题。美国人显然将不能说服欧洲人改变他们的政策。问题是欧洲人是否能迫使美国人改变他们的政策。

戴维·迈克尔斯强调这一冲突的全球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至于他说欧洲人握有大多数王牌，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看来一定会使美国遭受巨大的经济挫折”，这种看法是否也正确，那就很难说了。我们不想在这里分析他似乎认为最有可能采取的具体解决办法——各国货币同时对黄金实行贬值。他比较详细地解释了这种解决办法如何运用，并在这个过程中阐明了目前国际货币机构的做法。我们愿意提出一个迈克尔斯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按照双方的力量对比，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可能：美国资产阶级不致于被逼至绝境，而是能够把一个“美国的”解决办法强加给它的欧洲对手呢？迈克尔斯引用的文章（埃米尔·德普雷，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沃尔特·萨伦特，《美元和世界清偿能力》，载《经济学家》，

1966年2月5日)用明确的语言提到美国方面考虑了这种可能。(这篇以极端的国家主义和极端侵略性的形式表达美国帝国主义观点的文章,竟出自从新政时代以来长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三个经济学家之手,是特别典型的。象这样的人完全能够看透正统经济学的欺骗性,但是对历史的理解力却如此之差,以致把他们的才能为历史上最强大和最残暴的剝削阶级服务,竟然不感到良心受责备。)作者们奉劝欧洲人最好还是把美国人愿意给他们的任何数量的美元通通吞下,以后又接着说:

“然而,假如欧洲果真不明智地决定把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国即使得不到欧洲的合作,也能重建一个真正的储备通货制度……这个决定要求美国有冷静的头脑。真正的问题在于建立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坚强的国际货币机构,黄金最多只居于从属地位。因为美元居于世界通货这样一个特殊地位,美国可以通过它自己的行动来实现这一改革。有人已经提出了实行改革的几种方法,包括扩大在平价上下购进和出售黄金两种价格之间的幅度,降低购进黄金的价格,以及取消目前黄金可以无限制地兑换美元的规定。欧洲货币当局愿意购进多少黄金,美国就不得不让它的黄金储备下降多少。如果欧洲货币当局购进美国的全部黄金储备(这看来是不大可能的),那美国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让美元贬值,直到资本流动停止为止,或者,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直到欧洲国家决定持有它们从前不愿持有的美元,以制止贬值。如果出现这样一个结局的可能性很大,那末,看来很明显,欧洲国家会在

美国黄金储备剩下最后几十亿美元的时候停止把美元兑换成黄金。”

译成较为直率的语言，这等于对欧洲资本家们说：不要以为你们能吓倒我们；如果你们要把全部黄金拿去，请便吧！我们将使美元和黄金脱离关系，在今天的世界里，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你们需要美国和美元更甚于黄金。你们心里明白这个道理；当你们发现你们的恐吓不灵的时候，你们就会停止这样干下去，同我们一起来设计一项安排，这项安排既承认美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保证你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小伙伴的利益。

美国是否准备走得这样远？没有人知道。至少在目前说来，更为适当的问题是：欧洲人是否真正想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较量一番。戴维·迈克尔斯认为欧洲人是想这样做的。他写道：“因为欧洲资产阶级有一段当‘老板’的漫长的历史和回忆，现在又有强大的金融力量，我们认为它一定而且不久就会站定架势，干它一场。”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支持材料，这种说法并不是很令人信服的。英国资产阶级当老板的历史更长，大概也有同样美好的回忆，然而它没有怎么反抗，就乖乖地接受了顺从的附庸国地位。诚然，欧洲人比英国人拥有更大的金融实力，但是这种实力是以短期美元票据为基础的，不象美国那样，是以对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规模的金融和技术的渗透为基础的。在一场摊牌的战斗中，欧洲人单纯的金融力量能否同经济力量基础大得多、强得多的美国人进行有效的较量，那还很难说清楚。我们看来，仅仅出于这个理由，也

必须对欧洲人“站定架势，干它一场”这种意志的强烈和认真的程度表示怀疑。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克劳德·卡达特的《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法国》（《每月评论》1966年12月号）一文中学到一点东西。卡达特并不怀疑戴高乐的独立反美的外交政策的真实性，他有力地说明了这项政策从法国统治阶级的企业界和官僚界得到很多支持。然而，卡达特也注意到，正如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资产阶级中也存在着亲美的一翼；他认为戴高乐的反美政策之所以能够走得这样远，只是因为他的政策在群众中享有真正的声望。这是一个充满着实际的和潜在的矛盾的局势。这种政策如果坚持下去，几乎一定会同美国发生愈来愈大的麻烦，这大概又会促使法国资产阶级进一步两极分化。为了取得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巨人进行真正战斗所必需的支持，戴高乐将不得不设法加强他在工人阶级中所得到的支持。但是他在这条路上走得愈远，同大资产阶级就会愈疏隔。因此，国际危机的加剧很可能会使国内危机愈来愈深刻。到摊牌的时候，戴高乐毫无疑问会同他自己的阶级站在一边来反对工人们，即使这意味着取消同美国人的斗争。

对美国同一般欧洲资产阶级的任何严重的冲突，也可以适用与上面相似的一些考虑因素，只不过规模要大得多就是了。如果欧洲资产阶级真正想给美国以戴维·迈克尔斯所说的“经济的巨大挫折”，真正的受益人很可能不是欧洲资产阶级，而是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这样一个结局，就是最具有民族主义感情的那些欧洲资产阶级也会小心谨慎地避开，如同魔鬼小心谨慎地避开圣水一样。

这个故事的教训，如果说得上有教训的话，就是，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决不能指望资本家会替自己去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期内，美帝国主义所遭受的失败——特别显著的是在中国、古巴和越南的失败——都是革命人民的成果，而不是任何一种资本家的成果。这个道理迟早必将在欧洲和美国得到证实。

黄金,美元和帝国

1968年2月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说英镑非贬值不可,11月18日这一天,这果然发生了。英国大概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为了勉强维持每镑等于2.8美元的汇率,把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的大部分都用掉了,并且负债累累。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未奏效。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加上不适当和无效果的政府政策,使国际资本深信英镑已无法挽救,对于国际资本的这种信念,英国政府是无能为力的。

下次是不是就要轮到美元了呢?

许多有钱人是这样想的。紧接着英镑贬值的若干星期内,囤积和投机的人们购进了价值以成亿美元计的黄金,这些黄金的大部分不得不由美国财政部来提供。虽然在1月末或2月以前,美国在这次最严重的“黄金抢购风潮”里究竟失去了多少黄金没有加以公布,但迹象表明这个数目会是很大的。按照小埃德温·戴尔在次日的《纽约时报》摘录的1月3日的财政部公告,“1967年从财政部储备交付平准基金〔同外国的交易通过平准基金进行〕的〔黄金〕转移总额达117,500万美元,其中92,500万美元是在英镑贬值后交付的。”这使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减少到1,195,000万美元,一年内下降了约8%。

当然，这部分黄金是按每盎司 35 美元的法定价格购买的，购买的动机是预期黄金价格准会上升。用简单的供求关系的语言来说，在这种预期背后的想法是这样的：1949 年以后，除一年以外，每年美国付给外国人的钱都超过从外国人收进的钱。结果，外国的政府、中央银行和资本家积累了 312 亿美元的巨额资金，他们可以在他们愿意的任何时候用这些钱来兑换黄金。不仅如此，美国国际收支持续的逆差——这项逆差在 1967 年急剧上升到 35 亿美元和 40 亿美元之间（这是约翰逊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说的）——正不断地加强着黄金的潜在需求超过实际供给的优势。人们是这样来推想的：总有一天，现在阻止着这些外国人以美元去抢购黄金的不管什么因素会不起作用，那么对黄金的实际需求就会大大超过实际供给。那时美国将不得不提高黄金价格（美元贬值）或停止出售黄金（放弃金本位），而停止出售黄金大概也要引起金价上涨的。所以，现在购进黄金，等待金价上升，是很英明的。

美国政府这方面，则一直坚持决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 35 美元的兑换率维持美元的价值。因此产生了两个问题：（1）美国政府成功的可能性怎样？（2）如果美国政府失败了，大概会有些什么后果？

美元能够挽救吗？

首先，我们必须分清短期前景和长期前景。美元平安地渡过了英镑贬值以后的投机性的抢购黄金高潮以后，在一个时期内或许还会坚挺一些。这是由于保存黄金费用浩

大；^①许多投机者，考虑到他们不能很快地大捞一把，大概会出售黄金，从而使美国财政部的储备再度得到充实。

但是，根据这个来源使美元地位得到了加强，这当然纯粹是暂时的。从较长的时期看，重要的是美国国际收支的动态。过去，医治英国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的努力归于失败，逆差终于搞垮了英镑，那么，就美元来说，同样的原因无疑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那末，怎样说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呢？消除逆差的前景又怎样呢？

对于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再清楚没有了，可以总结为一个词：帝国主义。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1月4日在纽约的记者招待会上实际上说出了同样的意思：

“他把美国国际收支的困难归因于欧洲和亚洲的防务开支以及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开支。他说，越南战争造成了预期的1967年逆差的至少40%。”（《纽约时报》，1968年1月5日）

“欧洲和亚洲的防务”（当然是针对欧洲人和亚洲人的）牵涉到在全世界各地保持武装部队。从数量方面说，按照1月5日《纽约时报》所载埃德温·戴尔发自华盛顿的电报，“在国外保持军队——包括在越南的军队——的费用造成了40亿美元以上的美元外流。”要给“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标上个价

^① 我们这里引用1月3日《华尔街日报》发自伦敦的一段电文：“这里的一位银行家说，‘现在一个黄金贮藏者每年在保险费、贮藏费等方面要花10.5%’，‘如果再把这样的事实计算进去：一个投资者不费什么事就能够运用他的钱去获利百分之七，那末很清楚，如果黄金贮藏者把他的钱变为金条，他每年就要吃亏百分之十七以上。’”

目，可不是那末容易的，因为这项援助包含着—系列军事的和民用的计划项目在内。但是，从下面的事实可以对它的巨大规模得到一点印象：在1967年上半年，国际收支表中标明为“美国政府的赠款和资本，净额”的项目，数额计达年率43亿美元。（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指标》，1967年12月号，第25页）因此，为了管辖和支撑大美帝国——又名“自由世界”——在美国国际收支方面所花的代价大概约为80亿美元以上。^①这项费用足以吃掉美国贸易出超所获得的美元（贸易顺差在1967年第三季度达年率44亿美元）。至于说到1967年的全部国际收支逆差，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约翰逊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估计这项逆差在35亿和40亿美元之间。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必须对约翰逊政府在元旦宣布的“在来年内使我们的国际收支得到——或接近于——平衡”的计划作一个估价，结论不能不是：这项计划是一个大杂烩，甚至连问题的中心都没有触及到，看来很少有可能达到它所宣称的目标。

从流出到外国，特别是流出到西欧的私人资本中削减多达10亿美元的数字，倒并不是不可能的。欧洲经济目前处于衰退的状态，按事物的正常进程看来，美国本来可能会放慢对欧洲的投资。而且，美国许多大公司现在可以无须总公司的美元帮助就能在外国继续扩张：它们的规模和赢利能力使它们能够在当地金融市场上争夺得到资本。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政府不能减少在西半球以外的旅游开支，这当然得以国会愿

^① 总的费用当然要大得多，因为大部分军事开支，甚至那些由于东南亚的战争引起的开支，也是花在美国国内的，因而没有列入国际收支。

意合作并通过必要的立法为条件。然而，国际收支在这方面的节约是不太靠得住的，因为外国很可能用劝阻它们的旅客到美国旅游的办法来进行报复。约翰逊计划的其余部分，大多是表示一些希望：就是如果外国愿意帮助美国摆脱困难时可以在国际收支方面进行一些节约的希望。例如，外国可以改变它们的征税办法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它们可以向美国购买更多的武器；它们可以对美国的证券进行更多的投资；或者，它们——这里主要是指西德——可以支付美国在它们领土的驻军的全部或大部费用。但是，这些想法没有一个特别新鲜的，从过去的经验看来，也没有一个是很有成功希望的。难怪《华尔街日报》驻华盛顿的记者(理查德·詹森)用下面的悲观的评价作为他的关于国际收支计划的头条新闻的开场白：

“政府制止如脱韁之马的国际收支逆差的孤注一掷的新运动，足以挽救美元吗？”

“虽然约翰逊政府的官员开始散播了一股乐观的情绪，但是在华盛顿见闻广博的分析家中间有一股强烈的暗流，怀疑元旦宣布的好高务远的努力是否能达到基本的目标。一位熟练的分析家宣称，‘坦白地说，我不认为它行得通。’”

“有些谋略家率直地承认，如果美元的枯竭趋势不能基本上停止的话，在一年左右美国和世界很可能面临一次真正的金融危机。要是约翰逊总统的这批控制办法结果远远不能达到完全有效的程度，‘明年元旦再来听贬值的通告吧’，一位局内人说，他只是半开玩笑而已。”(《华尔街日报》，1968年1月3日)

一项没有触及问题根本的补救办法很少有成功的机会，这当然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强调指出的，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的原因是维持帝国所需的高额费用；在这一方面，约翰逊政府符合于它的本性和记录，没有丝毫节约的意思。用元旦对报界声明中的话来说：“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在国外的主要承诺，美国的安全和生存依赖于这些承诺。”这里所指的当然是美国作为世界范围的帝国的主子和剥削者的安全和生存。

在这里，暂时离开本题来讨论一下有些读者心里可能会发生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值得的。如果帝国的费用这样大，谁需要它呢？答案是：那些从帝国得到利益的人们需要它——那些从全球性的经营中赚取数以10亿美元计的庞大的跨国公司需要它。即使纯粹从国际收支方面看，大公司的收入也是巨大的：在1966年，作为从对国外公司的直接投资取得的收入加上手续费和特权使用费而流入美国的美元就达51亿。这还不包括在外国支付或再投资的几十亿美元、300亿美元的出口贸易的利润、以及向美国拥有700亿美元的军事机构提供武器弹药的利润等等在内。也不应该忘记，虽然帝国的利益归属于几百家大公司，而费用却为全体纳税人所分担。帝国是费用浩大的，这一点也没有疑问；但是，从受益人——这些受益人正好也控制着美国政府——的观点来看，为了维持帝国和保卫帝国对抗敌人所花的每一块美元，都是花得很值得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约翰逊政府应该问问它自己的问题，与其说是它能否用一些肤皮潦草的控制和规章来消除国际收支

逆差，倒不如说是它能否现实地希望在未来时期内国际收支逆差不再增长。换句话说，维持帝国的费用，难道不是也会同生活费用一样，正在逐日上涨吗？

在我们看来，回答似乎显然是肯定的。上月份，我们在本刊分析了东南亚的形势，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认为那里的趋势是战争的扩大化。美国军方赞成战争扩大化，可是不幸得很，我们没有确实的证据说明美国大公司准备以任何认真的方式来反对军方。现在没有人能预测，战争的逐步升级将走得多么远，但是看来战争费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几乎肯定要上升。假如约翰逊果真有对付这种前景的计划，他对这些计划的保密工作倒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此外，还存在着更多越南式的威胁，在亚洲本身、在非洲或在拉丁美洲——或许在欧洲某些受折磨的国家如希腊或葡萄牙。何时何地发生，显然都是未知数。但是，如果在这个变化无穷的宇宙中看来还有任何可以确定的事，那就是，在最近将来的历史时期内，世界很多部分将经历伟大的革命斗争，而美国将尽全力去进行镇压。面对这样的前景，梦想消除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其现实程度差不多同相信能回到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一样。

最后，不仅对付革命的战争的费用大概会上升，防止这种战争发生的费用大概也将上升。从本质上说，对不发达国家援助为的就是这个目的。当“第三世界”的贫困国家在不发达的泥潭里愈陷愈深的时候，——在它们的人口迅速增加和腐败的殖民地、新殖民地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条件下，它们必然会愈陷愈深，——它们的寡头统治者会愈来愈多地依靠宗主国

提供粮食来养活饥饿的人们，提供枪炮来屠杀反叛的人民。国会可能会象它在 1967 年所做的那样，用削减“对外援助”拨款的办法来进行阻挠，但其结果只会使更多的越南加速出现。

因此，在未来的若干年月内，现实的前景是国际收支逆差将会扩大而不是收缩。而这又意味着，在保持 35 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的自由兑换率的意义上说，美元得到挽救的可能性是确实很小的。

从金本位到美元本位？

当美国放弃金本位的时候，其他仍旧保持金本位的国家可能会跟着做，结果就会出现一个浮动汇率制度。这至少在理论上说并不新鲜；事实上，有相当地位的一派货币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在鼓吹这种制度。可能会作出一些努力，在新的平价上重振金本位，例如规定 70 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其他通货也相应地重新定价，^①但是很难想象，怎样能达成一项总的协议；更可能的是，黄金将失去它在“自由世界”货币机构中的必不可少的飞轮的作用。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步骤，因为，正如舒姆彼得所说的，“自动的黄金通货是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经济的主要部分。”^②诚然，金本

^① 关于这些措施的可能含义的分析，可参考戴维·迈克尔斯，《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增长的金融危机》一文，载 1966 年 12 月《每月评论》。那一期《每月评论》里的另外两篇文章，一篇是编者写的，一篇是雅各布·莫里斯写的，对于了解目前国际货币情况可能也会有些帮助。

^② 转引自雅各布·莫里斯，《作为货币理论家的马克思》，载《科学和社会》，1967 年秋季号，第 406 页。这篇文章有助于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黄金的作用以及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位可以称为“自动地”运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它毕竟还能继续存在。它证明了以下的事实：直到现在，一个包含着至少是不彻底的民族资本主义单位的国际经济制度仍在运行中。看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美国采取行动，要求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有完全统治权。从这个角度看，金本位——它支撑着象法国这样一个国家所保留下来的那怕是很微弱的独立性——简直是一个必须消除的障碍。这种对金本位的谋杀，表面上将不是故意地和残酷地进行，而是经过一番试图挽救它的生命的适当表演以后，在一场金融危机和挤兑美元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压力下进行的。

金本位完蛋以后，将会是什么本位呢？

从美帝国主义的观点看，自然只有一个答案：美元本位。帝国的从属单位将以美元作储备，美元或许将贴上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标签稍加掩饰，同时，从属单位将接受美国在国际收支逆差的形式下愿意支付给它们的更多的美元。帝国主义的货币理论家认为有两点理由说明这是一项卓越的安排。第一，“自由世界”对于一个扩大的通货基础的需要——目前这种基础受到缩减着的货币黄金供应量的威胁——将完全而灵活地得到满足。^①第二，美国能够继续保持国际收支逆差，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种逆差是帝国的必不可少的费用的一部分。

“唯一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是否愿意跟着走，接受它们作为美国新殖民地的角色，并通过保持愈来愈

^① 货币黄金供应量的缩减一方面是由于工业用黄金和贮藏用黄金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新黄金的生产率稳定或甚至下降。

多的剩余美元，默示地同意承担维持帝国所需的费用的一部分。

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已经作出了决定：叫它们干什么它们就干什么。但是法国和共同市场则还是一个大问号。的确，在目前，即使戴高乐似乎也更多地倾向于嘴里谈论独立而不是独立地行动。但是必须考虑到，形势在未来一年左右可能会非常剧烈地改变。如果美国在亚洲大陆投入一场日益扩大的战争，正如现在看来很有可能的那样，它的实力和在世界其余地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就将不断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设想并不是不自然的，即不仅法国，而且整个共同市场，都可能决定同美帝国主义斗争而不是同它联合。在货币方面，这会意味着建立一个敌对的通货集团，并把尽可能多的附庸国家拉进这个集团。关税战和贸易战又会再次流行，象三十年代那样。欧洲人大概会试图同社会主义国家缔结影响远大的策略性质的联盟。

我们并不是预言这些事将会发生，更不是预言这种重新兴起的帝国主义间的敌对行动可能产生什么后果。但是，当目前无限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各种动力在未来岁月里展开的时候，这似乎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发展。

关于通货膨胀和美元的几点意见

1970年3月

人们长期以来就知道，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下，即使总的有效需求一点也不超过生产潜力，也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只要在经济的一个或更多的部门里需求剧烈上升，使这些部门的垄断公司能够提高价格而获取更大的利润，就足以使通货膨胀发生了。经济的其他部门，即使存在着过剩设备能力，也没有理由降低价格来抵销可以称为活跃部门的较高的价格。这样，我们对平均物价水平的上升就能够有一个说明了。但是，事情并不到此结束。活跃部门增长的活动意味着对劳动、原料和设备的需求增长。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因此也要上升，而这种价格的上升势必以提高成本的形式扩展到其他部门。其他部门的资本家又提高他们的价格来补偿较高的成本，因而推动总的物价水平又来一次上升。当物价上升象池水的波纹一样从他们的起始点向四周扩展的时候，它们就会影响到经济——公共的以及私人的经济——的愈来愈多的部门，迫使每一个人试图尽其所能用提高他的货物或劳务的价格的方法来保护自己。这一整个过程，只要一旦开始了，就带有一种永远会自己延续下去的性质。特别是当原来的活跃部门的增长的需求又回降的时候，这种回降虽然大概会使生产方面出现一次衰退，但决不足以制止物价的上涨；而各部门需

求的任何一次重要的改变又会给物价上涨以一次新的动力。所以，在一个垄断经济中，沒有一次长期的停滞就不可能制止通货膨胀，在这样的长期停滞中，设备能力的过剩和失业将遍及整个经济体系。^①

上面对于通货膨胀过程的解释，看来很切合近来美国的实际情况。在过去二十年间，有三段显著的通货膨胀时期——朝鲜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1956—1958年的通货膨胀，六十年代的通货膨胀，后者在1965年加快速度，而且现在仍在强烈进行中。在这整个时期中，经济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处于真正紧张的状况。在1944年，失业率达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占总劳动力的1.2%，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失业率只有一次降到3%，在1953年达到2.9%。同时关于设备能力利用的资料表明，总的说来，美国经济在这些年内通常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缓冲的闲置设备能力。通货膨胀和人力、物质资源的充分利用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关系，也从下列事实得到充分证明：在本文写作的时候，消费物价正以每年约7%的比率上升（正是或接近二十年来的最高峰），而失业几乎达到总劳动力的4%，设备能力利用率则从1958年以来第一次下降到80%以下。

朝鲜战争带来了军事开支以及厂房和生产设备投资的巨大增长。这几方面显然就是引起五十年代初的通货膨胀的那些活跃部门。1956—1958年的一段插曲则有所不同：那时沒

^① 对于这种通货膨胀的创始研究，经过十年以后仍旧值得仔细研读的，是查尔斯·舒尔茨，《近来美国的通货膨胀》，研究论文第一号，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考虑关于就业、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问题而准备的材料，1959年9月。

有战争，正如查尔斯·舒尔茨在上面提到的文章里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那几年的较温和的通货膨胀是由资本货物开支的迅速上升引起的。1965年真正开始的最近一次通货膨胀，在主要方面同朝鲜战争时期的格局一样。以1964年，越南战争美国化以前的最后一年，同1969年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情况(单位：10亿美元)：

	1964年	1969年	增加
军事开支	50.0	79.3	58.6%
厂房和设备开支	47.6	75.3	58.2%

军事开支同厂房和设备开支以几乎相同的百分比上升，这当然是巧合，尽管是个颇值得注意的巧合。但是，这两方面无论如何都一直是最近一次通货膨胀的活跃部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在这两个部门之间，军事部门起着触发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较为仔细地考察一下目前的情况。我们已经说过，通货膨胀正以迅捷的步伐前进，同时经济中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萧条。事实上，当我们的经济进入许多权势集团经济学家和书呆子称之为美国十年内第一次衰退的时候，萧条的程度正在迅速增长。

大多数观察家看来认为，这次衰退是尼克松政府一年前上台时所采取的银根紧缩政策引起的。这种意见认为，银根紧缩促使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又阻碍某些开支，结果造成生产减少，解雇和经济活动的普遍减缓。在有些场合，事情无疑是这样发展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因果关系是否具有很大重要性，是可以争论的。利率上升是通货膨胀的通常伴

随物^①：利率的趋势从 1965 年以来一直是向上的，并且直到 1969 年大概还会继续上升，不管政府的货币政策如何。所以，引起目前衰退的并不是银根紧缩，虽然银根紧缩可能在一定范围内起了助长作用，即它促使利率上升得比没有银根紧缩的情况下更高一点。应对这次衰退负责的因素，倒不如说由于军事开支起先只是维持在一定水平上，接着就开始实际下降了。这里从 1 月 24 日《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摘引评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核心部分，即航空与空间工业的苦恼的几段：

“美国航空与空间工业的一些公司度过了十年来最差的一年以后，又面临着一场可能是紧急的艰难困苦局面的重演……”

“尼克松总统自己作出了许诺，军事开支在目前财政年度削减了 40 亿美元以后，将在 7 月 1 日开始的十二个月里再削减 50 亿美元。”

① 理由很清楚。假定物价水平以每年 10% 的比率上升。一个人以 10% 的利率贷出款项，到年末将拥有比原来多 10% 的钱，可是这只有同年初正好相等的真正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没有人愿意贷款。购买不动产或选购那些价格比一般物价水平上升得更快的东西要合算得多。因此，借贷只有按照超过 10% 的利率才有可能进行。把这个道理应用于美国，我们看到，实际利率——按物价变动作了调整的利率——并不特别高。由于物价每年以 5—6% 的比率上升，近来通行于上等债券的 8—10% 的利率，折合成实际利率约为 4%，这同 1965 年通货膨胀率开始上涨以前这一类债券的利息约略相等。然而，还有一件事必须说明：一旦通货膨胀率放慢或者中止，按照高利率借进长期借款的人们（这种高利率按照当时上升中的物价似乎是合理的）突然发现他们所付的实际利率升高了。这样，就产生了赞成通货膨胀继续下去的一个日益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从航空与空间工业的另一个重大合同来源者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那里，本星期传出了在1971财政年度内再削减支出15,000万美金的消息，这将使它的预算减少到335,000万美金。而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在目前财政年度的预算是37亿美金，已经比上一年度减少了2亿美金……”

“不管1971财政年度的情况怎样，这个工业也不能希望消除1969年下半年已经作出的削减所继续发生着的影响，正是在1969年下半年防务合同开始有显著下降的趋势。从7月到9月，即现在可以得到统计资料的最近一个季度，采购合同总额从一年前的109亿美元降到86亿美元。同时，飞机采购合同总额从一年前的21亿美元跌落到16亿美元。”（重点号是引用者加的）

上面加重点号的字句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合同总额的变动预示着未来的开支变动，用《商业周刊》的作者颇为恰当的话来说，就是“把震波从大承包商传递到小承包商”。开始通货膨胀的经济部门也将是开始生产衰退的经济部门，这是同上面叙述的理论相符合的。同样，按照这个理论，通货膨胀一旦象现在这样开始以后，就能很容易地经过衰退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下去。

至于除了通货膨胀将继续下去以外，还将发生什么事情，那就不可能预测了。或许权势集团的经济学者预测得对，他们说在相当短暂的衰退以后，接着会有回升，温和的增长和逐渐消退的通货膨胀。自然，他们也可能预测得不对。

《幸福》杂志2月号的“企业情况杂拾”栏清楚地指出了情

况的变化不定：

“很清楚，联邦储备系统非采取一些行动不可……而且还得快，使落后的实际需求顺利地过渡到温和上升的需求，而不发生一次重大的衰退。要做到这一点而又不使通货膨胀加剧，是项很伤脑筋的任务，这项任务正由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移交给他的继承者阿瑟·伯恩斯。”

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如何完成这项“很伤脑筋的任务”；如果伯恩斯先生及其同事不能及时发现其中的奥秘，那末不管他们怎样做，都很可能会促成更多的通货膨胀或更深的衰退，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展望未来的时候，甚至还有可能出现一次金融危机和一次真正的萧条，排除这种可能性会是错误的。在军备扩张（在肯尼迪上台后立即开始进行，约翰逊使越南战争美国化时又大大地增加了）的影响下，在将近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各种不平衡、紧张和矛盾都在美国经济系统中积累起来。譬如，以负债额与收入相比的不平衡增加为例（以10亿美元为单位）：

	1960年	1969年	增加
个人收入	383.5	629.6	63.4%
消费和抵押贷款	197.3	388.8	97.1%

这些数字表明，在六十年代，人们的负债的增长比收入的增长快50%。在表面看来好象是无止境的繁荣的气氛下，这种不平衡似乎并不要紧。但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历史告诉我们，一旦繁荣中止，这些不平衡就会冒出头来，并且平衡的

本身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确实，象发出“狼来了”的虚假警报的小孩一样，激进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过于频繁地发出萧条的警报。很多人，特别是欧洲的左派，现在似乎相信资本主义真正改变了，再不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崩溃了。现在进行预测是乱弹琴，但是提醒人们狼终于会来到的人却不是。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美国通货膨胀的国内问题的各个方面。然而，通货膨胀在国际上的错综的含义并不是不重要的。

由于前面已经提到的理由，一切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而今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包括其落后的部分，都在垄断组织的统治下——都具有通货膨胀的倾向。如果通货膨胀率在整个系统内大致相等，这不会成为国际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可是，这种大致平等的现象并不存在，而列宁和其他早期布尔什维克作家们着重强调的不平衡发展规律证明，如果有时达到这种平等的现象，那也只是偶然的和暂时的。实际上，通货膨胀率在不同的国家和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很大的差别，这对各个国家和它们的统治阶级都会有极为重要的后果。

以过去五年的美国为例，物价上涨比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快。这意味着，在外国销售美国货愈来愈难，而在美国市场销售外国货则愈来愈容易。结果是商品的出超减少了，因而妨害了美国赚取外国货币的能力，而外币对于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各种活动是必需的（特别是军事活动，例如在越南的军事活动，所需的外国货币是大量的）。自越南战争美国化以来，1964年多达6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到了1969年大部分都

消失了。其结果当然是美国国际收支地位大大削弱：在国际范围内说，美国远远入不敷出。在过去几年，这一事实被一些特殊情况给掩盖起来了。例如，六十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的长期繁荣从欧洲的投机者和投资者那里吸引过来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当美国国际收支在这方面的力量来源在一年左右前开始枯竭的时候，美国的银行开始大量借入外国人持有的美元，以便至少部分地逃避联邦储备当局愈来愈带限制性的国内信用政策对它们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这种资金的流入并不是万应药：恰恰相反，从长远看来，它们是潜在的弱点所在而不是潜在的力量源泉。

美国怎样能入不敷出地过活的呢？以最简单形式表示的答案是，直到现在为止，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接受愈来愈多的美元，盲目地假定这些美元是最后可以兑现的一种借据形式。换句话说，美国象一个生活阔绰的富翁，食品商、裁缝、售酒商等等都让他欠下愈来愈大的账，因为他们相信他迟早会付清这些欠账的。无论是在前一个还是后一个的例子里，问题都是，这种情况究竟能维持多久。

自然没有一个到处适用的答案。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在美国的情况下，牵涉的因素是如此之多而且互相关联，以致完全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定的：借据不能永远地累积下去。迟早总有一个时候，债权人会说“不行！”并且要开始设法收回已有的贷款。而这会意味着目前国际货币制度的完全崩溃，其后果大约会比 1931 年国际货币制度崩溃所带来的更为深刻和广泛。

我们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考虑这些后果的性质，而是要指

出,在美国目前通货膨胀的速度下,清算的日子不可避免地愈来愈逼近。正是这件事情,而不是别的事情,迫使尼克松政府采取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

这里自然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愿意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接受数量这样大的美国美元借据呢?在四十年代以后,美国只有两年有国际收支顺差,在二十年间付出的美元超过收入的美元的累计总额达 350 亿美元至 400 亿美元。截至 1968 年底,美国对外国人的短期债务等于美国的黄金储备、外国货币持有额和国际货币基金储备余额总和的两倍。怎样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余部分竟会这样甘愿地继续吸收看来愈来愈弱的美元呢?

一般说来,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组答案。第一组牵涉到美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储备通货的作用,第二组牵涉到一切资产阶级政权所共有的害怕心理,害怕美元的霸权一旦受到严重挑战时可能发生的后果。

储备通货就是其他国家把它同货币黄金一样对待的通货,就是说,它们把储备通货作为对它们自己通货的支持,并作为清算国际账款的一种手段。美元和英镑过去都是储备货币,但是近年来美元取得了实际上垄断的地位。在国际货币制度顺利运行的时候,美元完全在“实际上同黄金一样”,甚至确实比黄金还更好,因为美元能挣得到利息,而黄金则不能。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当国民经济增长和世界贸易扩展的时候,对货币储备的需要也会增加。由于近年来新黄金的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我们不必在这里花时间研究其原因何在),这一差额必须用美元来填补。正是通过美国国际

收支持续的逆差，才把这些美元补充到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储备中去了。

这对美国来说是最合适而且有利可图的安排。^①而且它对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也一直是有好处的，只要没有其他通货能够起美元所起的作用，甚至还可以说它是必要的。戴高乐常常说要把美元从王位上拉下来，但是他的替代办法是不现实地回到纯粹的金本位，显然他除了说说以外就没有更多的力量了。所以，人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内，资本主义世界必须接受美元的不断外流，作为使它的全球结构保持完整的一种代价。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但是“在一定程度内”并不意味着永远或无限制地这样下去。看来，越南战争美国化以后的美元外流，大大超过了继续满足货币储备增加所需要的数量，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可是面对这种情况，其他资本主义强国却继续表示很大的容忍，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最根本方面说，理由是简单的：惧怕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大变动可能使革命力量一发而不可收拾。1964年到1968年的黑人暴动以及1968年法国的五月事件证明，这些力量是存在的。从此以后，国际资产阶级一直在担心和疑虑，下一次火山要在何时何地爆发。在这样的情况下，强国之间存在着相当普遍的一致意见是并不奇怪的，都认为现在不是掀动波澜的时候。1969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的一段报道（克

^① 如要得到更充分的说明，可参考哈里·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1969年，第80—100页。（中译本《帝国主义时代》，197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87页及以下各页。）

莱德·法恩斯沃思发自瑞士巴塞尔) 启发性地阐明了问题的所在:

“在这里举行的十大国的中央银行家的会议上,美国把它的国际收支的持续的逆差同美国的黑人骚乱问题联系起来。

“美国的中央银行家告诉西欧和日本的同行,美国不能接受解决国际收支问题所牵涉到的社会代价。

“消除国际收支逆差最有效的方法是开一张衰退的药方,但是美国人说,按照传统的就业格局,最先被辞退的人将是不熟练的黑人工人。他们说,这将促使种族骚乱加剧到无法忍受的程度。

“这种论点并不是新的,但是在国际货币会议上提出这种论点却是不平常的……

“据同一个消息来源说,欧洲人和日本人的反应是同情的。他们的态度可以总结如下:

“由于国际贸易的增长依赖于美国经济——世界上最富有的市场——健康发展,让这个经济进入一场衰退并受到骚乱的折磨,对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美国的论点,是在负责货币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克透露到九月为止的第三季度美国国际收支又产生巨额逆差以后提出的……

“美国的政策仍旧是继续以限制信用的办法来阻止通货膨胀。但是,从美国在这里的立场看来,重点现在看来是放在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失业的大量增加。失业率现在约达

4%……

“这个政策暗含着一个往往没有公开说明的信念，那就是，失业上升会使黑人骚乱更加恶化。”

按照这个报道，欧洲和日本的资本家有两个理由对美国的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采取容忍态度，一个是积极方面的，另一个是消极方面的。积极方面的理由是，通货膨胀的美国经济为他们的出口货提供了一个再好也没有的市场，而且归根到底，他们自己的繁荣是严重地依赖于美国市场的。消极方面的理由是，美国通货紧缩大概会引起危险的政治动荡。

我们想提出可能的第三个理由，就是说，其他国家的资本家并不象他们有时看来那样地真正反对美国的军事开支和军事行动，正如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军事开支和军事行动是产生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逆差的根本原因。只要美国战争机器的目的是在整个第三世界支持那些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持友好态度的政府，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也就成了这种行动的共同受益人。由于他们不必承担这种世界范围的警察行动的直接费用，他们很可能认为，他们至少能够做些间接帮助美国的事，那就是把这种行动的副产品之一的美元外流吸收下来。进一步说，如果美国采取较为温和的军事姿态，欧洲人和日本人大概会感到自己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警察行动。从他们的观点看，这一发展会有双重的损失。一方面，由于美国经济通货膨胀较轻微以及调拨给军事用途的资源较少，美国人将能更好地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另一方面，由于欧洲人和日本人必须扩大他们的军事努力，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就不会

成为象先前那样难于对付的竞争对手了。换句话说，现在这种由美国进行大部分警察行动并承担全部直接费用的安排，不会不受到欧洲和日本资本家的欢迎，并把它看作是极明智的安排。为什么要对美元施加不必要的压力，使它陷入危境呢？

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其余部分对美元的容忍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美元部分地是国际货币制度运行所必需的，这种制度愈来愈多地以美元为基础，愈来愈少地以黄金为基础。^①甚至拒绝接受比为这个目的所需的更多的美元，就很可能对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带来很不愉快的后果。所以他们一般地避免对美国施加压力，宁愿让历届美国政府自己去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处理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问题。由于

^① 黄金的自由市场价格近来下降到，有时还低于，一盎司等于 35 美元的法定货币价格。这清楚地表明，至少在目前，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决心接受一个实际上的美元本位。由于国际货币基金创立了特别提款权制度，一切有关方面就更容易下这种决心了。这些特别提款权（以后三年内将创造价值 95 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实际上是不兑换的国际货币，并且，当然要按照“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的由来已久的资本主义原则予以分配。在《货币制度激起贫穷国家的忿怒》的标题下，《商业周刊》在 10 月 4 日的一期里评论如下：

“当工业富国正在修补和支撑国际货币制度的时候，贫穷国家正以日益增长的憎恨情绪注视着。

“它们认为象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和扩大限额这一类计划对它们没有什么好处……

“这个星期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年会只是加强了贫穷国家的许多代表的看法，即国际金融机构是富人的俱乐部。

“一个拉丁美洲代表对特别提款权的讥刺的评语透露出了他们的情绪：‘看到富有国家为它们自己投票通过额外的 90 亿美元，同时削减它们对我们的援助，那真是令人厌恶啊。这正象在饥饿的人们面前把肉排去喂狗那样。’”

这一评语的正确性大概不会因为下列事实而有所减弱，即上面提到的那位代表无疑地代表着专门在饥饿的人们面前把肉排喂狗的寡头统治者。

约翰逊政府的政策证明是不适当和无效的，尼克松政府上台时乃发现自己面临着—个无法控制的局势。

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后，现在又回到几页以前我们讨论通货膨胀的国内方面的地方来了。为了国际的理由，同样也为了国内的理由，控制通货膨胀对美国统治阶级来说变得愈来愈重要了。但是，能不能在不发生真正的萧条和长期停滞的情况下控制通货膨胀呢？

象加尔布雷思这样的自由主义者，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惯于这样地回答：通货膨胀能够用直接控制的制度（如物价和工资的固定，稀少资源的调拨或配给等等）得到控制。但是不管是约翰逊政府还是尼克松政府都不曾认真地考虑这个办法，大概主要因为大公司和工会都强烈反对管制。另一个起过作用或没有起过作用的理由是，要管制有效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民族团结和公民纪律，没有这些，管制就达不到目的，而会变成贪污贿赂的无底洞。同以前的战争不一样，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的恰恰是同民族团结和公民纪律相反的东西。因此，即使政府准备采取控制办法（事实上政府从没有准备采取），很可能情况会变得更糟，而不是较好。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可能不是继续通货膨胀，就是一次萧条和停滞。显然，哪一种前途对美国统治阶级都不是“可接受的”，因而我们预期会有很多关于其他解决办法的谈论，以及策划如何实施这些办法。但是最后分析起来，不管采取什么办法，我们的前途可能是多种危机大大加深，这将缓慢地但是确实地削弱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使它控制其受害者的能力和保持同盟者对它支持的能力都受到损耗。

清偿能力的长期下降

1970年9月

目前这次经济衰退在很多方面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前几次衰退颇为相似。同通常一样，起作用的重大直接因素是私人投资的下降，也同通常一样，私人投资中最容易起变化的部分是对存货的投资。下面是从1969年第三季度（当时投资总额达到最高峰）到1970年第一季度（写本文章时可以得到的最近数字）的数字（单位：10亿美元，以年率表示）：

	国内私人投资毛值	企业存货变动
1969年第三季度	143.3	10.7
1970年第一季度	135.0	0.8
下降	-8.3	-9.9

可以明显地看出，存货积累的下降实际上超过了私人投资总额的下降，因而可以精确地认定它是这次衰退的直接原因。

有趣的是，在1966—1967年间，在同样长的时期内发生了极相似的投资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还更大。这里是相应的数字：

	国内私人投资毛值	企业存货变动
1966年第四季度	122.2	18.5
1967年第二季度	105.1	0.5
	-17.1	-18.0

可是，尽管私人投资发生了这样大的摆动，在1966—1967年却

并没有出现衰退（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的意义上说^①）。为什么呢？

回答是，越南战争在 1966—1967 年间正在全面地逐步升级，军事预算迅速上升（从 1966 年最后一个季度的 656 亿美元上升到 1967 年第二季度的 725 亿美元），这对整个经济具有足够强大的刺激性的效果，使它能经得起私人投资强烈不景气的打击。同上次相比，这一次军事开支有了温和的下降（从 1969 年第三季度的 803 亿美元减到 1970 年第一季度的 789 亿美元），所以起了加深私人投资不景气的影响。人们在脑子里自然会问：在私人投资下降和军事开支下降同时发生的情况下，为什么总的不景气没有变得更加厉害一点呢？理由是，消费者的收入和支出一直在继续上升。这在经济下降初期阶段是通常的现象，消费的变动落后于投资的变动是其特点。然而在目前的衰退中，预期的消费下降由于政府采取了行动而被防止了，主要是由于社会保险付款增加了的缘故。《商业周刊》在 7 月 25 日一期中写道：“这些〔政府对个人的〕付款由于社会保险金在春季的增加而变大起来了，现在达年率 775 亿美元，比 1 月份以来增加了 87 亿美元。”我们还可以再补充说，比一年前增加了 100 亿美元。

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美国经济的“正常的”周期运行，也关系到政府用行动加以干预——加强或削弱——的方式。这

^① 实际上，官方数字表明，从 1966 年第四季度到 1967 年第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4 亿美元。不过在约计 6,600 亿美元的总额中，这个下降额在统计上是不足道的。从 1969 年第三季度到 1970 年第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63 亿美元，这说明了为什么普遍承认这算是一次衰退。

里并未涉及到特别新的或想不到的内容；并且可以看到，人们不必把这次衰退归罪于银根紧缩，也不必援用新奇的货币理论来解释近来的经济现象。同样，目前在经济学家和其他商情观察家中间广泛流行的一种看法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这种看法认为：用流行的行话来说，这次衰退已经“到了底”，下一年左右的前景是国民生产总值回复到较高的水平，同时失业情况也会有一些好转。很自然，关于经济复苏会多快地来到并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但是同认为经济动向从此以后将向上升这种意见一致的程度相比，这些分歧就显得很小了。过去的经验就是这样引导我们去进行预测的，除非有迫切的理由，人们恐怕不会轻易地忽视过去的经验教训吧！

然而，目前的情况和战后前几次的衰退之间是有差别的。一个差别是，在这次衰退的整个时期中，物价上升更为强烈。但这只是程度上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例如，在紧接着特别旺盛的投资繁荣而发生的1957—1958年衰退中，物价也继续上升。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目前的这次衰退并不是独特的。然而，在企业倒闭方面，这次却出现了真正的新现象。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企业倒闭的数目和所牵涉到的负债额增加了，因为出现衰退时总会发生这种现象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日益增多的大公司被迫破产或面临破产的威胁，这是战后以来的头一次。7月26日《纽约时报》题为《破产中的公司》的一篇社论的开头两段如下：

“这个国家面临着大萧条以来从未碰到过在程度上与此

相当的问题：联邦政府对正在破产中的私人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随着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破产、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资金清偿能力受到威胁以及一些破产中的股票经纪商的清理和合并，这个问题引人注目地呈现出来了。”

这篇社论马上又试图向读者重新保证，情况并不真正那样糟：

“以上三个例子的不同之点大于相似之点。无可否认，对铁路公司、飞机制造公司和股票经纪商——以及其他行业的公司——的威胁，由于长期的经济放慢和对清偿能力的挤逼而加深。虽然这种威胁现在还没有过去，可是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一些月份里更多的资金和信贷流入经济方面将会防止日益扩大的企业破产浪潮。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国家并不是濒临类似三十年代大萧条那种全面灾难的边缘。”

这里的逻辑是古怪的。一方面，据说我们面临着大萧条以来从未碰到过的问题，这当然是指一些长期的势力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所提到的唯一的临时因素是纯粹周期性的因素，这个因素被认为是正在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变。而最后得出“几乎可以肯定的”结论，认为我们并不濒临另一次大萧条。《纽约时报》似乎想要避免（在经济界的评论家中间，想这样做的决不止《纽约时报》一家）对以下的事实进行任何讨论，即为这个企业倒闭的特殊问题尖锐地出现在目前而不是出现在过去二十五年中的任何别的时候呢？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掌握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有关整个制度的债务和清偿能力情况,而不是有关个别公司的情况。大家知道,在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债务结构相当彻底地收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公司或个人手头都充斥着现金,而许多种类的货物和劳务的供应则缩减了或(象在新汽车方面)完全没有供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现金的一个明显用途就是清偿债务。所以,美国经济在战争结束时清偿能力空前强是并不奇怪的。下面事实可作例证:全部公司资产(和负债)在1941年和1945年间增长了30%,而公司债务则只增加了2.8%。个人和非公司企业的情况还要好:他们的债务在战争时期实际上减少了2%,而可供支配的个人收入增加了62%。^①

但是,资本主义通常不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运行的。在温和和繁荣时期,更不必说经济活动真正迅速上升的时期了,企业和个人都担负日益增多的债务,以便各自扩张他们的资本和消费。事实上,经济上出现一般的繁荣,除了政府采取行动之外,正是由于借钱进行扩张和消费造成的。懂得了这一点,并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以长期的繁荣和短暂而温和的衰退为特征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预料到:私人债务或多或少地在稳定上升,不仅是在绝对数额上,而且与整个经济在物质方面的增长相比较来说也是如此。确实,我们并没有灰心丧气。表一提供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挑选的年份内私人债务总额、国民生产总值和债务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

^① 这些数字都摘自《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57年》,华盛顿,1960年版,第664页,第139页。

占的比重等方面的数字。

表一 私人债务(净额)

(单位: 10亿美元)

	私人债务总额	国民生产总值	债务在国民生产总值中 所占百分比
1946	153.4	208.5	73.6
1950	276.8	284.8	97.2
1955	392.2	398.0	98.5
1960	566.1	503.7	112.4
1965	870.4	684.9	127.1
1969	1,247.3	932.1	133.8

材料来源:《总统经济报告》,1970年2月;《商业现状》,1970年5月。

在我们进一步考虑公司债务和清偿能力的问题以前,注意一下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债务负担也许会是有用处的。在目前或最近将来的整个经济情况中,这也许不是一个重大的因素,但是趋势十分显著,而且无疑会是日后(如果不是出现得更早的话)出现严重麻烦的征兆。表二列出了这方面的主要资料,在沒有官方数字的地方,看来是用了偏于保守的估计数字。

我们可以把从表二得到的启示概述如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消费者偿还债务的付款总额增加了十五倍,而消费者的可支配的收入只增加了比四倍略少一点。换句话说,偿还债务的付款的增长比用以支付这些债务的收入的增长快了将近四倍。或者,再换句话说,平均起来说,在消费者除去各种捐税以外淨到手的每一块美元中,债务付款在1946年占6美分,而今天则占23美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相对债务增长过程的最高限度在那里,但是显然总得有一个限度:归

根到底,如果把收入的百分之百都用于债务付款,那么消费者就不再成其为消费者了。当达到这个极限的时候(不管这个极限在什么地方),传统上靠信贷购买的消费货物(包括住房)的市场也将达到极限,这就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停滞的影响。与此同时,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0年6月22日)的话来说,日益增加的债务“正在使愈来愈多的家庭受到破产的威胁……过高的债务正在吞没千千万万的家庭。”^①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

表二 消费债务付款

(单位: 10亿美元)

	1946	1950	1955	1960	1965	1969
(1)未付抵押债务 ^②	23.0	45.2	88.2	141.3	212.9	266.8
(2)未付消费信贷	8.4	21.5	38.8	56.0	90.3	122.5
(3)对第(1)项的利息和摊还 ^③	2.1	4.1	7.9	12.7	19.2	24.0
(4)对第(2)项的利息 ^④	0.5	1.3	2.3	4.5	9.0	14.7
(5)分期付款债务的偿还	6.8	18.4	33.6	46.1	70.0	94.6
(6)消费者偿还债务的付款总额 (3)+(4)+(5)	9.4	23.8	43.8	63.3	98.2	133.3
(7)可供支配的收入	160.0	206.9	275.3	350.0	473.2	629.6
(8)债务付款占可供支配的收入的百分比 (6)÷(7)	5.9%	11.8%	15.9%	18.1%	20.8%	21.2%

材料来源:《经济指标》,有关各期。

① 转引自劳工研究会,《经济札记》1970年7月。

② 一口到四口之家的住宅的抵押债务。

③ 假定利息+摊还款项=未付债务的9%。

④ 假定各年对消费者所索取的利率平均如下:1946年,1950年,1955年——6%;1960年——8%;1965年——10%;1969年——12%。

表三 清偿能力比率：非金融性公司

(单位：10亿美元)

年份	(1) 现金和 政府债券	(2) 短期负债	(3) 清偿能力比率 (1)÷(2)%
1946	38.1	51.9	73.4
1951	50.7	92.6	54.8
1956	53.9	130.5	41.3
1961 ^①	59.9	155.8	38.4
1966	64.7	254.4	25.4
1969	64.3	333.8	19.3

材料来源：1946—1966年：《总统经济报告》，1970年2月；1969年：《联邦储备公报》，1970年6月。

表三说明了为什么这句话的确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公司的处境。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不是用负债总额来和收入总额相比，而是以流动资产(现金和政府债券)为一方和以短期债务(在最近将来必须付清的债务)为另一方来进行相比：这就是所谓清偿能力比率。

这里，我们看到，战后非金融性公司的流动资产增加了约70%，而短期负债则迅速上升了540%，结果清偿能力比率从73.4%下降到19.3%。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所谓一般公司对付破产的安全幅度的真正引人注目的下降。打个比喻也许有助于阐明这一发展的意义：两个人各有在最近将来到期的100美元的负债。一个人有70美元以上的钱可以立即取用，所以只须再搞到30美元就肯定能如期付款。另一个人只有20美元可以立即取用，所以必须设法搞到80美元。在其他

① 1961年和以后各年的数字同以前各年不能严格相比。1961年以后的统计数字不包括投资公司，而且某些定义和分类法也改变了。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第二个人显然比第一个人更容易受到经济气候的任何变化的损害，这种变化可能会减少他的收入或他的重新借款的能力。战后所发生的变化，是一般的公司已经从第一个人的境况转到了第二个人的境况。为什么现在发生一次衰退比过去一、二十年的任何时候更可能触发一次破产的浪潮，原因就在这里。

表四 清偿能力比率：制造业的公司

(现金和政府债券对流动负债的百分比)

以资产大小 区分的各类公司 (百万美元)	清偿能力比率(%)	
	1947年 3月31日	1970年 3月31日
所有公司	88	21
0—1	71	31
1—5	66	24
5—100	82	22
100以上	113	19

材料来源：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美国所有制造业的工业财政季度报告丛刊》和《制造业公司季度财务报告》。

读者或许会提出异议，说如果有什么“一般的公司”的话，为数也是很少的，并且会问，上述的通则是否能同样适用于大公司和小公司。表四虽然只提到制造业的公司（而不是象表三指的是所有非金融性公司），却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清偿能力比率的下降，对最大的公司（资产超过1亿美元）最为显著，对最小的公司（资产低于100万美元）则最不显著。因此那些华尔街的风潮就一再发生了。

现在让我们从一般的历史情况转到目前的具体情况。在我们已经回顾了统计材料的背景下，7月5日《纽约时报》金融版以杰里·弗林特署名发表的下述报道就有极大的重要性：

“底特律，7月4日——狼再一次在克莱斯勒公司的大门口被赶走，这一次是银行家们出力赶走的。”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克莱斯勒的董事长林恩·汤森在这一周结束的时候感激地说。

“十天以来，这个汽车制造公司陷于困境，它在汽车和金融市场上能否生存下去的能力受到了怀疑。发生了一场恐慌。

“克莱斯勒业务情况的盛衰起落……是有定期的记录的，但是这个公司把最近这次危机归咎于宾夕法尼亚中央公司。当该公司的铁路子公司根据破产法进行改组的时候，这一事件促使投资人和债权人去寻找有没有其他在经济上也潜伏着麻烦的公司——他们发现了克莱斯勒。这个公司的情况如下：

“一是赔钱——第一季度亏了2900万美元。

“二是负债——从3月1日算起的一年内，对母公司应付67,300万美元；在短期商业票据方面，应付它的子公司克莱斯勒金融公司16亿美元。

“在6月23日，汤森先生试图制止一场恐慌。他说在第二季度将稍有盈余，并列举这个制造公司的现金和银行信贷承诺来证明它的处境并不象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那样，后者既无力支付它的开销和工资，也无力清偿商业票据。

“第二天开始了挤兑，但是只是对它的金融子公司的商业票据——借据——进行挤兑。这些30天到270天的期票是以汽车分期付款票据作担保的，克莱斯勒公司一天内就能将这些票据出售1亿美元来使它的金融业务得以照常进行。

“克莱斯勒金融公司也有 6 亿美元的银行信贷承诺,当它不能‘周转’它的商业票据——出售新的票据来清偿旧的票据时,就转而向银行求援,银行提供了数以亿计的美元。

“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既有能力也有决心对一个信用优良的借户承担起责任来。他们马上履行了他们的信贷承诺’,没有一个银行规避责任,汤森先生这样说。

“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克莱斯勒的高级负责人到了纽约,银行家们提供了 41,000 万美元的银行承诺,即在需要时进行贷款的信贷承诺。人们希望那将制止这场恐慌。

“克莱斯勒的官员和银行家说,克莱斯勒金融公司的商业票据是有可靠保证的。‘但是当你向一个银行开始挤兑的时候,总会在某一点上使银行失去清偿能力’,克莱斯勒金融公司的董事长戈登·阿林说。

“银行家们也需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克莱斯勒接着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也破产了,那就可能发生一场普遍的恐慌,从而耗尽银行的资力并使企业陷于破产。克莱斯勒的一位负责人这个星期一边说,一边列举着公司的资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将能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如果连我们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许多公司势必也将垮台’。”

这位没有公开姓名的负责人肯定并没有夸大其词。如果克莱斯勒果真破产了而不是只受到破产的威胁,那么谁也不会知道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将是多么广泛或多么迅速。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在 7 月 27 日的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最近同金融界领袖的谈话使我确信,我们的经济正处在经

济灾难的边缘，在过去的好些日子里，问题极为严重，我们好不容易才捱过来了。”（1970年7月28日《纽约时报》。）也没有任何理由假定，这种危险一定已经完全过去了。7月25日一期的《商业周刊》在论述铁路情况时这样说：

“在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宣告破产的时候，很多铁路公司是它的大债权人。虽然富勒姆法官批准在7月1日以后支付到期的铁路公司之间的款项，但在6月21日该公司宣告破产以前，它欠有些铁路公司的账高达250万美元。这些铁路公司能否收回这些欠款，以及何时能收回，都还不能确定。

“线路之间的付款是经常从一个铁路公司到另一个铁路公司往来流通的。保持这种帐款顺利流通，对铁路业的工作进行是必要的。如果甲铁路公司不能付清它的帐款，乙铁路公司可能也付不出钱来。如果占铁路业全部收入15%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暂时中止线路之间的付款，即使富有的铁路公司也会发生现金周转问题。

“铁路公司的经理们不知道是否能制止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麻烦的扩散。诺福克西部铁路公司的董事长约翰·菲什威克说，‘那怕再有一个或两个铁路公司破产，就会对其他铁路公司产生加倍的影响’。

“伊利诺中央铁路公司董事长艾伦·博依德指出，‘整个铁路业普遍都有清偿能力的问题。铁路公司都感到现金拮据，同其他人一样。’博依德补充说，他将‘大大感到惊奇，如果没有更多的铁路公司接着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进行改组的话’。”

美国经济今天面临的这种清偿能力危机或货币危机根本不是什么新现象。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提供了这种现象的最卓越的说明和诊断：

“这种危机，要在支付的不断连锁和人为结算制度已经完全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机构全面发生扰乱时，不管原因是什么，货币都必须立即地，突然地，由计算货币的观念，激变为坚硬的货币。世俗的商品不能再代替它。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没有价值了；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灭得无影无踪了。在繁荣中酣醉得什么事情都不懂得的市民们，曾把货币宣称为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是货币。但是现在，整个世界市场都在叫喊，只有货币是商品：象麻鹿叫着要新鲜的水喝一样，它的灵魂叫着要唯一的财富，货币。^①在危机中，商品和其价值形式(货币)的对立，尖锐化到了绝对矛盾的程度。在这里，货币的形态已无关重要。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一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饥荒都是一样的。”(《资本论》，第一卷，第120页—121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过去有人认为，货币危机是银行制度有缺点造成的。根据这种说法，只要有一个按照适当灵活的规则办事的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就可能把货币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或许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建立联邦储备制度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1929年的危机和以后的萧条证明了这种说法

^① 马克思在这里模拟圣经诗篇第24篇的语言：该篇有一句是“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像鹿切慕溪水”。

是谬误的：在深刻的经济不稳定局势面前，不管对银行进行多少改革，也不可能防止货币危机。所以在三十年代，注意力从货币危机问题转移到控制或减缓经济周期方面。这里包含着一个假定，即认为在那时以及在那以后的期间，货币危机仅仅是收入和就业剧烈下降的副产品。如果能够消除收入和就业的剧烈下降，那么实际上也就不存在货币危机的问题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虽然不是通过相同的推理途径，却取得了相当普遍的一致意见，即认为能够把经济波动保持在相当狭小的限度以内。^①合乎逻辑的结论是，除非货币和财政当局发生重大的管理上的失误，货币危机已成为过去的事了。所以当前的经济学著作几乎已经不提货币危机了，^②这是毫不奇怪的。

经济学家们一直忽视了以下这一点：每当资本主义“解决”一个矛盾时，它不可避免地又制造了另一个矛盾。所以，他们从来连想都没有想到过：伴随着控制经济周期的“成功”而来到的，不可避免地是清偿能力的长期下降，因此经济会愈来愈容易产生“老式的”货币危机。同时，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把他们前辈懂得很清楚的东西都忘了。那就是说，恐慌以及在正常情况下随恐慌而来的信贷紧缩，不仅仅是一再出现的灾难，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中起着最重要的治疗

① 在美国，两个主要的“学派”是“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如果对他们的分歧加以极大的简化，那末可以说，前者强调财政政策是主要控制工具，而后者则把货币政策放在首要地位。关于经济波动能够控制这一点，他们之间并没有分歧。

② 例如，在战后最出名的初级教科书、保罗·塞缪尔森的《经济学》（1961年第五版）一书里，只有两、三处偶然提到过去时代的“恐慌”。细读有关的几章，连暗示一下将来可能发生这类事情的地方都找不到。

作用。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信贷总是比实际生产和收入增长得更快，而且必然会是如此。这部分地是由于以下的事实所造成：物价正在上升，信贷是以货币价值而不以物质数量为根据的。但这也是，或许更重要地是，由于信贷在金融的上层建筑本身中的繁殖所造成的。当纸面价值上升的时候，这些纸面价值成为更多的借款和更多的开支的基础，这又进一步促使价值膨胀，如此等等。同这一过程交织在一起的是一种想入非非的期望，愈演愈烈的投机和彻头彻尾的欺骗。在过去，通常是处在基础地位的经济的下降使这一切归于结束的，接着是物价跌落和金融的上层建筑差不多是彻底的压缩。经过恐慌和萧条的灾害以后，真正价值和纸面价值之间的关系再一次被调整得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下一次回升的基础也就建立起来了。

“新经济学”的各种派别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消除或大大减缓经济下降会产生什么后果？现在，艰苦的经验终于提供了一个答案。信贷结构会继续膨胀到这种地步：那时处在基础地位的经济即使只发生相对温和的挫折也会震撼臃肿的金融上层建筑，威胁着要把它象一座纸牌造成的屋子那样搞垮下来。

这样的事在这一次或许不会发生。甚至还可能象在战前几次衰退中曾经出现的那样，公司的清偿能力比率将有暂时的微小的改善。^① 让我们假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情况

^① 完整的统计数字（表三曾从其中选出某些年份，以便清楚地显出趋势）表明，公司的清偿能力比率在1949年、1953年、1958年和1960年有微小的增加。

还确实会按照这样的进程发展。但这会使任何问题得到解决吗？危机将会消除吗？或仅仅是加以推迟呢？

回答似乎是明显的：无法逃脱这个制度使自己陷入的困境。就算现在逃避了一场危机，甚至回复到温和的繁荣，那末信贷和清偿能力的紧张情况也将变得更加厉害，更具有爆炸性。迟早(用历史的语言说，究竟是今年或几年以后发生，那倒关系不大)气泡总会破裂，危机总会临到我们头上的。

金融界和企业界中比较有远见的人士似乎知道这个道理，并相应地制定了计划。实际上只有两种可能的抉择。一种是听其自然(那是资本主义的自然)，顺着老式的恐慌和信贷压缩的方式让它发展下去。几乎可以肯定，结果将会发生一次大萧条规模的新的经济崩溃。显然(那怕只是对世界资本主义能否顶得住这场风暴有所怀疑)，美国统治阶级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另一种抉择是由国家出面进行抢救工作，这种抢救将使新政时代并不算小的努力相形见绌。现在已经很清楚，这就是打算要采取的路线。

当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很显然陷于严重困难的时候，尼克松政府第一个情不自禁的反应就要以可能有的最简单的方法来进行拯救，即通过国防部向宾夕法尼亚中央公司直接提供政府信贷。但是在政治上说，这种做法未免太露骨了，特别是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宾夕法尼亚中央公司的失败大部分是由于管理不善，或许还由于其他更坏的原因所造成。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赖特·帕特曼(他作为众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和美国公共生活中硕果仅存的几个老平民党人之一，是一个有权势的人物)成功地破坏了国防部的计划，到那时再要

想用其他办法来挽救这个公司使其免于破产，已经太晚了。接着华尔街发生了上面已经评述过的那种接近于恐慌的状态。看来老资格的金融界人士在那以后就聚首商议，并把参议员贾维茨也请了来。这位资深的纽约州参议员既是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大公司集团最忠实的支持人之一。由此产生了贾维茨7月2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的立法建议，而这很可能是长时期来最重要的立法建议之一。这里是《商业周刊》(8月1日)对这一发展的报导：

“手头现金拮据的公司可能会在联邦政府的财政部找到同情者，只要它们能够坚持那样久。

“国会中愈来愈多的人支持通过法案，对贷给短少现金、但有偿付能力的公司的贷款提供政府担保。甚至宾夕法尼亚中央公司（这个公司在国会拒绝了它的抢救申请以后在6月份进行了改组）这次大概都会得到一些帮助。

“注意力现在集中在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纽约州共和党人)提出的一个议案，建议赋予财政部暂时的权力，用以支持那些在其他方面稳固但在清偿能力的挤压下自己无法得到借款的公司。按照议案的规定，财政部将在明年建议是否需要成立一个常设的机构。

“国会的重要民主党人赞成这项计划。事实上，参、众两院银行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约翰·斯帕克曼（亚拉巴马州民主党人）和众议员赖特·帕特曼（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都愿意越过过渡阶段创立一个类似大萧条时代那个建设金融公司(RFC)的机构。本星期透露的帕特曼—斯帕克曼的

想法，是要设立一个全国开发银行，不仅对企业而且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发放和担保贷款。

“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将一事无成，但是初步的迹象表明白宫可能会同意这样做。”

贾维茨当然否认有任何抢救私人股票持有者和债券持有者的意图，并且伪装神圣地宣称，“如果用联邦政府的钱使信誉不好的企业免于破产，或以公共的方式代替私人的方式对信用的可靠性进行试验，或使人得到联邦政府将抢救管理不善或进行投机的企业的印象，那都是灾难性的错误。”但是我们都知道，通入地狱的道路是用什么铺成的。许多经验表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一旦开始进行这一类的抢救行动，它就必定会发现，想要规定一个合理的范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些人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发表这样的异端意见，认为一个信誉良好、管理健全的破产的公司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点自相矛盾）。《纽约时报》（在上面引述的社论中）对进行抢救工作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并在最后说：“美国一定不能在维持私有企业经济的借口下滑进效率极低的集体主义形式。”我们认为《纽约时报》的提法比较接近问题的实质。

上面提到的集体主义当然是指阶级国家的集体主义；至于这种集体主义是否或多或少会比我们现有的效率差一些，那得取决于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效率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但是不管怎样，除了在另一次大萧条面前无所作为以外，还很难知道美国统治阶级能采取什么别的办法来对付信贷和清偿能力问题。

并不是说政府的抢救行动（这种行动当然是用所有纳税人的钱支付的）能真正解决任何问题。现在避开了金融恐慌的危险，又会替将来某个时候更大的金融恐慌打下基础。事实是，只要“繁荣”建立在通货膨胀和投机交织在一起的基础之上，公司（和个人的）债务将不可避免地堆积得愈来愈高。政府可能，也大概会在泥潭中愈陷愈深，怎么也找不到出路。

作为上面论述的一种注释，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资本主义世界曾经进行过的最早（或许也是最广泛）的抢救私人资本的演习之一——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里进行的演习——也许会是有用的。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开始这样做了。据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权威作者说：

“基本思想是极容易了解的。在利润丰盛的时候，这些利润归于私人金融小集团，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适当报酬；在有重大亏损的时候，这些亏损就由纳税人分担，作为团体精神的一种表现。”^①

在以后整个时期里，在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下，都极为坚定地维持这一行动方针。最后，在大萧条袭击意大利的时候，实际上整个经济即将面临破产。墨索里尼政府善于应付难局，到处进行抢救和接收。到三十年代中期，一个名叫工业建设协会的国家机构，拥有意大利的三个最大的商业银行，并拥有其雇用工人在各有关工业中占下述百分比的

^① 欧内斯托·罗西，“意大利的国有化”，载马里奥·艾因瑞迪，莫里斯·拜伊和欧内斯托·罗西，《法国和意大利的国有化》，伊萨卡，1955年版，第194页。

诸公司:

表 五

机械	13.3%
钢铁	48.6
航运	48.6
公用事业和广播	38.0
电话	70.0
银行	30.0

材料来源：前书第 205 页。

据同一权威作者说，到法西斯政权结束时，通过工业建设协会和其他各种政府机构，意大利银行业的 87% 已经国有化了。

天真无知的人们也许会叫喊，这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啊！的确，据说许多站在反对地位的政客就曾发出过这种咒骂和指责。但是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并没有畏缩或后退。相反，它同德国资产阶级一样，进而把“社会主义”用来为它们自己服务。那些试图从美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看一下将来可能会有什么后果的人们，最好还是仔细考虑考虑下面这一段话：

“在 1937 年，给了工业建设协会一个新的、更永久的合法机构。工业建设协会不仅将继续管理它已经拥有的资产，并且还被授予对‘以解决国防问题，或以达到全国经济自给，或以埃塞俄比亚的工农业开发为主要目标的工业企业’进行新的投资。工业建设协会变成法西斯政权的一个主要经济助手。它从一个仅仅用来挽救银行制度的手段，变成推进法西斯国家工业政策的工具。‘国有化’是 1933 年在时势的压力下发生的，当时很少考虑到将来的问题。以后它就继续被作

为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在愈来愈广泛的领域内实施起来了。在 1938 年以后,清理工业建设协会资产的政策逐渐地停顿下来。工业建设协会慢慢地进而对那些被法西斯的自给自足政策所发展工业领域(如人造纤维,人造橡胶,化学品)进行投资,并扩大那些专门从事军事生产的工业的生产能力。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事件才中止了法西斯独裁政权的这些计划。”(同前书,第 200 页。)

美国霸权的终结

1971年10月

尼克松的新的经济政策标志着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一点才是它的真正意义所在,而不在于这项政策开始采取或想要采取的具体行动。

战后第一个阶段是美国霸权的阶段,这一阶段是以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为象征,并在相当程度内依靠这种制度来完成的;按照这个制度,美元和黄金一起被规定为所有会员国的货币储备。尼克松正式放弃美元兑换黄金的规定永远结束了这一阶段。

部分地出于阴谋,部分地出于偶然,布雷顿森林制度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美国称霸帝国主义世界的金融骨架——它是为反革命战争、海外盟国、跨越全球的军事基地、美国工业和银行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渗透提供资金的机构。外汇率是为了支持和加强冷战中的盟国而制订的,有些汇率或多或少是由美国的委员会或在美国影响下专断地加以确定的。政治和军事同盟是与金融同盟紧密地相互关联着的。美国承担着战后帝国主义体系主要的军事和财政负担,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以或多或少的热忱进行合作,那是因为同盟系统加上美国的军事力量,有助于稳定资本主义和促进一场新的经济繁荣。同时,从这些国家的观点看来,为了把

新独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保持在帝国主义贸易和金融体系中,这种合作是必要的。

但是这样一种安排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紧张关系,而且近年来这种紧张关系已达到危险的程度。归根到底,这些紧张关系有两个来源:(1)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以最大的努力来保护自己的资产阶级利益。(2)来自对美国金融自由的限制,因为最后只有牺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才能得到这种自由。因此,虽然我们认为尼克松的讲演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国际金融体系的动荡不安很多年来一直在加深,愈来愈接近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到达这一点就会开始发生连锁反应。

战后金融体系的团结一致一旦破裂了,那就有理由相信,政治和军事同盟的团结一致也将受到动摇。这并不是说帝国主义制度的本质改变了,但可能的的确确意味着,它的结构的重要特征比过去更容易起变化。在整个战后时期,向心力和离心力:那些要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拉在一起置于美国霸权之下的力量和那些要使这个制度分裂的竞争力量,都同时起作用。到现在为止,向心力更强大一点。从今以后,离心力大概将占支配地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到后来会愈厉害。

要说明现在确定已开始的新阶段的特征,现在还还为时过早,但是似乎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确立明显的霸权地位。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正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将寻求各种同盟和联合,有时成功有时不能成功,有时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有时则可维持较长的时期。

在国内，新的经济政策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这结束了那种幻想单独用货币政策或者兼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就能够稳定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也是一项新的办法的开始，那就是美国将试图牺牲外国人和美国工人的利益来“解决”国内问题。当然，新的经济政策的国际和国内方面是错综复杂地相互关连的。

我们目前讨论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真正转折点方面有一个最明显的征兆，那就是尼克松 8 月 15 日讲演中的提法同过去二十五年美国统治阶级的战略和言词相比，都有明显的背离。在过去整整二十五年间，美国总是竭力赞成合作、国际主义、更自由的贸易、互相援助等等。但是尼克松现在却以顽固的民族自利的语言说话。竞争取代了合作而成为伟大的美德。新的经济政策本身就是直率地拒绝谈判，而主张可以单方面宣布一项既成事实——没有事先警告或甚至没有事先通知，就放弃了美国自己在相对力量最大的时候所创立起来的全部货币和贸易制度。这种办事方式是确定无疑的征象，说明美国已经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因为，要是尼克松觉得美国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的话，他无疑地宁愿通过类似建立国际货币基金、贸易及关税总协定时那样的谈判过程，把华盛顿所计划的新制度强加于人。与此同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自相矛盾的，看来美国统治阶级还是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它居然能够摈弃它的发言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大谈特谈的那一切国际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好听空话，而一头栽到古老、美好的民族沙文主义怀抱里去。一家著名的金融顾问公司负责人皮埃尔·林弗雷特在 8 月 30 日《纽约时报》上写的一篇文章代表

了对尼克松讲演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看来在经济和政治权势集团的上层还是比较普遍的：

“我赞扬这个计划。我支持这个计划。我为这个计划鼓掌。我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感到快乐和得意。我对我国有这样一个人有勇气、毅力和力量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总统而感到自豪……”

“这是马歇尔计划自由主义的结束和尼克松—康纳利实用主义的开始。在过去二十五年，美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谈判中遵循了一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政策。不管我们给什么，他们总是要了又要。他们伸手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弄得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出了大纰漏。这一切都算过去了。我们终于认识到，并且依照这个信念来行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体，我们有经济力量……”

“我们在国际贸易和货币方面采取行动的真正目标是日本，而不是欧洲人。由于我们在经济和货币方面从日本人那里所得到的单方面的、不平衡的、不公正的和不合理的待遇，美国的忍耐已到极限了。对他们巴结奉承的日子已经过去。从今以后，日本人必须多给一些，少拿一些，否则就会受到更多的反击。”

在尼克松讲演后的第二天，纽约股票市场以空前的幅度陡直上升，这一事实似乎也反映了全国的快乐情绪。热切的股票购买者似乎在说，总统终于采取了一些行动；但最重要的是，他对外国人采取了行动，而外国人在美国的民间传说中——或许正象在所有民族社会的民间传说中一样——被认为

是国家灾难的真正来源。

从表面上看，尼克松行动的直接后果好象证明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已告结束这个论题是错误的。尼克松的强硬措施不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吗？即使日本人也不得不对这种压力低头而让日元浮动。对进口货征 10% 的附加税难道不是给了华盛顿在未来的任何谈判中以巨大的讨价还价力量吗？^① 的确，在美国官方人士中，美国具有优越力量的想法远远没有消失。在 8 月 23 日《纽约时报》发自华盛顿的一个题为《国外在埋怨》的新闻分析中，小埃德温·戴尔报道如下：

“现在完全清楚了，尽管人们谈论着美元‘软弱’了，美国一举而向全世界表明，它仍旧是多么强大。由于割断了美元和黄金的联系并征收 10% 的进口附加税，美国已经证明了究竟谁是古利弗，谁是小人国的小人。

“‘小人们’显然对此不会欢迎。但是一点也看得出来他们有什么能使美国受到任何重大的损害的对付办法。

“但是‘小人们’——本来是指斯威夫特的《古利弗游记》里的矮人——在这里并不是指尼加拉瓜或加蓬这样的国家，而是指西德、日本、英国和其他主要工业国。”

^① 事实证明，对应征税的进口货加征 10% 附加税并不是尼克松这批计划中的唯一保护措施。他在演说中所作的一个暗示以后得到了证实，那就是，对于投资减税 10% 的规定只适用于在美国生产的资本货物。因为美国大公司的纳税税率范围在 50% 左右，这就意味着，出售资本货物的外国厂商同美国竞争者相比，在价格方面要吃亏 20%。除此以外，还必须把美元贬值的影响考虑进去。这是十足的保护主义！

对形势的这种估计看来可能反映华盛顿政策制订人的看法；如果是这样，那末我们可以断定，尼克松政府是根据美国霸权还远远没有成为过去这样一个理论来办事的。按照这种思想方法，问题不是美国已经失去了霸权，而是美国很不愿意到处施加压力和影响。或者，以尼克松 8 月 15 日讲演中所引用的比喻来说明：“美国不再有任何必要把一只手捆在自己背后来进行竞争。”看来其含义是很清楚的，如果两只手都伸到前面，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究竟谁是老大了。皮埃尔·林弗雷在前面引用的文章（8 月 30 日《纽约时报》）里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报道说，“在总统发表讲演的那个晚上，这个国家的一个最有权势的人物就对我说，‘我们是聪明的，我们有竞争能力，我们是老大。我们坐在司机的座位上，他妈的，这个位子本来就该我们坐的嘛！’”

然而，在我们接受这种简单化的看法以前，我们应该更仔细地审视一下现实。在宣布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很短的时期内，美元定值过高就已经成为老提法了，其清楚的含义是：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这个问题能够通过美元对其他先进国家通货进行适当贬值的办法来解决。据说美元贬值将会刺激出口，妨碍进口，由此产生的贸易平衡的改善将导致国际收支逆差的逐步消除。当这一过程进行到适当的时候，就应该有可能进行谈判以达成一项新的国际货币安排，各种通货就将在新的（并且也是“正确的”）平价上发生联系，美元将再一次稳定下来，并重新起着储备通货的作用，到那时，可能还会同马克、日元、特别提款权等等一起共同起这项作用。黄金在新的安排中占什么地位的问题，或许还没有考虑好，但是当尼克松

宣布中止美元兌換黄金的时候，美国仍拥有约 100 亿美元的黄金储备。这一事实无疑地表明，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决沒有把黄金的货币前途一笔勾销。按照这种分析，问题的实质是贸易不平衡，主要的补救办法是重新调整汇率。

但是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促成危机的美元软弱是由贸易逆差产生的吗？不是。贸易逆差是最近的现象。不管怎么说，对于象美国这样的债权国（就是说，从对外投资有巨额净收入的国家）来讲，发生长期的贸易逆差是很正常的，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五十年内英国的情况那样。（否则，债务国怎样能够支付必要的付款呢？）另一方面，国际收支逆差则可追溯到二十多年以前，而造成麻烦的正是国际收支逆差。换句话说，国际收支逆差事实上根本不是贸易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即使到现在，也只是一小部分国际收支逆差可以归咎于贸易逆差。我们可以说，国际收支逆差一直是美国在国外的政治—军事活动（支撑仆从国的政府，维持美国基地和军队，资助傀儡军，进行热战，等等）造成的，这种说法虽然有点过于简单化，但是仍沒有歪曲问题的本质。这些政治—军事活动所倾注出去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最后落到一些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手里，它们沒有意图用这些钱来购买美国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从它们的职能的性质来看，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①

^①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了解，为什么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或中央银行不能简单地用多余的几十亿美元从美国买进东西来分配给穷国的人民。很明显，这种做法会使国内市场萧条，破坏资本家阶级获利的机会，而政府和中央银行当然都是资本家阶级的工具。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拥有多余的几十亿美元，它就很容易把这些钱用于对社会有益的方面。在这里，和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追求利润这一过程的必要和矛盾。

问题是这些接受多余美元的外国人用这些钱来做什么。要详细地回答这问题,将会涉及到一些极端复杂的事情,而有些事情只有少数金融专家和金融人员才懂得。然而,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问题不是试图解释这些技术细节,而是要在避免陷入技术细节的同时,阐明其中的基本力量和关系。

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的建立,本来可以为这些多余的美元——至少是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提供一个使用的途径。各国在相互交往时,经常买进和卖出货物,并进行其他各种国际交易(如运费、保险费、借款、归还过去的债务等等)。如果每一个国家的支出常常和收入相等,就不再需要汇划款项,记帐就能解决问题了。但是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每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不是支出超过收入,就是收入超过支出,只有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才有望达到大致的平衡。与此同时,必须转划互相接受的支付手段,以便保持这一制度的顺利运行。为了这个目的,所有国家都必须保持这种支付手段的储备;显然,随着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的增长,所需的储备的总额也将增加。因此,一个完善的国际货币制度必须能够满足两个基本需要:它必须规定可以作为储备的互相接受的支付手段;它必须提供一种途径,使各国所需的储备总额能够随着需要的增加而扩大。

布雷顿森林制度是怎样满足这两项需要的呢?首先,确定黄金和美元(两者可按 35 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的比价互相交换)为共同接受的作储备用的支付手段^①。至于第二项需要,

^① 英镑也曾被赋予储备的地位,以后,又把在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也作为储备货币的一种形式加了进去。然而,从我们目前的观点看,这些不是重要的因素。

布雷顿森林制度并没有作任何具体规定；在当时的许多评论家看来，整个制度不合理地依赖于世界的货币，黄金储备可能发生的变化。然而，后来事实证明，情况并不是这样。美国一方面出现连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但另一方面却能够向世界其余部分不断提供美元（美元同黄金一样地被接受为储备货币）。^①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始终是布雷顿森林制度所暗示的，但是在参加创建这制度的会议的人中间，只有极少数人理解到这一点）似乎运用得很令人满意。例如，在六十年代，世界货币储备每年平均增加 20 亿美元，其中只有 10% 是黄金，其余大部分储备美元都是由持续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提供的^②。储备的这种增加经证明是足以支持国际贸易的巨大增长的。

但是，对于多余美元的这种利用显然并不是无止境的。从 1970 年开始，美元的外流量大大超过世界对美元作为货币储备的需要。在 1970 年一年里，世界货币储备总额增加了不下于 141 亿美元，几乎全部是由巨额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所倾注出来的美元提供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知道，一旦美元外流超过了某个严重的水平，它就打开了促使外流速度继续增加的活门。）使尼克松感到头疼的是，国际货币投机者这时就要插手进来了。但是比投机活动还重要得多的是，巨大的多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更详细的说明，以及对于美国从这种安排得到什么好处的分析，可参考哈里·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第 80—95 页和第 101—110 页。

^② 这些数字，以及下面引用的 1970 年的数字，摘自罗伯特·特里芬，《1970 年和以后的国际储备》，载《摩根保证概览》，1971 年 2 月，第 8 页。

国公司的财务人员(他们负责掌管数以十亿计的美元)是否审慎行事;他们的动机与投机者不一样,但其后果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①

按照布雷顿森林制度的理论,应该有一个可以防止美元过度外流的制动装置。这就是美元按 35 美元等于一盎司的法定价格兑换黄金的规定。如果外国中央银行收进的美元比它所需要的美元多,它照理是可以向美国兑换黄金的,而黄金的减少则迟早会促使美国采取通货紧缩政策,以制止黄金外流。然而,事实上这个制动装置根本不起作用。外国人拥有的美元总额在很久以前就多于美国黄金储备,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把美元兑换成黄金,那么结果只会造成中止兑换黄金的规定。而且,要说美国经济政策会受到黄金储备因素的支配,那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情。最后,只要美国的全球军事政策仍然象过去那样,美元外流不管怎样都会继续下去。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布雷顿森林制度愈来愈象一座纸牌搭成的房子,只是因为没有人想搬进去住,这座房子才能照老样存在了下来。

现在让我们回到怎样处理多余美元总额日益增长的问题上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通常的回答是把这些美元贷出并收取利息。这就是近年来规模增长得很大的欧洲美元市场的来源。国际金融制度的矛盾(也是复杂性)之一是,当各中央银行照着这样去做的时候,结果是通过创造信用美元余额更多起来了,反而使基本问题恶化了。最后,事情愈来愈清楚,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说明,可参考查尔斯·斯特布勒,《多国公司怎样在货币交易中保护自己》,载 1971 年 8 月 20 日《华尔街日报》。

由于美元总额不断增加，对付多余美元的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设法摆脱它们，那就是说，把它们换成不象美元那样有麻烦的其他通货。到了这样的阶段，美元和其他工业国家的通货之间的供求关系就改变了，布雷顿森林制度所规定的固定平价的概念也就站不住了。随着愈来愈多的美元被弄到市场上去交换马克、日元等等，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要么这些通货的价格上升（因而美元的价格下降），要么有关的中央银行就得额外创造足够的马克、日元等等，以便同涌到外汇市场的日益增加的美元供应相对等。后一种办法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被采用，而且的确也已经被采用了，但是不能永远这样采用下去。迟早必须放弃旧的平价，并让各种通货在供求的大海浮动。几年来，日益频繁的货币“危机”已经预示这种情况即将来临，在今年5月的一次货币“危机”以后，危机已逐渐变成正常的事态，而不是例外了。尼克松8月15日讲演所做的事，仅仅是公开宣告把戏已告结束。布雷顿森林制度在经历了二十三年之后已经死亡了。

下一步怎么办？据说尼克松的目标是打算使美元贬值15%左右，他显然相信，要是这样做了问题就会得到解决。然而，我们还没看到作出分析来支持这种看法的任何尝试；从表面来判断，这种看法似乎是很不合理的。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贬值的有益效果是从它对贸易平衡的影响而来的；由于美元的价格下降了，出口受到刺激，进口受到阻碍。然而，这不是一个晚上就能完成的过程，看来即使最乐观的预测，它也还距离产生预期结果所要求的条件很远。今年第二季度，贸易逆差达年率42亿美元，而国际收支逆差总额年率则不下于230

亿美元^①。如果我们假定贸易逆差能够在今年年底消除（这看来是不大可能的），国际收支大概仍会有巨大的差额。（在这里，我们必须记得，美元贬值将使支付海外军事设施费用所需的美元数额增加，这至少将部分地抵销在贸易方面可能得到的利益。）即使我们作出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现实的假设，即贸易逆差很快能转为顺差，并且，譬如说，贸易顺差能扩大到在越南战争带来的下降以前于1965年达到的50亿美元的水平，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国际收支平衡会得到控制。

这里，我们必须暂时离开本题，把注意力转到过去几星期的讨论和争辩中基本上被忽略了的一个问题。在美国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多国公司给决定贸易平衡的问题带来了比较新的因素，它可能会使贸易平衡对美元和其他通货之间的汇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大为减低。许多过去曾进行大量出口的公司，现在都在外国生产他们在外国出售的大部或全部产品；许多公司甚至在国外（在外国的子公司）制造产品或产品构件，再把它们进口到美国在国内市场上出售。虽然现在没有可靠的数量方面的估计，可是没有理由怀疑，这样一种特殊关系会对贸易平衡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同时阻碍运用汇率来改进贸易平衡的努力。

我们的结论是，不管人们对所谓尼克松的决定性行动怎样大吹大擂，美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前景充其量是非常不确定

^① 这个季度的数字按“清偿能力净额”（234亿美元）和按“官方储备交易额”（231亿美元）的方法计算，实际上都一样。

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非常黯淡的^①。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位据说是尼克松“新的经济政策”的主要设计人财政部长康纳利,之所以一直对美国的“自由世界”盟国表达了远远超过仅仅是重新调整通货的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在5月28日对美国银行家协会慕尼黑会议发表的演说(由于有后见之明,我们现在才知道,这篇演说具有比当时看来大得多的重要性)中,康纳利说道:

“通货膨胀助长了我们国际收支逆差的长期化。但它远远不是唯一的因素。

“具体地说,现在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将近9%用于防务——其中将近50亿美元用于海外,大部分用在西欧和日本。为军事防御提供资金是当领导的国家的一部分负担;当领导的国家不能也不应放弃责任。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五年以后,一些正当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从这种防御得到好处的自由世界盟国之间应该如何来分摊这些责任的费用。西欧国家和日本再次强大起来了,它们作出贡献的能力已大大增加。

“年复一年,我们在海外军事开支净额超过了外国在美国

^① 人们有时遇到这样的说法,在自由浮动通货的国际制度下,不存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种说法与其说是非常错误,不如说是很易引起误解。必须知道,在固定平价制度下表现为国际收支逆差和顺差的力量,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又以货币贬值和增值的形式出现。在理论上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始终能够通过美元对其他货币进行充分贬值的办法来消除。但是美国(在这方面,其他工业国也一样)不可能让它的货币的价值继续不断地下降。不论问题是以日益增长的国际收支逆差的形式出现,还是以美元价值不断下降的形式出现,补救的政策都是类似的。

购买军用物资的货款，比大家如此关心的持久的根本性的国际收支逆差还要大，我觉得这一事实既是印象深刻的，也是令人沮丧的。

“贸易安排方面是第二个早就该采取行动的领域。那种轻轻松松地认为美国应该（从自由世界更广泛的政治利益着想）乐意不成比例地承担经济费用的假设，不符合今天的事实。

“关于一个自信的、团结的共同市场，一个强大的日本和一个进步的加拿大对自由世界大家庭的和平与繁荣的价值，我是一点也不怀疑的。

“问题只是（但‘只是’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既然这些国家现在已拥有极其充足的储备和生产力，是否应该要求它们采取新的主动行动对其他国家的产品开放它们的市场。”（6月14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第52—53页。）

康纳利似乎在说，美国期望西欧国家、日本和加拿大不仅要把它们的货币升值，而且还得减轻美国自愿当世界警察所承担的大部分负担，并改变它们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使这些政策不照顾它们自己的资本家，相反地倒是得照顾他们最危险的对手，美国资本家。

这样的要求在二十五年前或许是现实的，那时其他国家都需要美国的帮助，因为这种帮助对它们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可是现在它们干嘛还要屈服呢？现在情况已经改变，现在是美国需要它们的帮助了。难道尼克松政府不正是在霸权的客观基础已经消失的时候还在用霸权的语言讲

话吗？

如果事实证明，美国的霸权不能恢复，另一个抉择办法是什么呢？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具体的预言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于事态可能发展的一般方向，倒也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例如，《商业周刊》在评论了所谓“由于美国把美元定值太高而引起的广泛的愤怒”以后，接着说：

“的确，在整个国际货币制度里，愤激的情绪是很高的。在六十年代晚期使这个制度渡过一个又一个危机的合作精神，现在是大大地被挫伤了。〔这种‘合作精神’基本上是‘接受美国霸权’的一种委婉的说法。〕现在这种混乱局面继续得愈久，这样的危险就愈大：各国只管自己干自己的——设置更多的控制资本的办法和更多的贸易障碍。一位瑞士经济学者说，‘我最担忧的是，谁也不采取任何行动。如果这样，我们就会进入普遍的听任自然的流动，而那将是完全混乱的局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整个局势中最有希望的因素，是中央银行家们还记得三十年代，这时货币方面的合作瓦解了，世界进入了普遍的听任自然的流动，存在着完全混乱的局面。现在任何国家的政府官员都不希望这种事再次发生。”（8月21日《商业周刊》，第27页。）

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这很可能是确实的。但是，政府官员的希望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生产和金融存在着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下可能发生什么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伦敦《金融时报》在8月23日警告说，“如果在货币方面

存在长期的僵局，那末，发生贸易战的危险就一天比一天更大。现在差不多又过了一个月，货币方面的僵局没有一点减缓的迹象，这个警告的分量也就愈来愈大了。

现在转到尼克松的“新的经济政策”的国内方面，我们的讨论可以简单得多。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理查德·尼克松在经济方面是怎样完成一连串的冒险旅行的。他开始以一个自由市场的伟大辩护士出现，吞下了弗里德曼的全部货币谬论，这套谬论被认为提供了一种解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双重问题的没有痛苦的办法。当这套办法不灵的时候，尼克松又突然宣称自己是凯恩斯学派，衷心赞成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拯救。而当这种办法（或者还不如说，这种办法加上继续不停的货币扩张）产生了更多的通货膨胀和更多的失业（这两种现象被认为是矛盾的现象，可偏偏令人不愉快地结合在一起）时，他又突然作为对工资和物价进行直接管制的首倡者出现，而他自己曾一度咒骂过这种管制的。作为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的表演来看，恐怕还很难找到比这更好的名家表演了。（同时还必须承认，在这个领域里，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虽是不逗人爱的品格，但比顽固地坚持过时的教条要好得多了。声名狼藉的经济学者无论是弗里德曼派还是凯恩斯派，都绝对没有理由采取“我比你更神圣”的态度：他们对垄断资本主义真正运行的方法并不比尼克松了解得更多，他们在为自己的无知辩护方面倒是有更大的既得利益。）

对于物价和工资的九十天冻结能不能成功呢？在冻结期间减缓上升的速度这一严格的狭隘的意义上说，它无疑是会成功的。但是这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因为美国经济的问题

并不是九十天的问题。问题是冻结期以后怎么办？

即使在宣布冻结以后一个月，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尼克松政府仍然还没有确定的计划。但是，显然它已经抓住了老虎的尾巴，不会简单地把老虎放走。它必须设法制定并执行某种继续控制收入的政策。但是，过去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其他国家的也好美国的也好，都并不令人鼓舞。9月1日《金融时报》保罗·刘易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

“这里常有这样的论调，政府既然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有效的物价和工资冻结，何况那时政府还有大群的官僚来做这项工作，爱国主义情绪也很高；那末，在今天美国分裂和忿懑的气氛下，当政府保证要减少、而不是增加文职官员的时候，就很少有可能这样做了。”

对这种论调当然是没有解答的，而且据我们所知，甚至没有人试图编造一个解答。尼克松进退两难的困境，是典型地属于“你这样做也该死、不这样做也该死”的那一种。如果没有一个象战时的物价管理局那样的新机构，不管尼克松采取什么样的控制收入的政策，无疑都会遭到失败。^①可是有了新的物价管理局，它又会变为官僚主义式的可怕的东西和贪

^① 没有人比尼克松自己更清楚地指出了之所以会这样的原因。这里是8月23日《纽约时报》社论对面一页上伦纳德·西尔克写的一篇文章的开头一段：“在就任总统以后不久，尼克松说：‘我要强调，我们相信能够控制通货膨胀，同时不使失业有所增加，当然是指不致有巨大的增加。’他接着说，他不会用劝请工会领袖和企业家限制他们关于工资和物价的决定的办法，来完成这个业绩，因为‘尽管这些人可能自己都很愿意做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但他们必须以他们所代表的组织的利益为依归。’”有哪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比这更简洁或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呢？

污诈骗的无底洞，同样也会以彻底失败告终。

实际上大概会发生的是，这一整套安排将相当快地变为根据所宣布的生产率标准对工资进行强制管理的机构（因为工资管理比物价控制在监督和实施方面都要容易得多）。长期以来，这就是美国资产阶级真正渴望的东西，而且可以预期，在冻结期结束时所产生的危机空气，将提供一个把这种愿望变为现实的绝好机会。

然而，不应有丝毫误解，这对美国资本主义来说是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把收入分配的整个问题（现在假定收入分配是由永恒的不可逃避的经济法则所决定的）提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来。很难理解，这怎样会不重新开始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工人阶级将在比以往大得多的程度上参加政治，愈来愈多地把阶级斗争从严格的经济领域（谈判桌和纠察线）转到政治领域，而在政治领域里，武器和策略，以及长期的战略和目标，必然是很不一样的。

尼克松的国内一揽子计划的其余部分，包括对更多的投资提供征税方面的刺激（正当现有设备能力的25%或更多一点闲置不用的时候），依赖增加汽车产量作为经济恢复的主要支柱（正当每个中学生都知道美国需要的是更少而不是更多的汽车），减少政府的开支和人员（正当各种必需的公共事业都缺乏资源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各种反动、反社会措施的杂烩，这些措施之所以被采用，全凭它们在短期反应和点滴效果方面能起一点作用。然而，事实上根本没有多大理由期望它们对整个经济会产生任何较大的刺激作用。

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全部“新的经济政策”——

国外和国内部分——基本上同今天美国社会的真正毛病所在都没有关系：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疯狂地扩张，以及在国内愈来愈不能满足人民在和平、工作、吃和住、以及人类尊严方面的基本需要。所以，尼克松的“新的经济政策”所预示的，并不是他所乐于空谈的和平与繁荣的时期，而是空前激烈的帝国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更多、更深的危机的时期。

帝国主义时代：金融体系

1969年

美元成了世界货币：纽约成了世界财东

如果记忆不错的话，记得已故的能彼得教授曾说过，货币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本营。就这个意义来说，美国据有资本主义世界领导地位毫无疑问是与以下两个事实相吻合的：纽约成了国际金融业的无可争议的中心；美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货币。

国际货币市场的中心以前是在“伦敦商业区”——伦敦的一块一平方哩的地方，英格兰银行、黄金市场、国际保险业市场，各种主要商品交易所以及各大银行的总管理处都设在那里。这个中心的支柱是：海上霸权、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以及国际贸易的统治地位。至今还有某些英国人想入非非地在谈论恢复英国古老的光荣。针对这种怪论，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 T. 巴拉夫博士提醒大家：

“伦敦之所以成为国际经济的中心是基于英国作为一个有属地的强国所享有的商业权威，作为首先倡导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的工业领导地位。正是这双重的权威地位使伦敦成为短期和长期金融的世界中心，并从而获得更多的积累。金本位制度成了获利源泉之一，并对维持英国国际收支平衡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①

甚至在英国已下降为二等强国之后，英国通过以上进程所取得的金融优势都还对英国有所帮助。英格兰银行的总裁库默勋爵于1966年用以下的话证实了这一点：

“我想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依赖我们的无形收入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依赖我们海外投资的收入，就象整个世纪以来都那样似的。数字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我们的海外投资既是我们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财政支柱，又为我们提供了今天所迫切需要的外汇，而海外投资的起源，当然是我们的历史所造成的。”^②

尽管美国拥有压倒他人的生产实力，它也还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突破英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优先地位。意味深长的是，实现这一点的机会往往总是和战争有关联的。起初是英布战争：

“由于英布战争使英国在财政上、经济上负担很重，好几个国家，其中也有英国自己，都开始转向美国银行家们借款。不过，1902年英布战争结束，而美国自己又面临1903年的金融恐慌，这个趋势被中断了，而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这个尚未成熟的想法也告吹了。”^③

① T. 巴拉夫：《不平等的伙伴》，英国牛津，1963年，第2卷，第25页。

② 库默勋爵在“行会大厅”的讲话，载英格兰银行《季度公报》，1966年3月号，第51—52页。

③ T. M. 法利，《“埃奇法案”与美国的国际银行和金融》，纽约，布朗兄弟和哈里曼公司，1962年5月，第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财政压力把转移金融中心的大门开得太多了。协约国起初是需要资金进行军备竞赛，之后则为了进行战争本身，而大多数资金都是从纽约搞来的。T.W.拉蒙特，摩根公司的最干练的成员之一，就曾仔细地评述了造成欧洲权力转移到美国的基本因素。他在1915年7月号《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刊》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战争第一个年头所带来的变化中的某些因素，说它们可能日趋重要，但取决于战争究竟将打多久。这些因素是：(1)“我们许多从事于买卖与战争有关物资的制造商和商号都一直生意兴隆”；(2)与战争有关的买卖的增长有助于出现“巨大的贸易顺差”；(3)由于贸易的巨额顺差使我们得以买回外国投资者手里的美国证券；(4)买回这些证券则有助于消除外汇枯竭的现象，因为过去这些外汇是一直被用来付给外国人利息和红利的；(5)结果美国的地位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使美国能够大规模地贷款给外国，从而成为利息、红利的主要领受者，而不是付出者了。^①尽管所有这些情况都朝着转移金融中心的方向推进，拉蒙特还是十分清醒地预测，这种变化并不是一夜功夫就能实现的：

“看来许多人都深信纽约将取代伦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要成为金融中心，我们当然必须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肯定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是不是有较大的可能性呢？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不过我的想法是：虽然战后美国肯定在金融方面

^① T.W.拉蒙特：《战争对美国金融地位的影响》，载《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刊》，1915年7月号，第106—112页。

会要比以前重要得多，但美国还得花许多年功夫才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尽管它的资源、干劲和各种成就都是了不起的。金融中心的转移不可能很快地实现。因为，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我们当然必须先成为世界贸易中心，然后才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而直到现在，在英国和欧洲以外的地区我们的出口贸易数额还相当少哩。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制造商、商号开拓并建立新的市场，而这项工作是费时间的。”^①

拉蒙特的冷静而又深思熟虑的分析能力并没有干扰他更加宏伟的憧憬，这种憧憬是以深信金融资本会不断向前迈进为基础的：

“等到战争的可怕的、血红色的迷雾被拨开时，我们就会看到金融资本仍然站得稳稳的。我们将会看到各国商人纷纷互相偿还他们间正当的债务的壮观景象。我们将会看到德国商人仍会对英国人讲信用，法国人对土耳其人也会这样。我们将会看到金融业作好准备去发展新的事业；为开发新的领域寻找资金；帮助重建遭受破坏和毁灭的世界；重新把工业的火焰点得旺旺的，用和平的胜利照亮整个大地。”^②

布尔什维克一笔勾销沙俄的债务，这件事肯定动摇了这个信念。这时，需要资金来阻挡共产主义的潮流了。不过，战后精疲力尽的欧洲需要重建却仍然确实有其影响：它使美国金融业全力以赴地奔向国际舞台。此外，二十年代和三十年

^① T. W. 拉蒙特：《战争对美国金融地位的影响》，载《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刊》，1915年7月号，第108—109页。

^② 同上书，第112页。

代欧洲资本逃向美国也加强了美国的金融业，因为资本逃向美国使美国的黄金积累突然猛增。W. 伍德拉夫，一个研究欧洲国际地位的历史学家，总结了这些变动中的潮流：

“虽然很少人认识到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几年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但战争已经使欧洲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了破坏，而如果沒有足够的金融力量，贸易是无法兴旺起来的。英格兰银行甚至试图恢复它在十九世纪作为国际资本市场控制机构的地位，并且一俟战争结束就抢先参与安排重新建设的贷款事宜。英国、法国延长了它们的长期贷款，在较小的程度上，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也这样做了。瑞典也作为一个债权国出现了。……但是只有美国才真正拥有战后期间所需要的财源。随着美国承担了世界上最大债权国的某些义务，美国开始给了欧洲一系列的贷款和赠款（慈善事业与商业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做法是无与匹敌的，并且直到今天都还一直继续着。”^①

事实上，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战后最初几年就看出了将要出现的局面。例如，E.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就以古典的、剖析历史的方式着重指出了世界金融舞台上新现象的主要实质：

“在历史的进程中，货币的唯我独尊地位总是属于在某一时期占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统治地位的国家：回顾一下这种

^① 威廉·伍德拉夫：《西方人的影响，对1750—1960年期间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作用的研究》，伦敦，1966年，第277页。

现象是很有意思的。当腓尼基和希腊在地中海贸易方面占统治地位时，腓尼基和希腊的塔兰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意大利商业资本支配地中海的时代，佛罗林（旧意大利货币）就占统治地位；西班牙在商业上的地位使得皮亚斯特（旧西班牙货币）在国际货币关系中名列前茅；荷兰不仅使用它的舰队、纺织品和贸易来进行统治，它同时也使用盾（荷兰货币）。随着世界经济与贸易的重心转到了‘海上统治者’（即英国）那里，英镑的作用就跃居首位。最后，美国在经济上支配世界，美元也就有了支配地位。”^①

正如有些从长远观点看问题的分析家往往会犯的毛病那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未免也有些言之过早。诚然，美元的影响是在增长：那是美国资本输出大大增加，美元破题儿头一遭作为一种储备货币和国际流通手段而出现的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各国除了黄金以外主要都以英镑（此外也有少量的法国、瑞士和荷兰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以防止受国际收支波动的影响。战争改变了这种现象：美元起而与英镑共同成了一种主要的储备货币——但其地位则仍然不及英镑重要。经过了另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和亚洲的大规模破坏以及其他主要工业强国的财政破产等等，才为美国攫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军事和政治的权威地位准备好了条件：

“正象英国在全盛时期那样（那时英国是世界贸易和金融

^① E.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英国牛津，1965年，第155页。这本书值得很好地读读。关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参看该书的一整节，第150—160页。

业的主要中心而英镑则是主要的货币),美国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世界的金融中心而出现,它的货币也就成了最重要的流通手段。”^①

自从战争以来,美元世界地位的改变,可从外国政府及其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储备和美元储备的比较中十分明显地看出来。(见下面表一)

表一 外国^②持有的黄金与美元

至……年年底	黄金	美元资产 ^③ (单位: 10亿美元)	美元资产占黄金(储备) 总额的百分比
1938	11.6	0.5	5
1950	11.5	3.4	30
1955	14.4	7.0	49
1967	26.9	15.7	58

材料来源:《联邦储备公报》1940年9月号;1951年12月号;1956年12月号;1968年6月号。

从表中可以看出,美元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被接受为国际货币,但仍然只占各国中央银行黄金储备中比例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从战争结束以来,美元的重要性就日益增长了。

为了明了这项发展的重要性,我们首先应该回顾一下美

① 亨利·G·奥布里:《美元与世界事务:对国际金融政策的研究》纽约,1964年,第109页。

② 不包括共产党国家所持有的储备。同时也不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有的储备。

③ 美国向外国的官方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部门)清偿债务。1967年以前的数字不包括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国政府公债和债券。当时这些证券只占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资产中的很小一部分。这项统计上的数字出入不足以影响本表所显示的趋势的有效性。

元作为储备货币究竟意味着什么。货币在各国商业中，是作为支付从一国将货物、劳务转移到另一国的费用的。当美国制造商把一个电冰箱卖给巴西的买主时，他售得的是克鲁赛罗(巴西的货币)。克鲁赛罗实际上代表着巴西所应偿付的货物和劳务，它只是在巴西买东西时才有用处。但是，如果这位美国制造商不买巴西的东西，他就只肯接受美元。因为他只能用美元来支付制造电冰箱的劳力、原材料和其他费用并且取得他的利润。为了售得美元，那就必须找到另一个需要克鲁赛罗的美国商人。假如找到了这样一位需要克鲁赛罗的商人，那末就可以把售得的克鲁赛罗换成美元。很显然，只有那些想把买来的巴西货物弄到美国去销售（或把劳务售给美国国民）的商人才会要克鲁赛罗。

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中，这种交易的次数可要多到许许多多倍了，因此进口商和出口商的个人需要是通过银行系统累计起来，按照国与国之间全面国际收支的情况来解决的。如果进口总值与出口总值相等，那末，就不会产生过多而又没有人要的克鲁赛罗的问题。^①

可是，如果进出口不平衡，那末那个买得多卖得少的国家就必须设法找到某种能被他国所接受的支付手段。当然，黄金是能被普遍接受的支付手段。黄金是许多世纪以来所确立起来的，被普遍认为有偿付能力的东西。这倒不是由于什么神话般的原因，而是因为黄金具有不可缺少的双重优点：既有

^① 在简明的解释中，我们有意不提资本的运动。虽然不考虑资本的运动是无法恰当地分析国际收支问题的，但是，为了本书所涉及的目的，只提货物与劳务的平衡也就能解释清楚主要的问题了。

贮存价值，又能在“自由”市场之间的国际交换中作为被普遍接受的支付手段。

近百年来，用黄金作为国际货币储备有两个主要的例外：即英镑与美元。这就是说，其他国家愿意，或者根据情况不得不同意，持有这两种货币作为黄金之外的储备或代替黄金的储备。

国际商业的正常进程要求：每个国家都必须持有一种能被接受的支付储备，那怕只是为了轧平时常可能发生的进出口不平衡。此外，当进口超过出口时（不包括外国人的投资和贷款所提供的临时调整资金），一国持有的国际支付储备是用来偿清各种账款的最后手段。分析到最后，一国储备的多少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能走多远的问题，如果这种经济发展是依靠进口资本货物和原料的话。

国际支付储备的多少和强弱对于一国的经济福利来讲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这些储备全是黄金，那末一国政府愿意怎样使用它的储备都行，既无现实的又无潜在的限制。之所以是这样，那是由于黄金作为商品有其价值而且又是被普遍接受的支付手段的缘故。

然而，当储备的组成部分中有另一国家的货币时，那就存在着一种真实的或潜在的限制了。因为，说到底，一个国家的货币只能用来买发行该货币的国家所生产的货物、劳务。只要国际贸易商、银行家都认为美元“同黄金一样”，美元就成了约 110 种不同货币互换的媒介。事实上，美元“同黄金一样”这个概念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中已有所体现。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约的第四条就规定：“每一会员国通货的

平价应以黄金作为共同货币单位来表示，或以 1944 年 7 月 1 日有效的重量与成色为准的美元来表示。”

很显然，这种把美元与黄金等同起来的做法规定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从属于美国的关系。从属的程度则按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力量的强弱而有所不同。对美元的依赖（这种依赖已经十分明显地达到了危机边缘的程度），说到底，就意味着美国借据的持有者只能用这些借据按美国的价格去买美国货物（当然，这还得假定：当美国自己面临特殊困难时它还能履行诺言）。

只要各主要贸易国家接受美元为国际货币，只要外国商人和政府都愿意把他们的储备存放在美国的银行里，那末美元是可以代替黄金起作用的。但这就不言而喻地假定了：美国的力量是无限的；外国商人和银行家永远都是美元的“爱好者”。然而，以互相依赖为基础的金融联系只能是暂时的，这就是商业世界中的基本现实情况。只要能得到当前或近期的好处——不管这种好处是以利润较大还是以个人资本较安全的形式出现——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就能持续下去。要是整条船摇晃起来，那就只有各自逃命了。美国为努力保住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军事支配地位花了成堆的钱，而在这些钱之上，仅仅加上越南战争的费用，就使国内和国际金融出现了紧张：只要瞧一下这种紧张情况，美国的金融力量并不是无限的这个事实便显而易见了。

在这里，需要理解的关键问题是潜在的限制：即资本主义世界由于与美元的关系很深所造成的不断受限制的危险。美元的世界性作用已经成为美国力图控制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

工具之一。一方面，美元之所以可能成为世界货币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很大的缘故。另一方面，美元发展到成为唯一的世界货币这个事实本身又给了美国筹措资金的手段，用来从事活动，以达到其控制世界局面并加强其经济与军事力量的目的。

这种作用可以从美国财政部长H. H. 福勒的谈话中推断出来。当时美国面临1967年春的国际货币危机，而他则采取行动敦促美国的工业发达盟国把队伍站好。《纽约时报》用“福勒讲到货币威胁”为标题，引述了他的话：

“我继续认为向我的其他国家的同僚强调以下的事实是必要的和恰当的：美国处理它的国际收支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在这进程中是否给予合作，并取决于其他重要的金融国家如何处理它们自己的国内和国际货币问题。

“我还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这种合作并不是一个帮助美国去解决美国的困难的问题，而是要使美国能够在不危及国际货币制度的情况下解决它自己的问题，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使这制度发生根本性的、不符大家愿望的改变，不撤销它对其他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的承诺。”^①

福勒部长所暗示的威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1)美国能够以单方面的行动破坏国际货币制度并把它弄垮；(2)美国需要现存的国际货币制度以继续进行它的军事行动、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而这些都是美国维持帝国主义世界现状的纲领的内容。

^① 《纽约时报》，1967年3月18日。

作为控制工具的货币集团

在正常的情况下，由于使用外国货币所受限制的性质并不十分明显：因为这项制度的活动和经济生活中被接受的、司空见惯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进程彼此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不过，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各宗主国如何使用这种货币安排来控制它们的殖民地，或在经济危机和战争时期如何使用它们，那么这种货币安排可以利用来干什么就非常明显了。^①

例如，当三十年代世界萧条开始时，英国所采取的早期措施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英镑区”，英联邦和英帝国的成员（加拿大除外）都参加了。后来，一些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和认为参加这项防御性安排对己有利的国家也都参加进去了。建立英镑区的目的是：保护帝国和其暂时的贸易盟国的贸易，以对付萧条所带来的猛烈竞争。为此目的，“英镑区”的安排包括以下三个特点：（1）各成员国全部或部分用英镑作为它们的货币储备；（2）基本上它们都用英镑支付对外贸易；（3）这个集团的成员设法使它们的货币对英镑（的比价）保持稳定，而不是对美元保持稳定。^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某种特定的货币作为储备

^① 关于英国在其殖民地独立之前和之后是如何对它们进行控制的问题，以加纳为例，可参看 B. 菲奇与 M. 奥本海默合著的：《加纳：幻想的结束》，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6年，第42—47页。关于英国对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前和之后的一般做法，参看 T. 巴拉夫：《贫困的经济学》的第2章“新帝国主义的机构”，伦敦，1966年。

^② R. F. 哈罗德：《论英镑》，载普林斯顿国际金融论文集，第13集，普林斯顿，1952年2月，第9页。

所暗含的潜在控制就显得更加清楚了，英国当时就能够通过使用“支付协定”来直接控制英帝国的国际活动：

“在战争期间，英国设法尽可能地靠信贷过日子，而不是仅仅为了进行支付而组织国内的人力去搞出口，但对维持那些供应英国及其盟国物资的国家的经济所迫切需要的出口则不在内。英国和许多国家订立了所谓的‘支付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这些国家由于出售货物给英国，或对英国海外驻军提供劳务，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得的英镑都应存入“特别帐户”，并且只能用来偿还英镑区的债务。”^①

事实上，英国甚至进一步要求：英联邦成员国所挣得的美元也只有在美国的同意下才能使用。罗伯逊爵士对上述这项集体使用美元的做法所作颇为辛辣的评论是一针见血的：

“它意味着：每一个（成员）国，作为一个国家，都同意将它挣来的多余的美元交给‘母亲’（即英国）换取英镑，而当它需要额外的美元花的时候则去向‘母亲’要。很自然，‘孩子’在要求使用集体美元时能有多大胆量部分地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往往那些挣美元最多的小黑孩子如果过多地显示了要花美元的意向，可能就得挨揍，而那些成年的白种女儿，尽管她们一向都很会花钱，却只有人轻声地跟她们说理

^① R. F. 哈罗德：《国际经济学》，英国剑桥，1957年，第99—100页。

而已。”^①

战争时期订立的“支付协定”，成了使英国能重新站起来的武器：它规定了一些条件作为殖民地获得独立的部分代价。直到今天，英镑在大部分英镑地区还起着储备货币的作用，并且作为一种维持早已确立了的贸易关系的手段，以对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所产生的侵蚀作用。法国也还让法郎作为法国现在和以前的许多海外属地的贸易和储备的货币。

但储备货币作为影响和控制的杠杆并不只是在需要节约的时候才起作用，也不只是由于存在着已有的殖民纽带才起作用的。随着美国接管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太平洋的军事责任，美国甚至对那个地区的英联邦国家的经济影响也增大了。澳大利亚正在发生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美国资本流向澳大利亚的增加（流入澳大利亚的资本中约有一半来自美国）以及美国与澳大利亚间贸易的增长，澳大利亚已面临这样一个政策上的抉择：是否要从英镑区倒向美元的势力范围去，从而决定以哪一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伦敦《经济学家》

^① 丹尼斯·罗伯逊爵士：《英国与世界经济》，伦敦，1954年，第39页，引自前引非奇与奥本海默合著的书，第46页。当美国这个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坚持作为给饱受战祸的英国以财政援助的条件之一，必须取消“英镑区”和“集体美元”所涉及的贸易竞争时，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显得很清楚了。1945年12月6日美国与英国政府间的财政协定第七条规定：“联合国政府应尽可能早地，无论如何不得迟于本协定生效后一年内完成安排，……根据这些安排，英镑区所有国家在当前交易中得到的英镑收入……可以在任何货币区的当前交易中不加歧视地自由使用，其结果是，由于所谓英镑区与集体美元所产生的任何歧视均将予以完全取消，从而英镑区的每一成员国可以在任何地方的当前交易中，自由使用它当前的英镑与美元收入。”（协定全文作为理查德·N. 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一书的附录予以重印，英国牛津，1956年。）

杂志的一篇报道指出：

“英镑在澳大利亚持有的储备中所占的比例，从近至1960年的80%下降到现在的60%，而在五十年代初则为94%。

“澳大利亚关于这方面事务的最高决策者宣称，澳大利亚效忠于英镑区是绝对坚定的。但是，公开议论澳大利亚留在英镑区有什么好处已不再被认为是叛逆论调了，并且今年澳大利亚的金融刊物中已载有一些这方面的辩论文章了。一种广泛持有的非官方观点认为：如果澳大利亚倒向美元集团，那它就有可能象加拿大和日本一样取得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特权地位。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英国能够加入共同市场，那末澳大利亚留在英镑区就值得了。

“考虑到澳大利亚在贸易和海外借款方面都已经来了一个大转弯，人们对以下事实就不会感到惊讶了：美元在澳大利亚的储备中所占的比重在过去十七年里共增加了十二倍，1960年以来则增加了三倍。”^①

贬值的道路

一个国家由于与国际金融关系很深，其货币又被作为储备货币来使用，从而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也可以从主要工业强国和经济上依赖别人的国家在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时所采取的调整道路方面看得出来。

在正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那

^① 《经济学家》杂志，1967年10月7日，第89页。

就是说它的支出要比收入来得大——它要嘛动用黄金或外币储备，要嘛就向外国银行(或政府机关)借钱。一旦这种办法也用尽了，这个亏空的国家就必须进行内部调整，主要是削减向国外的购买，其次才是设法扩大出口来解决问题。之所以说“其次”，是由于一个国家比较容易控制进口，不易控制出口。尤其是，增加出口通常意味着要想在奄奄一息的市场上多卖些东西，而正是这个市场的不景气才造成了收支不平衡。

实现削减进口有时采取提高关税，有时则采用直接管制。削减原料与中间产品的进口所带来的影响本身就可能导致经济下降。对搞“自由企业”经济的国家来说，比较有效的做法是采取诸如降低工资以减少消费或限制信贷以压低生产等更加直接的措施来造成经济下降。经济下降就会减少进口的需求，从而也就有助于消除逆差。

在大多数情况下，入不敷出的现象严重而且拖的时间又很长，最后就会导致贬值。由于贬值通常会引起大规模的混乱，因此各国只有到最后不得已时才肯采取贬值这个措施。贬值迫使市场进行剧烈的调整：进口货物的价格提高了，从而迫使消费减少，特别是使社会上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减少；出口货物在国外市场上的价格降低了，从而加强出口货的竞争能力。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那些经济上和财政上依赖别人的国家来说，进行严峻的内部调整或贬值都是家常便饭，可是那些金融强国却很少这样做。甚至在经济学家们认为国际(货币)制度运行顺利的全盛时期，情况也是这样。十九世纪的金本位制度据说应该是保持国际金融平稳

的理想的市场机构。可是，与其说这些自动的机构代表了现实，倒不如说它们是经济学家们思维过程所产生的抽象的模式的产物。事实是，所谓自动的金本位制度是通过各个国际货币市场中心的渠道来进行工作的。金本位制度所要求的调整，是通过国际银行家们的信贷和这些银行家们的国际资本转移来进行的。难怪这种做法造成了先进国家的汇率稳定，也造成了“外围”国家的汇率不稳定。R. 特里芬教授在扼要分析金本位制度时，他的头两个观点是：

“(1)十九世纪的货币制度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保持了汇率的稳定，使贸易与交换的数量不受限制，因而其成功的程度是空前的。

“(2)不过，这项成就只限于组成这制度核心的比较先进的国家以及那些与它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金融上有密切联系的国家。至于其他货币的汇率——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在这个期间里则有大幅度的起落和大幅度的贬值。‘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鲜明对比大体上可以这样来解释：资本运动的周期性格局和贸易的条件造成了第一类国家的稳定和第二类国家的不稳定。①（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问题在于：那些主要金融中心（所在国）拥有权力以及这种权力所提供的机构来消除入不敷出的问题，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那些依赖别人的国家，则只有忍受毫不松动的市场压力所强加的金融纪律。特里芬在另外一段话中指出：

① R. 特里芬：《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历史地重新评价和对未来的展望》，（载普林斯顿国际金融研究，第12集）新泽西普林斯顿，1964年，第9页。

“说明十九世纪(货币)可兑换制度之所以能成功地运行的第二个因素是：当时货币与银行体系的机构总是在事前就防止了重大不平衡的出现，而不是用大幅度调整价格和收入来进行事后的纠正。尽管十九世纪的物价和成本的变动性较大，我也不相信当时人们为了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而会容忍减少工资的20%或30%，就象今天人们不会容忍一样。事实是，组成这制度的核心的主要西方国家，很少有机会去检验一下该制度通过调整国内价格与收入来纠正主要失调现象的能力。每当这种能力被检验时——老是反复在拉丁美洲各国被检验，纠正的方法则同样都是货币贬值。……”^①

金融大国制造它们自己的货币

工业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工业大国与帝国主义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所构成的体系，其焦点汇集在国际货币市场的集中的金融力量上。正如前面已指出的那样，货币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本营。通过银行和货币市场的其他机构所发挥出来的金融力量，使得工业国家能够防止或减轻收支逆差的困难；也正是这种金融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使不发达国家规规矩矩地当原料供应者。这不能算是什么阴谋诡计，它不过是资本的正常的、带自卫性质的行为。

金融力量的来源，以其最原始的形式而言，是制造和使用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和支付手段的能力。制造用来支付投资和发放贷款的货币，产生于以下两种银行活动：(a)把本来不活动的资金转变为活动的资金；(b)建立信贷。通过扩大信贷

^① R. 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纽黑文，1961年，第27页。

(或印刷钞票)来制造货币是现代银行业的核心业务。^①巴西和智利的银行也能这样做。可是,在巴西国外,除了要买巴西产品的进口商之外,有谁会克鲁赛罗呀?在智利国外,除了要买智利产品的进口商之外,又有谁会埃斯库多呢?这些国家的苦处是:它们拥有太多自己的货币却没有足够的外汇。

对那些经营为各国所需要的制成品的各大贸易国来讲,情况则恰恰相反。它们的货币在国际上通用,其原因是:(1)它们的货币可以用来清偿债务,甚至可用以清偿外国与外国之间的债务。在正常的情况下,比利时货币可以兑换成法国货币;法国的可兑换成英国的;英国的可兑换成美国的,如此等等。(2)这些国家生产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工业国家所需要的多种产品。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借据也都可以当钱使;(3)通过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安排,不发达国家纷纷都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主要大国建立了特殊贸易途径。由于存在这些贸易集团,前法国属地就可以用法郎来偿清它们的国际收支逆差,因为它们大部分的债务,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欠法国公司的。英国和其他金融大国的势力范围的情况也是这样。

可见,这就是为什么主要工业和金融大国制造货币(或说扩大货币供应)的能力,不仅能运用到国内经济方面,而且还运用到它们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去。由于有这种能力,它们就能够:(1)为它们自己可能对一个卫星国出现收支逆差时提

^① 不宜在本书中把信贷和货币扩展的技术方面都解释清楚。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关于货币与信贷的标准教科书。关于这问题的基本知识,可参阅彼得·L.伯恩施坦:《货币、银行与黄金初级读本》,纽约,1965年。

供资金；(2)在卫星国出现收支逆差时贷款给这些国家，并在这一过程中使这些国家向母国靠拢。此外，它们往往还能设法防止它们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即将产生的国际收支逆差。它们是这样办的：对国内信贷进行管制；变更利率以及采取其他措施，例如把所需要的资本(外币或黄金)暂时从另一金融中心(另一工业金融国家的货币市场)吸引到本国来。

我们在这里无法把这些活动的技术方面的详细情况都一一介绍清楚。这样说就行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种金融力量和通过发挥这种力量的银行机构，使它们能够解决它们国际收支波动的问题而不至于剧烈地损害它们的经济。的确，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银行机构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都是很有价值的工具。

当然，为国内和国际活动建立信贷还是有限度的，其限度的根源在于作为基础的生产能力的性质以及如何使用这种生产能力。当达到这种限度时，不管是战争或备战的结果，或是资本积累太快，或是企图办一国国力所不能及的事，都会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但是，即使出现危机，它和那些卫星国的危机也还是不一样的。对卫星国来说，关键问题是：能否作为宗主国的附属国存在下去，而其统治集团是靠宗主国才能继续掌权的。对宗主国来说，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通常是：它们如何施展各种手段，去占其他金融大国的便宜，以及如何维持它们的帝国。例如，英国一次次地搞贬值就是为了拚命维持英镑集团，维持它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和海军基地，维持残存的殖民关系。

美国金融的情况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使用它的金融力量来控制世界其他部分是最无节制，也是史无前例的。自从1950年以来的每一年（只有出现苏伊士危机那一年例外），美国的国际收支都有逆差。在考虑这项旷日持久的逆差时，必须充分地而且明确地了解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1) 造成并且维持这项逆差只是美国作为帝国主义体系的组织者和头子这种地位的主要内容。浏览一下表二所表明美国在1967年的收支逆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1967年逆差的类型和在该年以前整个逆差年代里所出现的逆差是类似的。

表二 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摘要): 1967年

(单位: 10亿美元)

目 的	从国外得到的美元	流到国外的美元
进出口货物和劳务的顺差	+7.9	
私人 and 政府的汇款①		-1.2
军事开支(净数字)		-3.1
军事与经济援助		-4.0
私人资本投资		-3.5
合计	+7.9	-11.8

材料来源:《现代商业概况》, 1968年6月号。

事实是再清楚不过的。逆差是用来支付:

· 军事开支——用于越南战争，以及维持分布在全球广大地区的空军、海军和陆军部队。(这当然不包括所有的军事

① 美国公民寄到国外的赠款；政府付给在国外个人的款项，如付给住在国外人员的社会保险金。

开支,只是指需要把美元转移到国外的那一部分开支。)

·军事与经济援助:这是美国用来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的工具。

·美国工业和金融界在外国的投资。

(2) 支付逆差的资金来自通过政府或银行建立信贷扩大美元的供应。J.托宾教授,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63年在众议院一委员会上作证时讲到:

“在正常运行的储备货币制度下,增加国际货币供应的最初受益者显然是储备货币本身。在自己家的后院里有个造币厂或有架印钞机,那是很愉快的事。而金汇兑本位制就给了我们这项不比南非差的特权。我们在过去十年中之所以能够对付收支逆差,就是由于我们的借据普遍被接受为货币的缘故。”^①

(3) 我们之所以能在这样长的期间为收支逆差提供资金是由于美国是世界财东,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一直愿意(尽管近来啧有烦言)持有美元作为储备资产。

当时任财政部长的道格拉斯·狄龙曾明确地总结了这种局面。当参议员贾维茨问及,美国作为世界财东究竟使美国得了什么好处时,狄龙答称:

“我们被允许通过增加外国持有美元的数额来填平我们的收支逆差,在这方面我们是真正受益者。如果我们的美元

^①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关于货币制度的听证:其职能和可能的政策》,华盛顿,1963年,第三部分,第551页。

不是储备货币，如果我们不是世界财东，那末这一切都谈不到。要不然我们很可能面临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局面：只要我们出现了逆差，我们就不得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平衡我们的收支，即使那意味着象加拿大去年那样不得不限进口，或大大削减我们的军事开支到我们的安全所不容许的程度。……我想这就是我们受益的主要方面，尽管还有另外一项很重要的好处，那就是：总得有个国家来当世界财东并提供这种额外的国际清偿能力。这个国家就是美国。这是很恰当的，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金融国家，而且我们有最坚强的货币。”^①

除了美国的金融力量这个原因之外，前主管货币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还提出其他国家之所以会进行合作的另一原因：

“此外，美国的政治稳定以及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使各国比较情愿把顺差存放在美国，而不是存放在世界上任何另一个国家。”^②

当然，如果世界上任何另一个国家试图处理象美国所面对的那样大的逆差，用不了几年，更别说是十八年了，就会出现大萧条，同时会大大降低其生活水平。因此，没有任何别的国

^①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关于美国国际收支的听证》，华盛顿，1963年，第一部分，第83—84页。“总得有个国家来当世界财东嘛！”的提法有种随便说说的口气。不过，狄龙部长讲话的措词倒是委婉得挺有意思。很显然，他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一个没有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统治的资本主义世界，或者没有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

^② R. V. 鲁萨：《为世界经济进行货币改革》，纽约，1965年，第9页。

家愿意为了那些崇高的目的而负担这种逆差。

请读一读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和财政部副部长鲁萨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对话：

“普罗克斯迈尔参议员：如果我们没有国内的考虑，如果我们也不负有作为世界财东而领导世界的责任，那末，我就要假定：为了平衡我们的国际收支，我们只有实施节约开支这一传统的、标准的而又仍然有效的办法。

鲁萨副部长：是这样。

普罗克斯迈尔参议员：换句话说，将会用紧缩通货的办法？

鲁萨副部长：是的。

普罗克斯迈尔参议员：得使我们物价下降，以便到国外去销售，使我们工资下降，大大减少联邦开支，是不是？

鲁萨副部长：是的。

普罗克斯迈尔参议员：得增加税收，提高利率，等等，是吗？

鲁萨副部长：是的。

普罗克斯迈尔参议员：很显然，这些事我们都不能做，否则那对国内将是场灾难，而且也将会导致一场国际萧条，是不是？

鲁萨副部长：是的。”^①

在这段对话之前，鲁萨副部长作了正式发言，用比较系统的方式扼要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不是世界财

^①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关于美国国际收支的听证》，华盛顿，1963年，第一部分，第135页。

东,那末:

“我们老早就会被迫削减我们的进口(也许是通过收缩我们的经济),大量减少我们的对外投资(而对外投资的收入对我们当前收支平衡的贡献是很大的),削减(也许还是大幅度地削减)我们对我们友邦及盟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假如我们果真采取了这些步骤,我们国外的主顾们就会大量减少他们在美国的采购,从而使我们面临世界大多数国家采用歧视美元政策的局面。我们也将会看到,世界贸易将停滞而不是迅速增长,而经济停滞不仅对美国本身的繁荣有害,而且对整个自由世界也是有害的。”^①

现在让我们来综合分析一下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帝国主义体系。美国作为首领,拥有经济力量去侵略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政治军事盟国的工业和市场。它拥有种种力量以维持它占支配优势的世界军事地位。它可以进行对外援助,对不发达国家投资和贷款,通过造成这些国家的金融从属关系,从而使这些国家更加靠拢美国。所有这些,再加上维持繁荣和防止萧条,都是因为美国占有世界财东的地位以及美元占有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才有可能做到的。正是由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促使其他工业国家进行合作,美国才能成为世界财东并作为储备货币的供应者。而在美国国内这种情况必然造成“私人企业无情地和对外政策纠缠在一起”的现象。^②

^①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关于美国国际收支的听证》,华盛顿,1963年,第一部分,第147页。

^② 摘自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办并出版的一个报告书。见前引亨利·G·奥布里的书,第15页。

其他工业国进行合作并不是纯属明智的举动。这些国家只是在没有什么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鲁萨在这问题上的看法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美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紧接着战后的期间达到了它的高峰地位的，那时，事实上没有任何其他货币可以起世界性的作用，而且我们那样多的政府援助都是用可以自由使用的美元来提供的。等到有些欧洲国家拥有大量剩余的外汇可兑换时，美元作为全世界贸易和支付的常用货币这种地位已经稳如磐石了。……只要美国经济继续遵循市场自由原则，美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就会渴望要求去执行与美元作为媒介通货的地位相称的那些银行职能。我认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不能够放弃这种地位，除非我们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①

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大银行家们和鲁萨先生（他现在是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的合伙人）一样，都很了解所谓“革命性”一词的含义，它对美国经济结构从而对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就意味着从根本上背离现行国际货币制度。在这方面，重要的问题不是仅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机构进行一些调整——目前正在提出和考虑的那种货币改革，而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这一中心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在这个货币体系内的伙伴们需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追求他们自己的有竞争性的利益。其他国家的大银行家们之所以害怕，其原因可以从国际银行业务的普通常识里去寻找，而表三

^① 见前引 R. V. 鲁萨的书，第 23—24 页。

中的数字已简略地加以扼要指出了。

这个表表明，黄金储备与欠外国人的美元债务正同时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国黄金储备迅速下降，而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则迅速上升。到1968年5月底，外国人持有的流动美元资产已是美国持有的黄金的三倍。如果发生挤兑现象——如果所有持有美元的外国人在一个短时期内都要求美国对美国的借据兑现——那末美国手头就会短缺大约200亿美元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支付手段，即黄金。

黄金储备与欠外国人的美元债务之间差额的大小是美国对外活动的金融限度的重要指示器。随着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一年比一年加大，这种限度的存在就更加明显了，但美国

表三 美国的黄金储备和欠外国人的美元债务

(单位：10亿美元)

	美国的黄金储备	外国持有的美元资产①
1955年年底	21.8	11.7
1960年年底	17.8	18.7
1968年5月	10.7	31.5

材料来源：美国国情普查局：《1966年统计摘要》，华盛顿，1967年，以及《联邦储备公报》，1968年8月号。

① 1960年和1968年的数字是美国欠外国政府、外国银行和其他外国机构、商人的流动债务。1955年的数字是短期债务，不包括外国人持有的美国政府公债。缺乏对比性并不能否定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论点。1955年具有对比性的数字可能比117亿美元要高一些，但决高不了10%。请注意，持有美元的数字要比表一所表明的数字大得多，因为表一的数字只包括外国政府和其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本表的数字是欠外国人(包括银行、其他金融机关和商人)的流动美元债务的总数。

却不顾其他金融大国的反对，在对外军事与经济活动中是妄自尊大，在国际金融实践方面则是目中无人，二者交相辉映。尽管美国时时也受到欧洲外汇市场上黄金与货币投机家们的冲击，它在金融实践方面仍然是我行我素，增加各种限制，最后则依靠其他国家大银行家们的自愿或不自愿的合作。

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大多数国家对此简直毫无办法：作为美国政府和银行的债权人，却不得不屈居事实上的美元集团成员的地位。可是，比较独立的金融国家却还有一些选择余地。欠外国人的美元债务中约有一半集中在六个国家：英国、日本、法国、西德、意大利和瑞士。因此，这些国家就拥有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武器。不过，在目前情况下，它们的选择也是有限的。它们的利益在以下的方面和美国的利益是相一致的：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是用来保全帝国主义制度，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把非帝国主义世界的疆界往后推。同时，它们为自己的利益担心，又怕美国的商业和金融业的竞争威胁。因此，只能在现行的国际货币安排范围里争夺权力，而这种争夺的确也是在进行的。经常记住以下事实是很重要的：国际金融冲突的核心就是争夺权力的斗争。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高级经济专家E. A. 伯恩鲍姆说得好：

“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开了一百多年的国际货币会议，人们却仍然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答案集中在一个字上，那就是一个权字。一百多年的国际货币会议开来开去就是这么回事。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二十二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会议,建议要为建立国际流通(货币)提供新的便利,就没有脱离这条总的规律。”^①

围绕着改革国际货币制度而进行的各种勾心斗角也只是夺权斗争的一种形式。帝国主义大国内部的紧张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在其他工业大国的大企业界内部,有些集团的直接利益是和美国企业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另一些集团却眼看着美国的扩张减少了它们的获利机会。这些外国企业公司和银行都正在通过资本输出、国际银行业务以及利用它们政府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与军事援助等,进行它们自己的对外扩张,既作为对付美国扩张的一项自卫措施,也出

① E. A. 伯恩鲍姆:《黄金和国际货币制度:一种有秩序的改革》,载普林斯顿国际金融论文集,第65集,普林斯顿,1968年4月,第2页。伯恩鲍姆确曾把布雷顿森林会议当作这种概括的例外。不过,考虑到随后的历史情况,人们倒可以问一问:在这个会议上,正面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不是并没有掩盖住权力斗争?

关于如何分析国际货币制度斗争中的基本问题,可参看《每月评论》1968年2月号的文章《黄金、美元和帝国》,以及载于《每月评论》1966年12月号中的几篇文章:《软弱的芦苇和阶级敌人》;D. 迈克尔斯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日益发展的金融危机》;J. 马里斯的《国际收支危机》。

在上述《软弱的芦苇和阶级敌人》一文中,斯威齐和休伯曼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引起了麻省理工学院的C. P. 金德尔伯格教授的批评性回答,并以在普林斯顿国际金融论文集(第61集,1967年8月)刊载的一篇专文《国际货币与世界语言中的政治》进行答辩。他的论点是关于证明:美元由于有实效必需有其世界地位。“美元是世界会计单位——外汇储备的标准,共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联合国预算的分担,以及一大批其他国际货币单位都以美元计算。”(第2页)“我之所以主张保持美元汇兑本位,原因就在于美元有实效。”(第4页)但是,实效又为的什么呢?这位好教授完全是从资本移转和继续进行现存的贸易关系的实效来考虑问题的。可以肯定,美元汇兑本位的确是有效的工具——特别是在动员世界资本市场的资源来为反对越南人民的毁灭性战争提供资金方面更是如此。

于本国经济内部动力的推动。

有三个主要的决定方向的因素在起作用：(1) 由于要保存帝国主义体系，“向心力”就把各主要金融国家与美国紧紧联系在一起；(2) 由于受到利润竞争的刺激，只要美国活动中出现了弱点，“离心力”就会要求得到一些特殊好处；(3) “垂直的内聚力”——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设法巩固它和它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之间的金融联系。